

两个洋人眼中的慈禧太后

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



◎「英」濮兰德、贝克豪斯著
◎牛秋实、杨中领译

尊贵光鲜的宫廷生活之下，
暗流汹涌的政治斗争，
虎视眈眈的列强环伺，
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女人，
有着怎样的不为世人所知的
「另类面孔」？

天津人民

出版

最新期刊杂志

PDF图书下载

千本连环画



慈禧

统治下的大清帝国

◎〔英〕濮兰德、贝克豪斯 著

◎牛秋实杨中领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 / (英)濮兰德, (英)贝克豪斯著; 牛秋实, 杨中领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3

书名原文: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ISBN 978 - 7 - 201 - 05439 - 1

I. 慈… II. ①濮…②贝…③牛…④杨… III. ①历史事件 - 中国 - 清代②西太后 (1835 ~ 1908) - 生平事迹
IV. K249.05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026 号

点此下载PDF图书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1 - 6,000

定 价: 30.00 元

出版说明

《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是英国人约翰·濮兰德和埃德蒙德·贝克豪斯合写的一部慈禧的传记。这是第一部全面记述慈禧的传记。濮兰德是当时的《泰晤士报》记者，贝克豪斯出生于英国一个金融世家，1898年初他只身来到中国。在北京期间，濮兰德和贝克豪斯都结识了不少中国要人，搜集了大量有关慈禧及其清朝政治、社会状况的资料，这为他们写作该书积累了大量的素材。该书1910年在英国出版后，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多次再版。这次我们推出《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的中译本，旨在使中国读者了解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是如何认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慈禧太后以及晚清的社会和政治。

此书的中译本经过编辑与译者的反复修改，终于能够呈现给读者，其间虽然辛苦，但现在看来还是值得的。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本书的两位原著者毕竟是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隔膜，加之他们是在西方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背景下来中国的，有着“强势文明”的优越感，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这就使本书的某些观点和措辞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慈禧太后的评价多有不恰当之处，且有一些赞扬称颂之词。如称赞慈禧太后英明睿智，坚决果敢，是具有极强统治能力的君主，可与拿破仑这样的欧洲君主相媲美。并且，多处歪曲了广大人民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与态度，一方面将慈禧太后的诸多行为称为“善举”、“善行”；另一方面极力鼓吹广大人民对慈禧太后的“敬仰与拥护”。慈禧太后作为晚清数十年政局的实际

统御者,虽然有其受当时时代、历史、社会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行为客观必然性,但是其作为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对中国当时社会诸般苦难,如主权的丧失、领土的割让,仁人志士的被冤杀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们在认识和评价慈禧太后时必须认真对待,并始终秉持的观念基点。

第二,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持否定态度。如分别称捻军和义和团运动为“捻匪”、“拳匪”等,虽然这些都是引自中国的历史文献,但仍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第三,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粉饰、歌颂。如认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只是为了打通与中国的贸易渠道,同时也是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国内的“叛乱”,而并非赤裸裸的侵略。

尽管我们对书中的行文作了必要的删改,但上述种种错误观点,仍无法悉数摒除。因而,还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本书,看清作者的根本立场。

译者序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并没有从这次惨败中汲取教训，更没有真正奋发图强的表示，反而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助”上面。由于三国干涉还辽的缘故，清朝三品以上的官僚大都不能识破俄国的险恶用心，而对俄国表示亲善，希望俄国成为中国的庇护者。当清政府同俄国打交道不久，旅顺就被俄国强行租借去了。于是，清政府就转而接近英国和日本。

但是，戊戌变法时期，后党认为英国支持光绪帝，亲近帝党和维新派人士，这使慈禧太后大为失望。梁启超逃亡日本，慈禧太后派人行刺而不得，她对日本也动了火。慈禧太后在戊戌政变后一反常态地对列强翻脸，固然有列强侵略之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列强干涉她废立的阴谋。于是，她企图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去孤注一掷，要和帝国主义列强拼个高低。

义和团借助于民间传统的力量，盲目排外，不能用正确的策略去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他们的勇敢行为毕竟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敌的决心。西方汉学著作往往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不愿暴露自己的侵略本质，而对义和

团评价过低,对慈禧太后也过多地赞美,这是不足为训的,我们必须进行批判。

义和团运动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特别是在义和团最为活跃的地区已经出现了“纪纲法度,荡然无存”的局面;义和团失败后,把持朝政的顽固派集团被摧毁;这些都在客观上为社会改革扫除了障碍和阻力。在反抗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清政府所暴露的腐败已为全国人民所不齿;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也行不通,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仍是时人所思考的重大课题。经过这场战火洗礼的人民,在极端痛苦的反思中或走向反满革命,或呼吁变法改革以图自立。所有这些压力已使清王朝难以循旧统治下去了,不得不打出“新政”的旗号以缓和矛盾,争取人心,巩固其统治。而新政的颁行恰恰是清朝统治者给自己敲响了丧钟。

该书原由尚福恩女士和张献忠先生共同翻译,但由于家务和工作问题,他们仅翻译了第一、二章,后交由我和杨中领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将部分对慈禧过多溢美的地方做了删改外,基本上保持原著的本来面貌。因为晚清的历史,正是宗法制社会日益衰落而民主制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作为晚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她不仅要面对世界列强的欺凌,更要应付国内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局面,她百般挣扎,却难免颓势。

牛秋实

2008年5月18日

英文版序

《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是利用丰富的故事写成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经典作品，是大清帝国最后危机阶段的有文学价值和权威的历史记录，这两个优点已经因第三次出版得到了证明。正如雷登的杜夫达克教授对这本书的评价：“对过去的那些年代的掌故非常熟悉”。而且该书也被一些专业的学者如莫斯教授、里基拿德·约翰斯通先生及麦克奈尔教授看重。自第一次出版之后，书中关于景善阁下的日记等部分章节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点 1924 年杜夫达克教授就充分地认识到，并将其完整地出版，并且有了英文译本，日记中的一部分还是布兰德在英国博物馆找到的。出版完整的文本，就是因为日记本身作为历史文献有其重要的价值。尽管杜夫达克教授认为日记中的许多注释不是很准确，但是这并不能损害日记的可信度。只是最近才引起了或多或少的质疑，部分原因是只有汉学家们才能理解这一点。但对普通读者来说谈这些问题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在阅读的时候一定会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些更可信的问题。

首先，发现了这些短篇日记并把它翻译过来的是本书作者之一的埃德蒙德·贝克豪斯先生。他于 1898 年到达中国，之前的几年中他一直在学习汉语和日语。他学习日语已近五年，而这首先是要学会平假名或者说一般民众所掌握的音节表。在学习的过程中，他逐渐研究了其他日文文字和普通文献中草字的用

法,因此他到达中国的时候,已经能流利地阅读日文中草字书写的文献,然后从日文草字再到中国的草体字、草书,特别是“景善日记”中的草书。因为在中国学习了两年的汉语,加上他的聪明才智可以使他很容易地将日记中的草书翻译成英语。埃德蒙德·贝克豪斯先生是天生的语言学家,这些翻译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而且他一眼就能识别出他看到的草书文献(不仅能一眼识别出来,而且能像评论家那样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联军于1900年8月15日占领北京以后,贝克豪斯先生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就住在如今被称为莫里逊大街的住宅区,就在广东会馆的北面。因为那里当时在俄国人的控制之下,所以他决定搬往英国人控制的京城地区。罗兰森上尉指挥的俾路支团,被分派到景善住宅附近的一条名叫玉河的人工运河西岸。一些评论家对日记中不重视北京的地形提出了疑问,这条意见很中肯,他们认为这条河离景善的住宅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上面还有一条碎石铺成的路,而景善的很大一部分家产(后来到了晚清的将军张勋的手里,在1917年复辟帝制的时候被故意破坏了)现在被北京的联合教会所占。当时的英国外交使节由一小队韦尔奇火枪手护送以保证安全,贝克豪斯先生就住在景善的房屋的一角。他到达的时候,发现两个锡克教哨兵在正门里,有八个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在锡克军官带领下在内院里看守。贝克豪斯先生被授权占有整座房子,当然除了锡克小分队所占领的部分之外。他还得到允许有权使用这里的任何书籍和报纸。这些书籍和报纸是非常多的,他如果发现了任何关于义和团的文献或者义和团曾经占领房屋的迹象都要报告给英国当局。景善的长子恩澍就因为藏匿义和团团员和杀死他父亲的罪行而受到控告。贝克豪斯先生住在房屋外间的客厅里,作为他的起居室,那里非常凌乱。在房屋的西侧有一个小的房屋是景善的私人书房。里面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两个大书柜。地面是砖铺成的,地

上有几个盒子,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抢走了,到处是散落的纸,有些是成捆的,大多数没有被解开就被扔在地上,有许多书相当贵重,也被扔进纸堆中去,地上堆着的纸有几英寸厚。其中一只盒子里装满了景善的官方文告、便函和书信,官方上奏的抄件,草拟的奏折之类的东西。与走廊相连的一个偏门里也散落着纸张。在院子里甚至还有烧毁卷宗遗留下来的灰烬。这些混乱可能是因为掳掠而造成的。抢劫者翻得乱七八糟,是希望找到银子,烧毁的纸说明抢劫者想毁灭文献等其他痕迹及证据。

贝克豪斯先生的首要任务是找回书籍,因为这些书都是关于宋代的哲学书籍。要想找到关于义和团的活动的证据,就要对那一大堆纸进行仔细研究。他首先在一堆记有日期的纸上发现了重要的文献,这能证明朝廷离开北京的日期。其他同样的纸条也被找到,上面有景善的签名,这些都是景善做的记录。贝克豪斯先生当时担任巴罗将军的翻译,立刻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了将军。英国的最高当局也得到了报告。几天以后,恩澍被逮捕了,以谋杀罪和藏匿义和团员罪被刑部审判。证据就是从景善的日记中发现的,在日记中景善对恩澍同情义和团做了记录。当萨陶先生接替克劳德·麦克唐纳担任驻北京的英国公使的时候,贝克豪斯先生非常注意这些文献,他发现利用这些文献能够记住义和团魁首的名字如芬车和桂春等。萨陶先生建议出版,但不是马上,而是建议推迟到慈禧死之后再出版。

找到有价值的文献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成堆的文献根本没有动过,这些都是大量的私人信件,里面充斥着每天的琐屑的记录。这一大堆纸由一些松软的各种大小的纸片组成,里面包含着有关一百多万人的记录。

在接受了萨陶先生的建议后,也因为有其他的事情分散了贝克豪斯先生的注意力,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之前他都没有认真考虑出版的事情。最终这个工作是和布兰德先生一起合

作完成的。贝克豪斯先生怀疑是否能找到一家出版社。这种考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合理的，因为不止一家伦敦著名的出版社拒绝出这本书，但最终威廉姆·黑内曼接受了出版的请求。

接下来，是关于日记的手抄本的问题。关于景善的其他大量文献，都是由大小不一的松软的纸写成的。日记中一部分需要翻译的内容被送往伦敦，并同意作为布兰德先生的个人财产，而最初发现的手抄本被放在伦敦博物馆的学者真迹中珍藏。没有被翻译的部分，只是一小部分，被翻译以后，并不出版，为贝克豪斯先生个人所拥有。贝克豪斯先生希望当时出版一部完整并带有注释的译版，但是由于健康、视力下降和其他原因而搁浅。1926年，也就是两年以后，杜夫达克教授出版了大英博物馆手抄本的译版。如果有条件的话，他还想出版一个摹写本。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直到1936年3月，杜夫达克教授提出要购买这本手抄本。1932年，现存的手抄本连同其他文献和书籍，通过贝克豪斯先生的中国经纪人张合才先生出售了。而张先生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些东西交到购买者手中便被谋杀在北京的家里。

杜夫达克教授很希望于1924年由他评注大英博物馆中的日记部分。他对这些文献很感兴趣，他于1936年不惜一切代价要购买手抄本余下的部分，这样他就能够在著名学者的编辑和赞助之下将剩余的日记部分翻译出来。

关于日记本身：1900年景善已经78岁，无疑这位老年人遭受了老年疾病之苦。其中之一就是他听力很差，虽然算不上很严重的耳聋，但也有必要引起注意。这种障碍也许偶尔会被来访者所忽视。当他被家庭其他成员的不和所折磨的时候，可能会被夸大成对他的侮辱。他的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不和，其中一个人杀死了长辈。景善的听力不好并不妨碍他后来与别人的谈话。在文献中经常提到他与来访者谈论宫廷和朝中流传的消息。后来我们还可以看到，日记的写作并不需要依照拜访者的谈话内容来

进行。年纪大的人的另一个弱点是对立刻发生的事情记性不好，这点缺陷就是偶尔在日记中本应该写成“今天”，或者“今天上午”或“今天下午”都写成了昨天发生的事情。作者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位 78 岁的老人很有可能在退隐的时候经常记日记。如果是这样的话，用笔来记日记应归于他疲惫的心情。从另一方面来说，实际上是发生在当天他头脑里的事情，他很有可能用“昨天”的字眼把第二天上午发生的事情记录进日记里，这就容易理解了。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像这样重要的日记来记载所发生的重大事情。

正如日记所揭示的，景善对于当时的许多情况都很熟悉，有些人甚至与他的关系非常亲密。当他记录那些人的拜访的时候，他自然还要回访，尽管他不会直接负责处理这些国家大事，但总是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消息对他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尽管他不必要完全记下来，也没有打算出版的意图，所以他草草地记录了下来。此外，他偶尔提到了自己的家事，但这些不是经常提到，对于一家之主来说也没有必要特别热心于此。在日记中简要地提到他的部分房屋被义和团所占用，而且是应他儿子的邀请，明显是慎重的。如果在这些事情上展开，或者是带着敌意的批评态度去评论，在那种情形下是不明智的。至于抢劫他钱的儿子，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最终杀害他的一个儿子，是不可能尊重他住的房屋或者他日记中的秘密的。事实是日记作者对义和团所持的同情态度，与其说是削弱不如说是加强了这种犹豫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他的家庭会被看作是对他秘密的侵犯。因此他有理由将这些发生在家庭中的事情也一笔带过。

一些对日记的批评指出，日记所描述的东西作为智力的参与和对事实的还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尤其是在他笔下提到的人名和地名。至于后者，我们可以看到，景善在近八旬的年纪所记住的宫殿名称和亲王名字，并不靠他年轻时以及后来担

任官职时的记忆。作为一位年纪大的绅士我们应该原谅他的记忆力丧失和笔下之遗漏，但是以此作为对日记整体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所谓的伪造或者说剽窃，至少可以对此作出三点解释。第一点，景善日记中相似的段落至少应在其他地方能够发现，这样就能很容易地重新确定景善日记记载的原型。我们以王文韶为例。早在1902年，贝克豪斯先生本人把日记借给王文韶看，他对这一切都很熟悉。当王文韶把日记还给贝克豪斯的时候，对他说，日记中的有些细节是他本人提供给景善的，并补充说在1900年6月到8月之间景善经常拜访他。因此有理由断定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而王文韶出版的杂志和对日记的评论，在裕禄看来有互相重复的嫌疑。贝克豪斯先生本人借给凤山将军、巡抚桂馥、铁良（朝廷总编修后来是陆军部部长），文连（内务府总管）等看，后来还借给其他人看。凤山还把日记拿给庆亲王看，庆亲王对日记中提到他的内容非常恼火，因为日记中在提到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上持中立的立场，他还对景善这个愚蠢的老傻瓜非常不屑一顾。但是没有一点迹象显示景善因为年老就被那些年轻一代看作老不中用的浅薄之流，这有助于解释他笔下的遗漏和不连贯之处。

第二点，在文献、便笺和笔记中前后还有不断的变化，这些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抄写者出于自己的目的或者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他们最感兴趣的无疑是景善的生活。这就造成各种文献之间的相似性。但是第三种解释，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显得非常重要。据某些人认为，所谓的重复不仅仅出现在某些段落，甚至整个部分。对于那些理解中国文学作品或者文体的人来说，对这些明显的类似，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在官方文件、演讲、甚至关于任何问题的布告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过去的文学和历史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其魅力构成所在。一般百姓和

学者的文体都是在消化并对古典评论家和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评论中形成的。一篇文章、一首诗或者一篇公文,对于作家和过去的思想家来说是否有吸引力不仅仅是文学成就本身的问题,而且是关乎文学品质的问题。目前普遍参考的是过去的准则和标准,谈论过去的实际政治,因此学者和官员的观点都是以古典学家、评论家和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言论来进行论述。因此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认识所谓的“剽窃”问题,也不过是运用古典知识的问题。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或者每一篇公文都是镶嵌着宝石的古代作品。正如格兰尼特所说:“个性与奇迹同在。”这最适合解释以下的情况:只要传统的官吏存在,无论是在公文还是在私人书信中的“剽窃”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最终的结局。

这部日记的可信性因为其智力参与也进一步受到质疑。在朝野经常会有大量的谈论和再讨论、提到和反复提到的问题。例如在给皇帝上的奏折,发给各省总督巡抚的电报,即席的演讲,帝国的抄件和布告,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备忘录被草拟和重新草拟,手抄的文件在最后定稿之前的反复熟读,朝廷的讲话被讨论直到最后自信可以传达下去,上呈朝廷的奏折,里面包含着朝廷布告的草稿,有时也带在身边好几天,在上呈朝廷的时候,可以拿给朋友传阅。因此日记记录在6月10日军机大臣济岫拜访日记作者的时候,给作者看朝廷诏令的草稿,里面有命令断绝与外国人的关系的内容。直到十天以后这篇草稿才再度出现。荣禄在被召见的时候,他提出不太中听的意见之后,济岫才得到朝廷的召见,而且是从他的皮靴中取出草稿并递交上去的。对于那些多嘴的人来说在当时又有多少自信呢?如果景善草草地记录下来其内容并把它记进日记,就能证明他的记录不可信、他的智力参与或者剽窃吗?

很明显袁昶的上奏很大程度上是由荣禄煽动起来的,但是这就说明他很鲁莽,去向朝廷提意见的时候违背了礼仪。对于那

些地位比较高而且受到支持的官员来说,煽动别人上奏远不是什么高尚的行为,因为这些鲁莽的下级官员会受到非正常对待,朝廷对于他们的接待也是出于某种风声。袁昶在上奏中提出不要对外国人采取激烈的行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那种人道地对待德国使节拜伦·冯·凯特勒的态度,使得朝廷对他充满了偏见。他为那道大胆的奏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一定要考虑当时的情况,要注意他们预先打草稿的事实。他们要先打一个初稿然后再进行正式草拟,以备参考和修订,最后再选择合适的时间提出上奏。袁昶明显早在拜伦·冯·凯特勒被杀以前便已考虑了对待外国使节的所有问题,但是直到一周之后他才和许景澄上奏弹劾那些在背后支持义和团的高级官员。这两个人之间不知会面了多少次,他们与荣禄经常谈论事情,他们也许认为可以依靠荣禄。有多少人与他们有利害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严格的信任”是远远不够的。章京,属员,职员,抄写者,甚至信使,贴身男仆和守门人,都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中的任何人都随时准备把消息卖给愿意付钱的人。在那些非常岁月里,尤其是义和团爆发的那一年,当宫廷热衷于密谋之时,当一个党派策划反对另一个党派,一个派系想要搞垮另一个派系的时候,消息的私下流传,消息的传播常常就发生在幕后。因此国家抱怨消息泄露,从而更喜欢以官方法令来保证安全。景善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不仅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而且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他与许多要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记录了这些拜访者的访问,而在日记中的每一页上不用签字,不用付一两银子就得到了朝廷和官方的消息,而且他所接触的这些事情来源都是可靠的。有时他甚至提前得到了这些消息,有时甚至他正在写的那些内容因为某种原因明天才能被发表抑或会被延迟。这些都不止一次地发生,关系着一些重大或不重大的事情。景善不是一个有组织地利用朝廷和官方的消息的人。莫里逊享有很高的声

誉,他在议会里专门签署文件,在所有的事件中都参与了谋划。在西方人的思想中,对于这方面非常松弛,但是在中国的各个部门中,这种“智力参与”并不需要特别的才智。那种认为一些智力参与大多不可相信的话,我们怎么能指望杀死拜伦·冯·凯特勒的报告在他被杀之前能在纽约出版呢?

最后,评论家们抱怨日记遗漏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但是这通常是日记的方式,除非这些日记的写作是为了出版的目的。景善的日记只适合景善自己的奇思妙想,也许考虑到有一大帮义和团众在他家居住,在这关键的时刻,他的想法还是有点温和。

以上所述,主要是针对日记的可靠性,因为要在北京出版,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了这些话题。

北京,1938年12月

目 录

译者序	1
英文版序	1
第一章 叶赫那拉之家世及慈禧之幼年	1
第二章 逃亡热河	9
第三章 载垣的阴谋	18
第四章 首次垂帘	30
第五章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灭亡	37
第六章 慈禧和太监	47
第七章 礼节问题	62
第八章 同治帝亲政及其驾崩	66
第九章 吴可读的抗议和自杀	73
第十章 慈禧成为唯一的摄政者	84
第十一章 退休的慈禧	93
第十二章 1898年的维新运动	104
第十三章 百日维新	113
第十四章 1898年的政变	121
第十五章 慈禧重新摄政	128
第十六章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153

慈禧

统治下的大清帝国

第十七章	景善日记	157
第十八章	纪念二勇士	198
第十九章	慈禧外交文牒拾零	210
第二十章	两宫之西逃	218
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首领之死	231
第二十二章	慈禧悔过	238
第二十三章	朝廷回京	245
第二十四章	慈禧之新政	263
第二十五章	荣禄遗折	275
第二十六章	慈禧太后临终的日子	279
第二十七章	慈禧之死及安葬	291
第二十八章	结论	296
附录		309

第一章 叶赫那拉之家世 及慈禧之幼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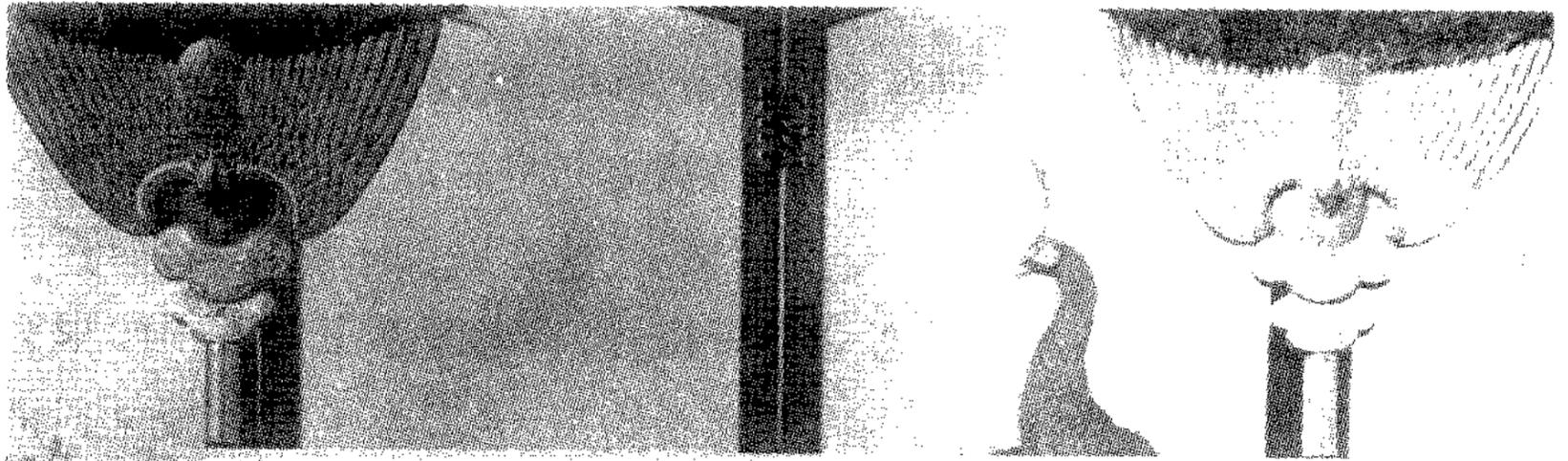
叶赫那拉系满洲最古老的部族之一，贝勒杨吉砮之后裔。居住于长白山地区，与朝鲜毗邻，满洲之真正发祥地。杨吉砮及其族人能征善战，经常侵袭相邻地区富饶之地。1583年，杨吉砮在一次侵袭明朝领地的战役中被杀，死于奉天。其女1588年嫁与清太祖努尔哈赤，并被封为皇后。她的儿子逐步统治整个满洲，年号天聪。

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1月，她的出生注定将影响数百万中国人的命运。她三次垂帘听政，独裁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其父惠征，在八旗中的一旗拥有世袭之位，官职最高不过道台。与其优越的出身比较，他当时的同僚们认为他的仕途并不成功。他死于安徽任上，死时女儿年仅三岁。其妻及全家得到亲戚穆杨阿的照顾，孩子们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穆杨阿之女后来成为咸丰帝的皇后，与叶赫那拉氏共同垂帘听政。

近些年，关于慈禧太后出身卑微、甚至下贱的无稽之谈广为流传。这些多出自八卦报纸，旨在吸引读者眼球。但也有一些谣传毫无疑问源于宫中之人的嫉妒、怨恨和恶意；源于皇长子一支诸王及其他高官。他们中很多人在损毁慈禧家族及其本人方面乐此不疲，意在使叶赫那拉家族“蒙羞”。他们的这些诋毁之言在北京及南方广为流传，并被信以为真。康有为及他人的文章可以为证。

现举一例：其中一个传言听起来绝对真实，出自道光皇帝第五子醇亲王之口。醇亲王自动放弃皇位继承权，但 1857 年欲立其子为皇帝，未被慈禧太后应允。因而，对慈禧怀有怨恨。传言说慈禧太后的父亲死于宁波县职守，留下寡妻和一大群孩子（其中包括中国的未来统治者）。他们生活极为贫困，没有盘缠回京城。若不是幸遇意外之喜，早就沦为乞丐了。原来，一大笔赠与另一位征人的钱误送至慈禧一家所在的船上。此人目睹她们的贫苦，顿生怜悯之心，坚持把钱送给她们。二十五年后，慈禧垂帘听政，该官进京朝见。慈禧忆起当年所受恩惠，将其扶起，称谢。醇亲王的此番言论比起他所编造的其他传说更“有鼻子有眼”：一位满族官员在省里任职时死去，死时极端贫穷。但很不幸，该传说并不真实。确凿无误的是，慈禧的父亲去世时，其妻及家人均未在眼前。他们已经先期赴京，等他早点去就任正白旗的一个新的官职。

在此，先略述一下叶赫那拉家族及其与皇长子一支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自从载垣阴谋失败，慈禧执掌政权后，皇族与这个强大的家族之间一直互相猜忌，摩擦不断。1898 年戊戌政变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尽管慑于慈禧的“圣威”，他们不敢公然与之分裂，但紫禁城内已祸乱潜伏。近些日子，北京发生的事情，尤其是端方因在慈禧的葬礼上傲慢无礼而被罢免直隶总督一事，更显示出满洲人之间存在的分歧及政府在失去慈禧的强权统治后所处的险境。外国人很难弄清皇宫中的实际情况及派系纷争。他们对族系、通婚、立嗣，及古代的世仇等复杂问题感到迷惑不解。但是能够解释清楚的是：皇族（爱新觉罗氏）分为镶黄旗和镶红旗两系，分别为努尔哈赤本人及其祖先的后裔，但都自认为是满洲王朝的至尊。叶赫那拉家族虽非皇家血统（因皇上与某家族中的女子结婚，该家族至多享有“尊贵”之号），但其势力强大，不仅仰仗人口众多，还因为他们已出了三位皇后，尤其是慈禧享有巨大威望，并深得人



大清國當今聖母太后萬歲萬歲萬歲



慈禧

心。如若没有慈禧的临终诏书，叶赫那拉族中的长辈就决定由光绪帝的皇后效法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深谋远虑，立荣禄的外孙子为小皇帝。这样就能够确保不会与慈禧的政策背道而驰。

当时宫廷中长期存在猜疑和不和，原因在于担心道光皇帝的长子辈（以溥伦、恭亲王为首）拥立儿皇帝以后，其父作为摄政王以后会以皇上谥号追封老醇亲王。这在欧洲不算什么，但在中国人眼中，皇族小字辈篡夺皇帝谥号，将老醇亲王与开国始祖努尔哈赤并列，意味着又生出一支新始祖。老醇亲王本人预见到将来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并最终会导致严重祸患，因而小心防范，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点。但中国高层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难逃那些专事观察之人的眼睛：1908年，儿皇帝（即宣统帝）继位后，老醇亲王墓前的祭祀品更加丰盛，场面也更加隆重。官方文件中称其为“二阶”，即在士大夫眼中，其祭祀规格已等同于皇帝。那些颇具议论权威的人一致认为皇帝亲政后，必将进一步赐与其祖父谥号荣誉，包括“三阶”，这就将老醇亲王与开国始祖置于同一地位，可以在寺庙中被祭祀。这在中国人看来，后果极为严重，难以接受。

老佛爷乃一强权之人，在其一生中，她的亲戚实际上凌驾于法律之上，尽情享受着她的庇护，因而他们与镶黄旗、镶红旗之间暗地里常有摩擦，这种争斗经常出现在茶馆及市场等地。慈禧很喜欢压制爱新觉罗氏，曾下谕禁止他们居住在京城的商业区，理由是她听说他们中有人以不光彩的手段赚钱。因而，她绝不会受到各位王爷和努尔哈赤的其他出身高贵的后裔们的爱戴。他们对她既恨又怕，经常抱怨她剥夺了他们的特权。

我们从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看出慈禧对付这些世袭贵族时的高超手腕儿。当时，有一位王公在皇城根下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官邸，从此能看到皇城大部。他的官邸刚一建成，就被老佛爷没收，训斥其大胆妄为，竟敢窥视皇宫，随即将此屋赠与她的

弟弟绍公。

另有一例足见慈禧太后偏袒族人而给地方政府行使职权带来困难。1902年，慈禧逃亡回銮后三年，在北京设立新警署，任命军机大臣徐世昌掌管警署。徐上任后不久即意识到与皇亲国戚打交道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慈禧的三弟桂祥尤为无礼，无视警方规定，指使仆人在道路上任意驱车行驶，此外还有其他不法行为。一次，一位血气方刚的警察逮捕了他的一名仆人。徐世昌听说此事后立即下令放人，但桂祥恼羞成怒，坚持徐本人亲自上门赔礼道歉。不幸的徐世昌三次前去致歉，均被拒绝，直至在院内给桂祥磕头。京城的人推测后来徐氏之所以成为满洲总督，进而当上邮传部部长，1910年又升至军机处，皆与此事及桂祥的权势有关。但后来老佛爷得知此事后，免去徐氏军机大臣之职，不久以后，又打发其去了沈阳。

慈禧太后之母纽祜禄氏寡居多年，住在锡拉胡同，距公使馆很近。慈禧当上太后以后，封其母为诰命夫人。她给人的印象是：很有才能、有教养，甚至在以其女人聪明才智而著称的部族中都很出众。她死后与丈夫合葬，葬于北京城西欧洲人的赛马场附近。慈禧为其父母建了牌楼，立了大理石墓碑，以示孝心。1902年，慈禧乘火车从正定回銮时，拒绝经汉口回京，因该线距其父母之墓很近，如果路经此地而不下车祭奠有违孝道，因而慈禧绕道进京。

关于慈禧的幼年少有记载。只知其童年伙伴中有一个叫荣禄的亲戚。后来，荣禄在慈禧执政的很多危机时刻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据说，慈禧曾与荣禄定了娃娃亲，但此事无证可查。但毫无疑问的是，荣禄对慈禧的影响甚于其家庭或其他高官。康有为等官员认为，早在慈禧的丈夫驾崩之前及慈禧逃亡热河之时，他们两人就一直关系暧昧。

慈禧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慈禧本人天资聪颖，思维敏捷，

再加上其抱负非凡,热衷权力,使她能够凌驾于传统的僵死的教育之上,能够转而学习当今男人们学习的实用的东西。她还能诗擅绘。16岁时,她通五经、懂满文,还学习了二十四史。毫无疑问,热爱知识,此乃智慧之源;她又深谙权术之道,这些都为她不平凡的一生奠定了基础。

1850年,道光帝驾崩,其19岁的儿子即位,年号咸丰。丧期内(27个月),新皇帝不能成婚。期满后,谕诏所有达到结婚年龄的满族美貌女子都要到内务府注册候选。咸丰帝即位前已娶穆杨阿的长女,但她不久就过世了。穆杨阿之次女纽祜禄氏及叶赫那拉氏都在候选之列。1852年6月14日,道光皇后从约60名满洲贵族少女中严格挑选出28名,将她们分为“妃”、“嫔”、“贵人”及“常在”四等。纽祜禄氏被封为“嫔”,慈禧被封为“贵人”。这些宫女与其说是皇帝的妻子,不如说是太后的仆人。理论上,宫女的人数不超过70人,但事实上,远远超出这一数目。宫中还有两千左右侍女和佣人,归太监支配。在后宫,太后的权力最大。虽有先例,皇上可以临幸所选宫女,但在事务的分配或定等级上,均无权发言。

慈禧离开锡拉胡同的家人宫后,便与家人中断了所有联系。有一位在宫中侍奉多年老死宫中的老妇曾说过慈禧入宫后仅省亲一次。1857年1月,慈禧生下儿子后九个月,经皇帝恩准后离宫。一大清早,太监们告知其母,慈禧将于中午时分归家省亲。其家人及朋友得知此荣耀,皆欣喜不已。锡拉胡同的邻居们都出来观看太监们及慈禧乘坐的黄轿子。其母率众家人分立院两侧迎驾。进入内院后,太监们恭请贵妃下轿。慈禧登堂入座。其家人,除其母及长辈外,皆行跪拜之礼。宴席上,慈禧上座,其母下座,以示慈禧为皇子之母的尊贵。慈禧虽在宫中多年,性情并未改变,谈笑一如既往,对家中诸事极为关注,尤其是对妹妹们的教育问题。

宴席持续至傍晚，慈禧回答了很多问题。一月份的白天很短暂，到了日暮时分，太监们请求慈禧准备回宫。慈禧与家人依依惜别，对自己不能常与家人相见深表遗憾，期望日后皇上能够再次恩准她回家省亲，或者说可以准许其母入宫看望她。赏赐完众家人之后，慈禧乘轿回宫，此后，再未回过家。后来，其母经常进宫探望她。

慈禧入宫后，很快获得太后的欢心，不久又凭借其势力和个人魅力成为软弱而又放荡的皇帝的第一宠儿。1856年4月，她为盼子已久的皇帝生下皇子，彻底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慈禧入宫时，太平军起义给帝都带来极大混乱。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慈禧经常阅读各省奏章并向皇上进言，任命曾国藩为统领，出资让他在湖南组织训练队伍。凭此，并在戈登将军的帮助下，曾国藩平定了叛乱。按惯例，当时曾国藩之母病故，他正丁忧在家，不宜服役。但慈禧显示出了掌控形势和摆脱传统羁绊的才能，在朝廷危难时刻，表现出了果断的决策能力，她坚持认为遵守古制应该服从于朝廷的需要，以国事为重。

1855年8月，太后薨，慈禧因平日“尽心服侍”被晋升为嫔。同时，钮祜禄氏被立为皇后。

当时，中国士人一致认为咸丰统治即将结束，清王朝即将崩溃，“天命已绝”。全国暴乱不断，皇帝本人软弱无能，花天酒地，有失民心。在士大夫眼中，咸丰帝昏庸放荡，不学无术，不及光耀史册的五位先帝。他也不能效仿前人，编纂巨著和典册，留学者之名。而且，他虽已二十五岁，尚无子嗣，而其先祖十五岁前就有了皇位继承人。因而1856年4月，当慈禧生下皇子，叛军被逐出湖南和江西时，人们都觉得乌云散去，上天重新眷顾他。

此时，咸丰帝全身瘫痪，重病不起。慈禧以嗣君之母的身份，更以其帅才风范，成为大清帝国的真正统治者，而皇后钮祜禄氏对政事毫无兴趣。事实上，慈禧已升至一等“妃”，京城之人称之

为懿贵妃，“懿”字为荣誉称号，意思为“贤德”。

该时期，她在外事方面的进谏多为强硬性的，这与其幼年家世、尊贵的种族及对外国及其资源的一无所知联系起来，便不足为奇了。额尔金占据大沽，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前去劝其退出大沽，未果，耆英被谕令以绸带自尽。这在高傲的慈禧看来，尚是朝廷的仁慈。

皇上拒绝广东官员叶名琛与英国洽谈贸易经商事宜亦为慈禧主意。据当时史册及日志记载，皇帝的看法及行事均不被重视，京城及帝国诸事皆由慈禧一言定之。这在女性无权专政的国家，实在耀眼，况且，此时慈禧仅是一个妃子，刚刚 22 岁。

慈禧太后有数个名字及称谓。为避免混淆，我们在此略作说明。叶赫那拉是慈禧的家族姓氏，慈禧选秀女时用此称呼；升至皇后时仍用此姓，但人们常称之懿贵妃；与皇后共同执政后，被朝廷赐号慈禧。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荣誉称号。当时的人称之为皇太后，或老佛爷。这个称呼在北方广为使用，直至临终。

第二章 逃亡热河

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北部的历史和原因,大家都非常熟悉,在这里就不再重述。但是在逃亡热河前后叶赫那拉在那些动乱年代中所起的作用,欧洲人不太熟悉。现在把翰林院侍读学士吴可读的日记摘录下来。这篇日记名字叫《罔极篇》(此篇尤可注意),以纪念他对皇帝之忠诚,间接涉及英法联军之所为,及叶赫那拉之个性,里面穿插着吸引人的诚挚之情。叙述本身充满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庚申七月,自慈亲得病起,五六日间,即传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内外一切章奏,概不发抄,以致讹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犹未能徙也。时皇上方病,闻警拟狩北方,懿贵妃与僧王不可,且谓洋人必不得入京。

初一日到初十日,慈亲得腹泻之症,初谕家中人,不令不孝知。不孝由署回寓,偶见几上药方,始知病状,然犹以为年年偶犯耳。即令请刘医诊视,以平日多用疏通剂见效,故听其用药。不孝本不信刘医,因自咸丰三年至今八载,宅中自慈亲以次得病,请去一诊,服药即见功效,以故慈亲及家中人,无一不深信刘医者。孰知祸胎即兆于此乎。呜呼!昔人谓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不孝不知医,以致遭此大难,

祸及慈亲，虽百身亦奚赎乎！此十日内，稍稍有迁徙者，缘海口接仗失利，我军伤亡，且伤一总兵官。北塘兵溃，炮台为夷人所有，僧邸奉旨不令接仗，以故坐困海口。外间未深悉兵败之故，故消息不甚紧迫耳。

七月十三日，不孝见慈亲病势有加无减，心中焦灼，即请假两天。我不让之知政治形势并促之不必担忧。但消息一日比一日更糟，成千上万之人开始离开京城。

次日，长官李敏斋访予并告离别，其重要参加淮军。其极不悦刘之处方，亲自为予开一药方。慈亲不愿服药，予故劝之。夜慈亲忽觉气短，予速请李医，李医言与其药无关。慈亲定要服刘医之药，我所能为即促之混合两药食用，以延慈亲之寿命。

慈亲感其去日将近，嘱予备棺木。所幸八年前在奉天买一棺木，并置京城一家棺材店中，由此取回棺木。家人命木匠于后院制作，至二十日，棺木始毕。木质尚佳，灌表结实。予不期此动乱之时能做出好活。木匠言以今之棺木制作于京城耗费至少一千余两。价钱颇贵。

次日上午漆店徒工首次刷漆，所用之漆约两磅。予又遣裁缝并六位帮手置办丧服。我亲自做一孝袍，次日，见慈亲气色尚佳，予决推迟制作孝袍。今颇有传言洋人已进通州，将于二十七日炮轰京城，故人人弃城逃亡。二十七日漆棺木二遍。

当日，我军抓到巴夏礼并八名洋人，关入刑部监牢。全城骚乱，盛传太后将巡幸北方。懿妃劝皇上留京，不发一诏。满汉官员皆转移家庭和珠宝，但街上店铺照常营业。慈亲病情不见好转，予又请假十日。

八月初一日，予再请人为棺木刷漆。当日刘医为慈亲换药，但病未稍减。

初四日慈亲叫予至其床前，嘱咐早为葬仪之备，言：“吾

病不起。着碑葬礼。今日吾弗能进食。”予心如刀绞，命裁缝速置丧服并孝袍。吾友潘玉式来访并荐一泻剂，慈亲甚为恼怒，拒绝服用。夜间慈亲呕吐不止，疼痛稍减，予命裁缝速置丧服。次日晨孝袍已毕，慈亲言领重，予为之一轻丝领。慈亲言过为贵重，并声称婆婆公公并未曾用之。京城大乱，人群拥挤，以防洋人入侵，城门禁闭，但城南之昌仪门尚开。

初七日，清军与洋人在齐华门外大战。军队皆由未受训练之蒙古军组成，从未上过战场。洋人未开枪便望风而逃，将军銜撤下，任由后面的步兵践踏。许多士兵被践踏而死，一将军也在后面溃逃，清军四散逃亡，洋人紧逼城下。

亲王及大臣请求懿妃让皇帝上路。太后已迫不及待，但懿妃劝两个军机大臣上奏阻止，并下发诏令皇帝誓与京城共存亡。懿妃又下一谕杀一洋人将得到重赏等语，故人人皆以为出巡之举，已中止矣。

次日早，闻齐化门接仗失利之报，圣驾仓皇北巡，随行王公大臣皆狼狈不可名状，若有数十万夷兵在后追及者。然其实夷人此时尚远，园中毫无警报，不知如何如此举动。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踏。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慈亲泄仍未止，商之刘医，将杨剑芝方试进半剂，连进两剂，稍止。后复不能止，从此不起矣。呜呼！十二日早间，慈亲大泄不止，再进固涩之药，已不能咽。急将李裁缝叫来，艰难赶衣服套好，所有应用鸡鸣枕并被褥等物，速为料理。至是夜亥时，竟弃不孝而长逝矣。呜呼痛哉！抢天呼地，究竟何益，自恨素不谙医，为人所误，此罪万死不能赎也。不得已，饮泣料理一切，先将中衣命内子等穿好，上用套好之白绉大衫，灰色绉夹袄，蓝缎棉袄，天青缎锦褂，上用蟒

袄霞帔，补服钉在霞帔上，加上玉带，挂上琥珀朝珠，将金扁簪扎在头上，然后戴上凤冠，用大红表里褥子铺在床上，将慈亲安顿稳妥，头枕鸡鸣大红缎枕，安在上房正中。是日家家闭户，并无相好一人到宅者。

十三日，先将棺内拭净，用大红洋布八尺铺在底上，用薄薄一层土子灰，将洋布裹着灰，使灰不粘棺上，用天青缎长垫套在星板上，然后将表里大红缎褥款款盛往入棺。周围上下，用通草包垫好，使不能动，盖上绸里面大被，然后将大红表里被盖上，子盖紧紧扣住，于是日申刻封棺讫。

是日街上荒乱，一朋友来宅劝说将母亲暂时葬于城外一寺庙中。言此不安全，以为在宅堂葬。况夷人多疑，一入京城，家家必须搜刮。倘彼疑其内系金银，而将挖出母亲之棺材。前入广东省城，亦是如此，不可不虑。

十四日，彰义门开，不孝步行到一寺庙，见正房尚空一见，和尚许我租用。回宅后，拟将灵柩送去暂安。不孝守住慈柩，将眷口送至霸州门生处。是日只开西便门两个，顺治门和前门关闭四天后，来往之人流将顺治门围得水泄不通。然小生意及手艺人虽以尽走，而大生意各行尚未移动也。

十九日，用人将慈柩送至寺庙安顿，不孝步行出城，是夜觉得城外比城内安静多多。二十三日出门，人数稀少，见街上一群人，俱作耳语。至午后，忽西北火光烛天而起，哄传夷人已扑海淀圆明园一带矣。我兵数十万，竟无一人敢当者，夷兵不过一千马队耳，如入无人之境，真是怪事。僧邸胜帅兵已退德胜门外。

至二十四日以来，京城店铺皆关闭，车价愈贵，移徙者愈多。即下至贫民，亦用推车或驴头装载出京。是日恭邸差弁到夷营送愿和照会，该弁行至夷营，见其持枪相向，掉头驰回。

二十四日下午，城西北见烟起，缘夷人到圆明园后，先

将三山抢劫一空，复用火焚烧，藉口乱兵烧毁。复出告示张挂各处，若和议不定，准于二十九日午刻攻城，居民务须远避。以致居民愈恐，无一不思出京者。

是日车驾已安抵热河，皇上下谕，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传言皇上有病，而亲王载垣及端华谋摄朝政，若皇上崩，则懿贵妃等将为皇太后。但贵妃与载垣等有隙，诸人多谗贵妃于帝前云。

不孝日在庙内慈亲棺木停处，探问外边夜间情形，俱言安静无事，惟日日过兵，庙内却未住兵。二十九日，荣儿进城来，言庙内已被天津兵丁住满，不孝急到庙内，俱是胜帅手下之兵。惟时僧邸距庙甚近，倘一炮轰，俱成粉碎。况慈柩更为不妥，乃雇佣手推车数辆，每辆六金，可到保定府，随定四辆推车，装载行李。

是日夷人已于午刻进安定门，住居城楼，并城门洞内，安大炮一，小炮四，口俱向南，插五色大旗。城中自一二品大官，无一不于是日出城，在城内者，惟当事数人而已。是日大臣等已将巴夏礼等以礼送归夷营矣。洋人方至营，而热河急诏至，命恭亲王尽杀之，以示不屈之意。懿贵妃既主持杀洋人于前，则此次之诏，或亦贵妃之意也。

九月初一日早间，彰义门未开，不孝坐车到西便门出城，人车拥挤，不能行走，不孝令车后来，自己步行出门，几乎碰杀矣。随到庙内，令其将行李收拾，将做成蓝布锦棺套自己套上，正合适之至。不孝进城料理一切，到杠房告知，定于初二日起身，推车者也送给起身消息。是日城外慌乱之至。自二十九日，梁海楼司农亦携如夫人与行李到庙居住，至初一日，尚未入城，朝中大臣可知矣。

初二日早起，不孝即出城，时杠房人夫并推车已到，即将推车装行李四辆，并无人坐，地步随将慈柩用八人抬上，言明

系龙杠，临时受其愚弄，竟未用中心大杠，只用小杠八人杠抬。不孝一时匆忙，未及细看，业已起身，即令内子并三弟妻金印坐自己单套轿车，荣儿步行随起，仓皇起身，狼狈之状，惨不可言。不孝亦不忍多睹，只得听其如此，惟慈枢总要求妥当，余均在不计。打发起身后，一路步行回城。思想荣儿十五岁，并未步行上过路，倘慈亲有知，亦万不忍其受如此苦楚，遂雇车一辆，令龚三拉纤追赶，幸是日出城矣。回宅后，彻夜思量，慈枢并未用大杠，未免抬上时颠簸过甚。

初二日一早，到杠房大闹数次，伊总言换杠而行，及崔荣等由保定回京，据言并未换杠，路上也未接得信函，杠房可恶之至，然已上了他船，无可如何。且据荣儿来信并崔荣说，一路杠头陈姓很操心，灵枢走得平稳之至，并不见得颠簸。到保定后，将毡套层层揭开，棺木并未受一点磨擦。自初二日，慈枢及眷口起程后，京中夷人已入城内，讹言四起，人人自危。内城旗人未经迁徙者，至此均将眷口移至南城店内居住，流离颠沛之状，目不忍睹。有御史某上奏言奸人荧惑帝听，仓皇北狩，弃宗庙人民于不顾，以至沦陷于夷，请速回銮云云。自初间起，日日闻得与夷人换和约未成，或由恭邸不肯出见，或因夷人所说难从，总未定居，居民愈觉不安。初六日，英夷来照会云，我国太无礼，致将伊国人虐死五人，索赔银五十万两。适俄夷也来照会，闻得夷人索赔五十万金，伊愿说合，令我们少赔。恭邸以此事即使说合，亦不过少十万八万，又承俄国一大人情矣，随托言已许，不能复改谢之。俄夷又照会云，既已许赔五十万，自不必说，惟英国焚烧园亭，伊亦愿赔一百万两，前索二百万，减去一百万，只需一百万，便了事矣。恭邸答应于初九日送去银两五十万两，是时夷人所添十六条，无一不从者。当事者唯求其退兵，无一敢驳回，于是夷人大笑中国太无人矣。呜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懿贵妃闻恭王与洋

人和,深以为耻,劝帝再开衅端。会帝病危,不愿离热河,于是报复之议遂寝矣。

读以上翰林学士的日记,可以看出当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咸丰帝无决断国事的能力。慈禧下了一道严厉的谕旨,严饬统兵大臣决战:近畿州县,整团阻截,悬赏杀敌,通谕中外。这是咸丰十年八月初三日即1860年9月6日的事情。她所下的谕旨说:

我朝一视同仁,不分中外。自与英法通商以来,数十年中,相安无事。乃三年前,英国无故侵犯广州,拘执朝廷命官,当时朝廷以叶名琛固执不通,亦有启衅之咎,故大度包容,不与深较。二年前,夷酋爱尔近竟敢称兵北犯,朝廷命直隶总督谭延襄相机议和,该夷乘我不备,袭南大沽,进迫天津。朝廷恐兵联祸结,殃及百姓,又遣及桂良往与议和。虽英夷无理要求,仍命桂良前往上海,与议通商条款,并允早日批准。此皆朝廷怀柔远人,不肯轻开战衅之苦心也。乃其酋爱喜略复于八月以兵舰攻大沽,僧格林沁败之,该夷始退。夷酋反复无信,实为狡诈已极,朝廷以不忍百姓受害之故,许其亲来议和。而该夷所至焚杀,袭占大沽炮台,朝廷虽怒其无理,犹以息事宁人为念,复命桂良前往天津,谕以苟该夷要求条件,不至十分出于情理之外,亦可酌量俯允。乃该夷不但要索赔偿兵费,开辟商埠,并欲驻兵京师,万难允从。又命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等前往晓谕,而夷竟犯通州,要求带兵晋见,实不能再事姑容。已命大军明申天讨,近畿人民,宜速办理团练,帮同杀敌,或自卫乡里。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斩黑夷一名者,赏银五十两;斩白夷一名者,赏银百两;获斩头目者,赏银五百两;击毁夷船一艘者,赏银五千两。广东、福建为英夷占踞之地,该地百姓仍

为朝廷赤子，有能杀敌立功者，赏银五千两。该夷远处重洋，其来中国，不过图通商之利，所以敢于称兵犯禁者，必有奸人从中蛊惑。嗣后，英法两国之人，一律禁其通商，其他国家，仍不禁止。朝廷用兵，出于万不得已，如该夷能悔过输诚，仍许通商，以示朝廷始终仁爱云云。

这道诏书下了三天之后，皇帝召见军机，叶赫那拉也在场，发布以下声明：

谕美国所请各条，已皆允许，尚不知足，欲来京亲递国书，且欲使僧王退军张家湾，此等无厌之求，万难允准。僧王已得一胜仗，现在守八里桥，抵御敌军。

后又下谕旨命令锦州附近敌人兵船想上岸之兵队，都要一律阻止其登岸。

是月初七日，皇帝祭祀孔庙。但是第二天上午，皇帝尽管希望向祖先的守护神表示忠诚，但他害怕从颐和园进入城内，于是通知大臣们他打算离开京城。第二天一早任命恭亲王为全权议和大臣，办理和局，载垣被撤去钦差大臣，尽管他在谕旨中词气勇敢，但在向宫殿底下的小庙中的战神行礼后却从京城逃了出去。皇帝在诏令中宣布离开京城，并把自己的逃亡描述成“秋巡”。

皇帝开始走的时候，非常仓促，行了十八英里，就先在一个小庙内停下来。在这里下了一道谕旨，命令所有的满洲军队赶往热河保护朝廷。第二天接到了恭亲王的一道奏折，报告洋人入城之事。皇帝命令他见机行事，朝廷距离太远，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换句话说，就是他要把全权交与恭亲王。

十一日，朝廷到了密云县北，驻于行宫。据中国人记载，说皇帝因为有病，不能亲自接待军机大臣，由慈禧召见军机。慈禧下

了一道谕旨,内容如下:

夷人进犯都城,王公大臣等,均请调集各省援兵,俟大兵云集,可操胜算。夷人所恃,唯在火器,若短兵相接,则非中国之敌。蒙古满洲之马队,与夷人开战,失其所长。湖广、四川之兵,便捷如猿,可用暗袭之法,以制夷人。着湖广总督选精兵三千,四川总督选精兵数千速来京师。僧格林沁已败绩数次,京师甚为危险,勿得稍迟。朝廷甚盼各省援军齐集畿辅,迅扫敌氛,有能忠勇杀敌者,不惜重赏云云。

朝廷的队伍走到长城附近巴克什营地方,得到僧格林沁的一道奏折,说在北方附近,见有洋兵间谍,但还没有以炮攻城的事情发生。皇帝又下了一道谕旨,谕旨的内容如下:

法夷爱喜略送来照会,在京竟与恭亲王面开和议。今着恭亲王留京,主持议和之事,如该夷带兵入京,则着僧格林沁断其后路。如京师危急,即着蒙古军队,速来长城护驾云云。

十八日朝廷到达热河。二十日,诸臣仍要求皇帝不惜与之开战。皇帝又下了一道奏折说:洋兵胆敢占据圆明园,已抓洋兵,不许恭亲王释放。恭亲王复奏云:安定门已为洋人所有,不能抗拒,只得独断而行,而帝亦不能不听从诸臣,与外国人议和。九月十五日,帝在和约上签字,并下了谕旨如下:

谕内阁,恭亲王奕訢奏英法两国互换和约一折,英法两国,业经朕派恭亲王奕訢,于本月十一、十二等日,与换和约,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所有和约内应行之各事宜,即着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

第三章 载垣的阴谋

咸丰帝本来打算在 1861 年春季从热河回到北京,并且谕旨也已经下了。但是 1 月,皇帝的病情十分严重,不可能回京,于是就又下了一道谕旨,收回之前所下谕旨。

皇帝在热河,想从其弟弟们的手中权力夺回来,但是由于疾病而无能为力。皇帝逐渐为怡亲王(载垣)所左右,同时还有军机大臣亲王端华和皇族肃顺。这三个人,知道皇帝末日为期不远,有必要进行摄政,就决定窃揽大权。怡亲王是这次阴谋的领导者,但是煽动者和灵魂人物是肃顺。端华是郑亲王,为满洲八王之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直系后裔。肃顺是郑亲王远房兄弟,其年轻的时候奸诡便捷,斗鸡走狗,乃一市井无赖,人人知道。由于两个亲王在皇上面前的引荐,很快深受风流皇帝的信任和宠爱。由户部的一个下级官员,迅速升职,最终成为军机大臣。在职期间他贪婪残暴,无所不为。因为劝说皇帝将军机大臣柏葭斩首而招致众怒。柏葭公正立朝,言语诚直,因之得罪了怡郑二亲王,他们逼杀柏葭,是出于报复。肃顺与年轻的慈禧发生冲突,因为慈禧看到肃顺为皇上所信任,权势日大,想削夺他的权力,所以竭力营救柏葭,但是没有成功。肃顺的地位因为慈禧的失败而日益巩固。所有那些反对他的人都被逐出朝廷或者贬官。朝廷内外人人感到恐惧,尤其是他们认识到慈禧得不到支持,肃顺却

能经常使他们感到自危。一日，户部发生了舞弊的事情，肃顺严办此案，斥革大小官员无数。当时京城中的弊端极多，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见怪不怪，而肃顺这一举动，并不是整饬官制，剔除积弊，而是假公济私，意存报复。在审判中，他拘捕了一百多位著名的富商，并对他们毫不仁慈，所以得到的贿赂特别多。他又用聚敛的财富结交二位亲王，使得他得揽大权，与他们密谋，最终使自己走向毁灭。肃顺伏法后，其家产都被官方没收，被慈禧秘密珍藏，义和团叛乱时，藏到密室以后，慈禧才离开京城。

英法联军侵入京城，咸丰帝逃往热河，都是肃顺的主意。当时慈禧与各位大臣一同进谏，皇帝不听，肃顺又上一道奏折，不允许各位大臣护随，这样他就能实施其阴谋。他计划非常周密，实在令人畏惧。所幸慈禧一人，有非常之勇气和智力掌握了当时形势，在最关键的时刻挫败了肃顺的阴谋。当皇帝宾天而肃顺的策划还没有进行之时，慈禧派信使通知恭亲王迅速赶往热河，在荣禄和其他忠实奴仆之帮助下，她迅速执行自己大胆的计划，挫败了肃顺等人的阴谋，成为清政府的首脑。阴谋被揭穿，三人落于慈禧之手，宗人府接谕命严行审问。肃顺责备二人说：“若早听余言，戮杀此妇人，何至今日乎！”

先是怡亲王看到慈禧为皇帝所亲信，所以要想成大事，必先去慈禧之权。于是就日夜在皇帝面前谗言说，慈禧与侍卫荣禄阴怀诡计，荣禄是一个二十五岁、长相英俊的小伙子。东后性情温和，不近政治，他们对她没有放在心上，如果他们的计划要想成功，慈禧无论如何必须被逐出朝廷，或者至少被打入冷宫，而后不服从的可耻的宫妃就会被孤立起来。他们深知，这一切计划必须在热河下手，皇帝回到北京以后就危险了，因为那些官员不可能一直呆在皇帝身边（甚至那些皇帝的近臣），慈禧就会处于有利的地位，在其他太监的帮助下，就会获得权力。所以就引乾隆时某位妃子故事，因为失礼于母，定以永久监禁之罪。他们经

常以这样的谗言告诉得病的皇帝。皇帝不能不为所动，于是将慈禧之子交给怡亲王福晋抚育，想让他离开母亲，怡亲王福晋被召到热河，便是为了此事。接着他们又谗害恭亲王，说他联合洋人，以制朝廷，而且权力太大，必须提防他。

肃顺又进一步设计要尽杀京城中的洋人，并翦除咸丰的弟弟，即使不杀也要永远监禁。诏令已经草拟好了，当时皇帝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三人定好计谋在皇帝宾天时，就下这道谕旨。但有一件事情，为三人所料想不到的，最为重要的印玺为慈禧所掌握，上面的印文是：“世传受命之宝，凡嗣皇继位，第一次谕旨，必盖此印。”这是清朝的法度所规定的，也是大行皇帝的遗旨。向来皇帝都把印玺带在身上，现在为慈禧所掌握，其聪明有远见如此，而这是三人阴谋不能成功的一大障碍。如果没有这个印玺，无论如何假造圣旨，最终都是不合法的。怡亲王胆量不足，不敢冒险夺这个印玺，所以他成不了大事。皇帝听说载垣等谗害慈禧和荣禄的话，非常愤怒，再加上热河夏天的暑气，因此病势更加严重。京城中的太庙祭祀也不得不由恭亲王代替。六月初四，在皇帝三十大寿之时，钦天监上奏说星星出现了异常，皇帝亲自复奏曰：

上月，钦天监奏彗星见于西北，仰惟天象示警，方滋警惕。兹复据奏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自非虚词附会。惟朕御极之初，即以侈言祥瑞为戒，矧值东南贼匪未克见谄除，眷念民生，惟增矜惻。即使星文表瑞，实为世运亨嘉之兆，亦惟有夕惕朝乾，冀邀上苍眷佑。如逆匪速就荡平，黎民复业，年谷顺成，休应孰过于斯，其不必宣付史馆，用昭以实不以文之意。

第二天上午皇帝三十万寿节，皇帝接受诸臣的朝贺，没有让慈禧参加，这是皇帝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从此以后皇帝的病情日重。

七月初七，慈禧密派一人到京城告诉恭亲王，皇帝病危，速

派一支兵马来热河，其中大多是叶赫族人。国事转瞬即变。

十六日，军机大臣各部大臣凡载垣之私人，都到皇帝寝宫里去，皇后和各个妃子都必须回避。他们迫使皇帝在草拟好的谕旨上签字，以载垣、端华、肃顺三人辅政。但印玺掌握在慈禧手中，这些都是空头谕旨，不合法。十七日早，咸丰帝宾天。遗诏宣布，命载垣等辅政，没有提到后妃和恭亲王。

此后又以继位的皇帝名义下登位的诏书，这时继位的皇帝才五岁。三人知道谕旨不提到母后，于祖先的先例不合，恐怕再产生意外，到了第二天，又下了一道谕旨，尊东后及慈禧为太后。中国的编年史家说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得不承认慈禧为同治帝的生母。而热河满洲军队都对慈禧表示同情，这是他们所不能不顾虑的。他们想等回到北京以后，除掉这最后的障碍。而他们在京城中的势力，还不能稳固，不敢先动，只要慈禧一天在位，则他们一天就不会安全。他们急着想知道，京城中和各省对于监国的意见怎样。载垣接着以赞襄王大臣之权，替新皇帝下了几道谕旨说：辅佐幼帝，乃赞襄王大臣之责，赞襄王大臣之中，领班一人监国云云。监国者，唯帝之伯叔兄弟能居之。

这些谕旨，传到京城，各大臣及都察院各谏官，纷纷上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没有参与谋划的恭亲王即咸丰帝的弟弟，始终与慈禧秘密通信，都尊慈禧为朝廷之主。恭亲王劝慈禧赶紧催促各王大臣护送梓宫回京，以免孤立无援，做这样的事情时必须安全谨慎，不可过于着急。因为有已故大行皇帝的妃嫔数人，已经与载垣等联合，所以侍卫也听他们的调遣。肃顺财产和权势日益增长，所以他贪婪专横，为京城中人所痛恶。那些趋炎附势之徒，也都非常支持他，用金钱来收买其党人。肃顺在北京所起的反面作用在各方面都很大，所以最终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当时皇帝家族颇受偏见，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密谋者蓄意已久。京城被洋人所占据，许多省都处于激烈的叛乱之中，百姓

们希望统治者能够有所改变。篡位的摄政者们对于国事的成熟的经验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慈禧在荣禄和其他忠实的追随者的帮助下,不久就将国事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形势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曾国藩捷报频传,不久克服安徽安庆,这些对她的事业来说都是个好兆头。她的勇气和政治才能使她打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直到阴谋者没有机会赢得时间和朋友。但是她的目的和抱负被她的朋友所告诫,根据王朝的法律,禁止太后干预朝政,在顺治和康熙朝时,不得不依先朝先例以大臣辅佐。在这两种情形下,太宗皇帝在朝廷上没有发言权。以大臣辅佐的先例,最终被看作不幸的,因为康熙时几个少数的摄政大臣不是被逐就是被迫自杀。也许是恭亲王为太后的主张所煽惑和支持,他不欣赏慈禧的权力和性格,但是相信女人摄政,他就能掌握最高权力。

当最危急的时刻,太后与荣禄密商,非常谨慎,害怕三人稍生猜疑。太后有一个太监,名叫安得海,深得信任,每日递信给恭亲王。慈禧一行人能一直到达京城不受阻碍,都是安得海的功劳。慈禧对待怡亲王等非常冷静,谦虚有礼,免除他们的猜疑之心。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垂帘听政,奏中引大行皇帝遗诏,可为两宫垂帘之证。八月十一日,赞襄王大臣会议以后,对此严加申斥,载垣等又以幼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大行皇帝的灵柩于下月初二日运回京城,这是慈禧太后日夜所盼望的事情。由热河行宫到京城,大约一百五十英里,赞襄王大臣不得不亲随护送。灵柩非常重,由一百二十人抬着,而且一路上多是山路,行动非常迟缓。每行十五英里,就必须停下来歇息,所以赞襄王大臣等回到京城,最快也要十天之久。如果遇雨,十天还不能到。灵柩队伍行动得愈慢,愈合两宫的心意,因为两宫不随大队,以快班轿夫兼程而行,五日即可到达京城。按照清廷的礼节,凡是大行皇帝灵柩开始走的时候,新即位的皇帝及后妃等都要行礼奠酒,行完

礼之后,才能先行,以便在京城恭迎。慈禧认为这对自已非常有利,可以先到京城,与恭亲王密商一切,以欢迎并接待他们。

载垣和他的同僚也深知,留在后面,将对他们大为不利,前途万分危险,遂决定在路途中将两宫谋杀掉。下令以怡亲王侍卫兵丁护送后妃,他的计谋非常毒辣,若不是荣禄听说此阴谋,预防其变,则两宫皆不能在京城生还。荣禄带领一支兵马,于夜间离开梓宫,星夜前行,以保护两宫。追及两宫于古北口之北,由此道可通往蒙古,载垣等人预先埋伏在此处。

两宫离开热河后,大雨滂沱,道路泥泞,被迫在山峡中避雨,此处毫无供给。梓宫在后,约十英里远。怡亲王等以谕旨回答了她,说梓宫已经安全到达第一站驻歇之地。慈禧赏使者一千两白银,以报答他们的辛劳。怡亲王等也深知前途危险,两宫只要在,则一日不得安。他们曾经上了一道奏折,慰问两宫太后挂念梓宫的诚意,慈禧答书奖其忠诚称职,彼此以礼往来。这两封书信已载入官书,可见满人与汉人相同,无论情形如何危急,外表的礼节依然如故。这两封书信可作为最重要的证据,在义和团运动时,亦是如此。

雨停后,两宫继续前进。有了荣禄军队的保护,安然经过山口,此后再也没有危险的地方。两宫于九月二十九日安全到达京城,而梓宫需要晚三天才能到达。两宫到达后,就召开秘密会议,咸丰帝的弟弟及大臣皇室之中倾向自己的人,都参加了会议。密商了很久,慈禧虽然掌握着最重要的印玺,但以前无捉拿扈从梓宫大臣这样的举动,如此鲁莽,不太尊敬大行皇帝,而且又是新皇帝刚刚登位,尤其觉得不合适。会议后,大家的意思都认为应当谨慎秘密地行动,不可操之过急,外面一切,仍遵照礼节而行。等到梓宫到后,先撤去怡亲王等赞襄王大臣名号,再相机行事。

梓宫于十月初二日早晨安全抵达京城西北门,恭亲王已经于前一夜派部队驻扎在此守备,幼帝、两宫太后及大行皇帝的弟弟们、各大臣等皆穿着孝服出来迎接。梓宫入城时,大家都跪在

地上行礼，梓宫之前，为神主仪仗等，此外还有一支满洲骑兵在后面跟着。怡亲王和各位赞襄王大臣护送梓宫安全到达京城，又亲自陈奏，这是应该的礼节。城内先建造一座营帐，预备行礼时用，怡亲王到后，就到了这个帐中。两位太后率领，幼帝及军机大臣桂良、周祖培等都在。

慈禧神色镇定，以太后的身份，对怡亲王说：“东后及予皆深感汝等其他同官，护送梓宫，颇能尽其职分，今日大事已毕，监国之名，即可销去。”怡亲王听后，厉声回答说：“予之监国，乃大行皇帝遗命所授，两太后无权收去之，皇冲龄，非予允许，无论太后及何人，皆无权召见臣工。”

慈禧回答说：“我们走着瞧吧。”接着直接下令让侍卫将三位摄政大臣逮捕。皇室人员等梓宫一到，赶忙去迎接，因为无论情况如何危急，在中国首先考虑死者。这三位被处理的摄政大臣只有静静在后面跟着。他们反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沿途跟随着效忠于慈禧的军队。慈禧完全取得了胜利，从根本上说是她获得了取胜的镇静心态。这是她第一次尝到最高权力的味道。

接着慈禧发布了以下诏书，上面盖着最重要的玉玺，证明自己权位的合法性。

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议。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

实天下臣为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唯思伊等系顾命大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政；又请于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议，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唯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着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办，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等辜负皇考深恩，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如何垂帘着仪，一并会议具奏。特谕。

两宫在东华门对梓宫行礼敬送，暂时安于殿中。慈禧看到京城人心平安，军队忠诚，于是就大胆地做事。又以东后和自己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着将逆谋三人交宗人府审明严办。关于审问的事情，以恭亲王为主，褫去三人的官号，这是多年来慈禧第一次实施报复性的独裁。其谕旨如下：

兹于本日，特旨召见恭亲王，乃载垣等肆意不应召见外臣，擅行阻拦，其肆无忌惮，何所底止。前旨仅解任，实不足以蔽辜。

这三个人中，慈禧太后最恨肃顺。在热河时，肃顺的妻子，曾经得罪了慈禧，所以慈禧深深记在心上。第二天早晨，慈禧专门针对肃顺下了下面一道谕旨：

前因肃顺跋扈不臣，招权纳贿，种种悖逆，当往降旨将肃顺革职，令将该革员拿交宗人府议罪。乃该革员于接奉谕旨之后，咆哮狂肆，目无君上，悖逆情形，实堪发指。且该革员恭送梓宫，由热河回京，辄敢私带眷属行走，尤为法纪所不容。肃顺所有家产，无论在京亦或是热河，太后悉没之，决不容有任何同情。

肃顺被查抄出来的家产根据最低的估计也值数百万英镑，慈禧太后获得了他的全部资产后，一下子就从战争中恢复了元气，她储藏的财富成为她以后雄心的最主要的物质基础，也是她权力的主要来源。在满洲王朝的历史上，唯一一个据记载比肃顺富有的是乾隆时期的军机大臣和珅，他的财产都被继位的嘉庆帝没收。

但是慈禧的怒气还没有平息。她的第二道谕旨是第二天下的，明显地带有刚学到的本领的特点，大凡家庭主妇都喜欢积累财富且保护自己的财产，慈禧也不例外：

肃顺于热河盖造房屋，年余尚未完工，所蓄资财，谅必不少，着将该革员所有热河财产，密速查抄候旨。该革员身攬重罪，虽保不于事前寄顿，并着传谕，将寄顿之处，悉为指出，一律查抄。倘敢于挟同隐匿，不吐实情，将来别经发觉，定当如肃顺重治其罪，不能宽贷。

十月初六日，恭亲王审明载垣一案，奏明太后，请下旨定夺。

太后于是下一谕旨，以定三人之罪，谕旨如下：

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定拟载垣等罪名，请将载垣、端华、肃顺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等因一折。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情形，均经明降谕旨，示知中外。至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等事宜，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并于昭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主情形，不一而足。且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存离间，此载垣、端华、肃顺之罪状也。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于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构衅，此又肃顺之罪状也。一切罪状，均经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面谕议政王军机大臣逐款开列，传知会议王大臣等知悉，兹据该王大臣等按律拟罪，请将载垣、端华、肃顺凌迟处死。当即召见议政王奕訢、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瑛、惠亲王、惇亲王奕詝、醇郡王奕譞、钟郡王奕诘、孚郡王奕德、睿亲王仁寿、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刑部尚书绵森，面询以载垣等罪名，有无一线可原。据该王大臣等仝称，载垣、端华、肃顺跋扈不臣，均属罪大恶极，于国法无可宽宥，并无异辞。朕念载垣等前后一切专擅跋扈情形，实属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独欺凌朕躬为有罪也。在载垣等未尝不自恃为顾命大臣，纵使作恶所端，定邀宽

宥。岂知赞襄政务，皇考并无此谕，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付皇考付托之重，亦何以饬法纪而示万世。即照该王大臣等所拟，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唯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尚可量从未减，姑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载垣、端华均着加恩赐令自尽，即派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迅速前往宗人府传旨，令其自尽。此为国体起见，非朕之有私于载垣、端华也。

值肃顺之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亟应凌迟处死，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唯朕心究有所不忍，肃顺着加恩改为斩立决，即派睿亲王和载良前往监视行刑，以为大逆不道者戒。

1861年咸丰帝宾天后，怡亲王和郑亲王的世袭亲王爵位因为亲王的阴谋而被剥夺。但念在他们的后代在镇压太平军叛乱并克复南京（1864年）中有功，太后恢复了其家族的爵位。在这道诏令中，慈禧回想起以前的事实，原来怡亲王的爵位是1723年授予康熙的一个儿子，按照君主的口谕是永远世传下去的。在提到载垣阴谋和这些叛徒的罪过时，慈禧继续说：

乃其后嗣端华、载垣因恣肆狂悖，跋扈不臣，赐死革爵，既负朝廷豢养之恩，且为乃祖声名之玷，九泉有知，能无隐痛。其所遗爵秩，永远革除，尔时如不照议施行，恐无以服天下之心。追思开国之初此亲王家族之功勋，及今南京新立之勋，着加恩赏还其亲王王爵。不因端华、载垣罪大恶极而将世爵永远革除。一切红白蓝甲数并佐领人等，均着复其旧，并着宗人府照例于始封立官人之后裔内，择其向有袭次房份，排列在前，仅止有分房份，排列在后，如各房份均属相同，即以长幼之序排列，并将岳灵、载泰一并带领引见，候旨承袭。

太后这道谕旨，措辞微妙，但怡亲王、郑亲王仍然为上天所弃。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因怡亲王同谋，赐令自尽，其实各国所想加以处分的黑名单上，并没有怡亲王的名字。当太后非常不得意的时候，实在非常愤怒，故那时如此仓促决断，不像平常还可以从容商议。郑亲王也在1900年联军入京的时候尽节而死。以不得志的亲王，而能爱国，真是满洲的好榜样。

肃顺死后三年，太后又下了一道谕旨，说肃顺的后代，以后永远不允许担任官职，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肃顺当权的时候，对于咸丰帝极有影响，凡是得罪于自己的人，就加一永不叙用之罪。

第四章 首次垂帘

尽管载垣的阴谋垮台,其首领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慈禧的权位也得到巩固,成为中国最高的统治者(这里只谈慈禧,因为另一垂帘听政者为东后,对政治不太关心)。但慈禧听政之始,非常小心谨慎,不揽大权,不表现出自己的野心,只处处留心朝政方面的知识,从而获得朝中重要官员的支持。这一时期各方面的政令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慈禧这时期的权力,远不如光绪帝执政的时候大。太后撤帘,是在义和团以后。慈禧第一次垂帘虽然表面上没有权力,但是(1861—1873)可以被看作统治的实验时期,此时她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在第二次垂帘时期(1875—1889),太后偶尔发表一些诏书,凡官员之任命及其赏罚,都由太后掌握,所以太后在官员中威望极高,深受爱戴。光绪帝冲龄继位以后,太后撤帘。光绪是被同治帝选为直系储君的,所以从名义上说,同治帝是光绪的父亲。因为他是被太后任命的,所以太后采取训政。直到最后一次听政(1898—1908),则一切大权,都归太后掌握,其地位巩固,经验又多,遂有举重若轻之概。每天登大殿,坐在宝座上,召见大臣,皇帝则如同木偶一样,侍坐在旁边,大臣只知道有太后。

太后执政之初,也知道女主专权,违背中国古训,不受国人的欢迎。中国历史上8世纪最著名的武后虽然非常有才能,但一

直被中国人讥讽为篡位者。慈禧也意识到吕后(历史学家描写的吕后的性格,不是真实的吕后的性格)的执政标志着汉王朝权力的巩固和汉朝的崛起,应该得到欣赏,但是后代却缺乏对她的尊重。从另一方面说,研究历史是她过去常做的事情,她知道,过去的太后都掌握着国家最高大权,她要遵循她们的先例和规则。除掉了图谋不轨的三个人以后,大臣和御史们为迎合她的心意,认为当日与载垣同谋计划的人,都应当受到处罚。而恭亲王更是急不可耐,凡是大行皇帝末年所听信的人,都应该严密侦察。恭亲王这一举动,也不尽是出于报复。

慈禧却表现出男人般的大度和容忍:训政之初,就定为首者治罪,其余一概不问,以免株连到家人和友人。在将载垣同时秉政之军机八人罢黜治罪以后,其余的人都得到宽恕。现在举两个例子,吏部尚书陈孚恩被人举发,说是他首先劝咸丰帝逃往热河。咸丰帝宾天后,载垣等所召京中大员到热河的,只有这一个人。尽管他被证明是有罪的,太后则不过令他辞官。

还有一位内务府的官员,曾是赞助载垣阴谋的人,劝说咸丰帝于1861年春不要回北京,以遂其阴谋,而这个官员最后仅被革职而已。当时北京对权力趋之若鹜,但是朝廷不想罗织罪名以兴大狱,所以太后下了一道严厉的谕旨,以宣告天下说慈禧只是想惩罚几个人而已,主要是那些主犯。她的一贯特点是,当她的目的达到,便一般采取谨慎的宽容政策。就拿载垣一案来说,太后深知载垣得不到京城中的高级官员的支持,绝不能如此大胆。但太后虽然知道同谋者多,可只要不是罪状大的、公然反抗的,则宁藏铁腕于绣绒手套之中,也不施行于外。

太后既黜退载垣等,即告“臣工各勤厥职,争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陈孚恩等之恶习耳”。太后又下了一道谕旨,说犯罪的人虽然无可挽救,但是藏匿而不检举揭发的人,也要处以同样的罪罚。太后的意思是说王公大臣未曾举发载垣等的阴谋。又说朝廷

也知道这些人并非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过是心中恐惧，没有胆量和见识，不敢告发罢了。以后如果再有这些阴谋的事情，知道的人应立刻向上禀报，不得延迟。于是命令王公等，都要以载垣为戒，如果再发生这些事情，决不宽恕，一定要严惩。

第一步最重要的事情是决定新帝的年号，载垣等已选定“祺祥”二字，意思是“吉利幸福”。太后读书较多，知道这二个字不好，意思是想让人人永远忘记载垣僭乱之事，所以改取“同治”二字，大概是想平定叛乱，使京城和平之意。如果以皇帝而论，不管命名如何，都无关系，以事实验之可知。改年号的谕旨已经下来，同天两位太后又下了一道谕旨，声明接受大权的本意，其语气好像要得到天下的谅解：

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垂帘听政，本非初衷，只以皇帝冲龄践祚，臣下不能无所禀承，故不得不俯顺群情，暂权国事，俟皇帝典学有成，即当归政。凡我大小臣工，务宜矢忠矢勤，共襄治理，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云云。

紧接着又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代表小皇帝感谢太后慈恩，并表示，一旦至执政年龄，他一定会勤于政事，恪尽职守，不忘对太后感激之情。两宫召见大臣于偏殿，除了典礼之外，帝叔及兄弟四人都免去叩拜之礼。上太后尊号，每年由公库中拨银二十万两，以为两宫用度。上东太后以慈安之尊号，上西太后以慈禧之尊号，以后每逢大典，则增二字。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已有尊号十六字。光绪帝想再加上四字，太后谦恭地拒绝接受。慈安总共有十个字。两太后都在三十万寿时，加上二字，同治帝登位加上二字，同治大行之前，述太后之治绩，加二字，四十万寿时，加二字，五十万寿加二字，光绪帝大婚时加二字，六十万寿时加二字，共得十六字，即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

皇太后。

在刚刚垂帘的时候，慈禧遵听恭亲王的话，和平镇静，与东太后授恭亲王以议政王之号，又特命为亲王，世袭亲王之爵位。恭亲王坚决不接受，两宫不允，后再三谦让，才接受了请求。本来太后垂帘，一切大事都由太后决定，不需要有辅政之顾问。但慈禧心存感激，不能忘记恭亲王在热河对她的帮助，将他的女儿封为大公主，允许使用黄轿。所以恭亲王日益比慈禧的权势还大，直到最后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端亲王和义和团首领掌权，她根本不能主政。

慈禧秉政初期，年纪尚轻，对一切政事，还不是太熟悉，没有经验，而且京城中党派分歧，很难加以操纵，外交上的事情，又不容易办理，所以她恐怕自己不好压服，于是就让恭亲王帮助处理。恭亲王处理政事时间长、经验多，所以被慈禧当作重要的帮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对于国事渐渐了解，本性专断，不想让别人参与。因为她的聪明才智，加上她的见识，对于用人和行政方面的事情颇得人信服。以前所依靠的人，现在逐渐抛弃并疏远，昔日冲抑之怀，今则专断而把持之。慈禧的性情是这样，而恭亲王也并不是甘于退让之人，只不过自己自傲自满的性情，不如慈禧罢了。慈禧逐渐显露出不想让恭亲王干预的意思，恭亲王也不能忍受，因此两个人不能像以前那样和衷共济，于是恭亲王就怂恿东宫太后，在遇到干涉的时候不惜加以阻止，与以前融洽的气氛大相径庭。恭亲王有用人的权力，黜陟之事，不与两宫太后商量，或升或调，都由自己定夺。凡是关于各省的事情，也独断而行，而宫廷之间，也渐生嫌怨，互相抵触。

当时的人，都认为恭亲王对于两宫的举动和态度有些过分，他已经大权独揽，未免有点骄横刚愎。在一次召见的场合，恭亲王竟然对两位太后说，两太后的地位，都是因为他而得到的。这些话使慈禧决不能忘记而饶恕他。

召见之时，两宫坐于大殿宝座之上，前垂一黄丝之帘，召见人员，都不得窥。凡是被召见的大臣分班而入，恭亲王因为是以议政之名，常先入带领，御前太监则侍立宝座之侧。大臣们如果有失仪，都可窥见，无论如何地位高的官员，如果不是总管太监传旨，不能直接进入。而恭亲王不等太监传旨，就径直入内，认为这项制度不是为他而设的。慈禧临朝时间久了，渐渐发现他的悖逆情形，凡是奏对的时候，都要由慈禧问答。一日太后说完以后，恭亲王佯装没有听见，请太后重述一次。太后有言，恭亲王每抗声答之，其骄傲之态度，每使太后不能容忍。恭亲王在宫廷之外，与中外官吏自由来往，不按照太后意旨办事，常有专擅之举。太后派太监在背后侦察，将他的种种作为，报告给太后，就更加怀疑他了。太后逐渐认识到恭亲王权势太大，已经侵犯到自己的权势，于是就告诫恭亲王，要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可僭越行事。太后相机行事，至听政第四年（1865年），机会终于到了。

一天，恭亲王拜见时，忽然不跪而站立起来，这是严重违背朝廷制度的事情。凡是大臣接受召见，不许起立，特立此制，以免大臣有异常的举动，危及皇帝。太监秉知太后，慈禧大声呼助，说恭亲王起立，恐有图谋，以威胁两宫。侍卫听说后，入内，引恭亲王而下。于是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说：恭王侵越朝廷大权，滥举妄动，罢议政王之位，开去军机大臣及其他宫廷要职，总理衙门之差亦撤去。谕内有曰，“恭王辜恩溺职，滥用私人，应即黜罢”云云。

一个月以后，慈禧认识到自己因为处置恭亲王而受到攻击，尤其是朝廷和各省对她的评论是不利的，为了挽回面子，同时也对当时的情况作出反应，她以自己 and 东宫太后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对此作出了解释。她在这份文件中认为自己并不是有意要对近亲进行严厉的处置，并指出她也不会怂恿对皇族近亲进行不合适的处置。她只不过是倾向于，按照历史所证明的，去纠正一些容易对国家造成破坏性的行为。她真正的目的在于惩戒恭

亲王对朝廷的不敬,让他从自己的愚蠢行为中吸取教训。但是既然有几道奏折已经由御史和其他大臣递交上来,乞求原谅他的过失,朝廷出于仁慈也不会表示什么反对,现在明白晓谕,恭亲王恢复在总理衙门的职务,至于外务部中的职务也予以恢复。恭亲王需要从这次礼貌问题上吸取教训,太后也就既往不咎。至于以后,他应当更加忠于职守,对太后陛下更加感激。

一周以后,慈禧又以皇帝名义,下了一道谕旨:

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惻然。自垂帘以来,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已历数年,受恩既渥,委任亦专,其与朝廷休戚相关,非廷诸臣可比,特因位高谤,稍不自检,即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者不得不严。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耶。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其勿忘此日愧悔之心,益矢靖共,力图报称,仍不得意存疑畏,稍涉推诿,以负厚望云云。

1865年秋季,举行咸丰皇帝大葬之事,修理陵寝已四年,以其孝德皇后从葬。皇后歿于1850年,其灵柩暂安于一村庙里已经十五年,离城西约有七英里。通常,像这样修陵寝以及出殡等费用,都需要巨款。而当时筹款非常困难,南方各省因为太平军叛乱,军务饷需浩繁,不能接济。皇帝的陵寝大约需要一千万两银子,只有由内务府及各部官员捐纳。

幼帝及两宫都前往东陵,恭亲王随行。恭亲王于此时,指出

皇陵工程差，而且还要筹集经费。太后这时也没有严厉责备他。皇棺是用梓木做成，涂上厚漆，写上“佛”字，送到陵中，安置于装饰有珠宝的座上。陵中都是用上好的石头砌成，前代往往以妃嫔及太监殉葬，今则以木或纸做成的东西代替，跪在棺木前。于是点燃巨烛，僧徒诵经，金圭玉笏珠串放在棺材上，其余一切珍贵陈设，一一安置陵内。一切准备好，就将墓门封上。到了第二天，两宫以皇帝名义下旨，嘉赏恭亲王等：

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恭亲王自襄办文宗显皇帝大事以来，五载于此，尽敬尽诚，有条有理。定陵工程，前经派总司稽察，一切悉臻妥协。本日文宗显皇帝、孝德显皇后梓宫奉安定陵，礼成瞻仰，规则崇宏，典仪明备，悲恻之怀稍释，在天之灵亦慰。这以内感仰体文宗显皇帝谊笃友于之心，并参酌成案，渥沛殊施，以示优奖。乃据恭亲王以盈满为惧，再四固辞，情词恳挚，出之至诚，不得不免从所请，仅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唯恭亲王谊属亲藩，首参机务，近来事无巨细，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敛抑，实能不负委任。本年三月初七日所降谕旨，原因其小节之疏，恐蹈愆尤之渐，期望既厚，责备不得不严。业于三月十六、四月十四等日，将办理始末，明白宣示。谅天下共见共闻，唯虑传之久远，后人不知原委，莫定是非，转为白圭之玷，殊无以释群疑而彰忠悃。所有三月初七日谕旨，着毋编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勋劳，保全令名至意。

读了慈禧听政初的谕旨，足以知其为人始终不变。在这以后四年，恭亲王与东太后阴谋除掉慈禧的亲信安得海，遂招致慈禧对恭亲王的深深嫉恨。

第五章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灭亡

慈禧与东太后共同垂帘的初年，她稳步地获得了从政的经验和技能，与周围的同僚也相处比较融洽，从1850年开始清军相继收复失地，镇压太平军。中国的历史学家，以为镇压动乱，救民于水火，都是曾国藩总督的功劳。这确实说得正确，像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可谓勇猛善战，应该受到赞扬。中国儒教虽然有可议之处，但是在数千年之后，常能产生如此人才，以救民而平乱，都是儒教的力量所在。曾国藩之名，妇孺皆知，然而他之所以能成此伟业，实在是因为慈禧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军事指挥人才。虽然她非常迷信，但是在她的迷信背后却有超乎寻常的判断力。她非常尊重曾国藩的性格和才能，无疑首先是因为他的军事调遣能力，尤其是关于他安营和围困敌人的故事流传很广。她后来逐渐熟悉了他的纯正品质，除了荣禄之外，没有人能够获得她如此的尊敬。荣禄是满洲贵族，而曾国藩只不过是湖南的一个士绅。从中国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叙述中，我们能获得清楚的印象，不仅是曾国藩的性格和他的忠君观念，而且他无可争议的统治权和地位在当时深得年轻慈禧的喜爱。在回顾以往的时候，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太平军最终失败的那些原因。在英国人所亲眼见证的事件中，对于清朝所颁布的法令和官员的派遣无疑都有可怀疑之处。



曾国藩

咸丰帝在流亡中死去,1861年8月清军在热河惨败。颐和园被英法联军所毁,议和以后,两太后开始垂帘听政。恭亲王第一个举动,就是以他作为政府顾问的权力,最终签订了1860年10月的和议,取得了外国人的支持,在外国侵略者的帮助下联合镇压中国的叛乱,因为叛军在长江流域的强大力量使清政府非常焦急。这是中国政府最为清楚的,如果不以今天的那种价值观来看待的话,当英法联军发动对中国

华北的侵略的时候,在长江流域各省的中国高级官员毫不犹豫地反对对叛乱给予支持。英法联军却对此置之不理,政府以为长江乃外国人通商之地,外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完全不顾,是不明智的。在这里常胜军的历史无暇详细叙述。1862年截剿太平军于江苏。1863年,英国政府允许借戈登大将给中国,并统领此军。自从戈登率领此军后,清政府的军队声势大震,曾国藩得以平定叛乱。使中国重睹太平盛世,戈登也有一份功劳。

1863年12月,苏州城克复。1864年7月,克复南京,天王死,大乱乃定。起初外国人严守中立,后来帮助清政府剿灭寇乱。欧洲人不惜自己的生命,甚至法国海军提督也死于这场战役,外国人对清政府的功劳非常大。但是攻破南京以后,曾国藩上平乱之奏及朝廷谕旨,一字不提戈登的功绩。曾国藩只提到英国指挥官控告他对待毫无防卫能力的俘虏的非人道的行为。中国人的传统风俗,把功劳归功于咸丰皇帝,说皇帝神圣,无所不能,这是东方王权统治下的普遍心理。(不独中国,日本胜俄,其大将之报告,亦归于天皇,与中国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对于那些战死的人,

报酬非常丰厚,为活着的人所不及。对于立功的外国人,则更不用说了。曾国藩智勇双全,但出尔反尔,非常寡情。戈登将军虽然帮助平定叛乱,但是英法联军侵入京城,焚烧圆明园,戈登将军也参与其中,这是曾国藩之所以不提其功劳的原因。慈禧见南京克复,非常高兴,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摘录于下,由此可以知道慈禧的性情:

本日据官文曾国藩由六百里加急红旗告捷,克复江宁省城,逆首自焚,贼党悉数剿灭,并生擒李秀成、洪仁达等逆一折,览奏之余,实与天下臣民,同深嘉悦。发逆洪秀全,自道光三十年倡乱以来,由广西窜两湖三江,占据江宁省城,僭称伪号,东南百姓,遭其荼毒,惨不忍言,罪恶贯盈,神人共愤。我皇考文宗显皇帝赫然震怒,恭行天讨。特命两湖总督官文为钦差大臣,与前任湖北巡抚胡林翼肃清楚北上游。胡林翼驻扎宿松一带,筹办松征事务,复特授曾国藩为两湖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东征江皖贼匪,号令既专,功绩日著。

十一年七月,我皇考龙驭上宾,其时江浙郡县半就沦陷,遗诏谆切,以未能剿灭逆匪为憾。朕以冲幼绍寅丕基,祇承先烈,恭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指示机宜。授曾国藩协办大学士,节制四省军务,以一事权。该大臣受任以来,即建议由上游分路剿办,飭彭玉麟、杨岳斌、曾国荃等水陆并进,累克沿江城隘百余处,斩首或外援逆匪十余万人,合围江宁,断其接济。兹据官文曾国藩奏克复江宁详细情形等语,此皆仰赖昊苍眷佑,列圣垂庥,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识拔人才,用能内外一心,将士用命,成此大功。上慰皇考在天之灵,下孚薄海臣民之望,自维藐躬凉德,何以堪此。追思先帝未竟之志,不克亲见成功,悲愴之怀,何能自己。

此次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踞江宁,亦十二

年，蹂躪十数省，沦陷数百城，卒能次第荡平，祛除元恶。该领兵大臣等栉风沐雨，艰苦备尝，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劳勋。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浙江巡抚曾国荃坚忍耐劳，公忠体国，着加太子少保衔，袭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其余以次封赏有差。

后来又下一道谕旨，说皇帝当亲自到太庙及各处行礼，以答祖宗之德、名山大川之神。当时有一人叙述到天王死时的情形，今录于下：

自官军得沐阳后，贼势穷蹙，如兽处笼中。四月以来，金陵城已合围，粮食将绝，每日只食一餐。伪天王命以树皮叶搓成圆团，名曰“天粮”，言宫中皆食之。命民间每一家预备十担，其愚者仍信之，亦有置之不理者。忠王李秀成自沐阳逃入城中，击鼓请伪天王升殿，洪秀全登座言曰：“予奉天帝圣谕，天父圣兄使予下界，为世界之主，予何惧之有？汝等皆当随予，如欲走者，亦听之。予之江山，坚固如铁，汝等不保护，自有人来保护。予有天兵百万，数十万之官军，岂能为敌？”李秀成闻之，垂泣而出。五月半后，洪秀全自知城不能保，自念七日希望全绝，乃以酒合毒药，言：“非天帝欺予，乃予违天帝之旨。”语罢，即仰药而死。观其临终之言，并无悔恨之心。其部下以黄缎束其身，四周均织黄龙，依其教旨，不用棺殓，埋于地下。举行幼子登基，欲秘不发丧，然外间皆已知之，兵心愈为解体云。

曾国藩奏述戮洪秀全之尸云：

伪天王洪秀全逆尸，将士积愤之余，皆欲得而甘心。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从伪宫内掘出。二十八日抬至营次，臣与弟国荃验看，臣所带委员中，有曾任刑部秋审处之靳方铤、庞际云、孙尚绂等暨各文武，公同相验，该逆尸遵尚邪教，不用棺木，遍身皆用绣龙黄缎包裹，虽裤脚亦系龙缎，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右膀，肉犹未脱，验毕戮尸，举烈火而焚之。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内群贼，城外官兵，喧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等语。

又奏述戮李秀成之事云：

李秀成之就擒也，各营之降卒，附城之居民，人人皆识，观者如堵。臣二十五日甫至金陵，亲讯一次，旋派候选道庞际云、候补知府李鸿裔、同知周悦修等鞠讯累日，令写亲供，多至数万字，叙发逆之始末，述忠酋之战事，甚为详悉。臣复讯以江西李世贤、湖北马融和、湖州黄文金各股贼情。据供湖州广德之贼，即可不攻自遁；马融和一股，本由陕西调拨金陵，因长江阻隔，久无来信；李世贤系李秀成堂弟，与之约定八月以前，则掳江西之粮，以救待党之饥。八月以后，全数回窜，图解长围，则掳宁国之粮，以救金陵之饥等语。又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恐粤贼愈孤，逆党愈固，军事仍无了日，其言颇有可采。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即洋人戈登、威妥玛等来贺者，亦以忠逆解京为快。臣窃以圣朝天威，灭此小丑，除僭号洪秀全外，其余皆可不惜献俘。陈玉成、石达开即有成例可援，且

自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赦，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反恐逃显戮而贻巨患，与臣弟国荃熟商，意见相同，辄于七月初七日，将李秀成凌迟处死，传首发逆所到各省，以快人心。

又复陈酋正法片云：

臣于二十五日驰抵金陵，询及李秀成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逸乡间，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抓去，杀而投诸水中，若代李逆报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凤到营，一见李逆，即长跪请安。臣闻此二端，恶其民心未去，党与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厥后鞠讯累日，观者极众，营中文武各官，始则纷纷请解京师，继则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纷纷请贷其一死，留为雉媒，以招余党。臣则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遂于初六日正法，初七日录供具奏。其洪仁达一犯，虽据李秀成供在贼中暴虐专权，而如醉如痴，口称天父不绝，无供可录，因其抱病甚重，已于初四日先行处死。又钦奉六月廿九日谕旨，“洪秀全尸身获后，剝尸梟示，仍传首被害地方，以雪众愤，钦此。”臣于六月二十八日验洪逆正身，即行戮尸焚化。未将首级留传各省，是臣识见不到之咎，钦奉谕旨训示，不胜惶悚。

又奏中有云：

伏查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踞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内，神人共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焜耀史编。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四省，沦

陷不过十余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只十二省，沦陷亦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云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巨寇。然卒能次第荡平，铲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于我文宗显皇帝圣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俭嗇，而不惜局餉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巨等忝窃兵符，遭逢际会，既痛我文宗皇帝不及目睹献馘告成之日。又念生民涂炭，为时过久，惟当始终慎勉，扫荡余匪，以苏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忧云云。

平乱四年之后，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至今湖南人仍把两江总督当作湖南官员世袭的职位。在这四年中，他只有剿捻匪时，曾经到山东一次，但为时不久，1868年9月就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到北京时他被授予了很高的荣誉，在军机处受到了召见。召见时，幼帝面向西坐，两宫太后在其后，慈安在左，慈禧在右。在中国，对这次叛乱的平定过程多有叙述，但曾国藩此次召见，笔记回答之语，非常有趣，看完可见慈禧之神态，及关于国家之事。以下都是慈禧与曾国藩问答的话，慈安没有参与。曾国藩在殿中跪下，又向前几步，奏道：“微臣曾国藩敬请圣安。”奏毕，脱帽叩头谢恩，礼毕起身，前行数步，后跪于垫上，距宝座很近。其问答之语如下。

太后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何处人多？”

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

问：“撤得安静？”

对：“安静。”

慈禧问完，又问曾国藩以前的事情及其家庭，几分钟后，曾即叩头退下。凡在召见之前，慈禧都取奏章细阅，召见之时，所问的话，都非常简明扼要。曾国藩退下之后，慈禧赐满汉大臣吃肉听戏。曾上重练直隶海陆军条，慈禧曾经仔细阅读。他在直隶任上约年余，当时直隶总督府在保定，故天津教案，虽与曾国藩有重大责任，但是不能一概将过错都推到曾国藩身上。此年六月，南京总督马新贻被刺死，上谕曾国藩仍到南京，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李居直隶总督共二十四年。当时曾年已衰，奏请解去两江总督重任，慈禧不准，下谕说：“两江总督确极重要，曾国藩曾在江督任内，诸事办理完善，最为相宜，近虽有目疾，该督可总揽纲要，无事琐屑也。”

曾国藩在京过六十大寿，太后大加赏赐，并贺诗一首，又赐一匾额，书“国之柱石”四字，并佛像一尊，玉如意一柄，花衣一件，江绸十卷，纱十匹。曾请慈禧训示时，之间的对话如下。

慈禧问：“尔何日自天津起程？”

对：“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

问：“天津正凶曾已正法否？”

对：“未行刑，旋闻领事之言，俄国公使即将到津，法国公使将派人来津验看，是以未能骤杀。”

问：“李鸿章拟于何日将伊等行刑？”

对：“臣于二十三日夜接李鸿章来信，拟以二十五日将该犯等行刑。”

问：“天津百姓现尚刁难好事否？”

对：“此时百姓业已安谧，均不好事。”

问：“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

对：“府县初撤任时，并未拟罪，故渠等放胆出门，厥后遣人谕知，业已革参交部，该员等惶骇，始从顺德、密云次第回津。”云云。

问：“尔右目现尚有光能视？”

对：“右目无一隙之光，竟不能视，左目尚属有光。”

问：“别的病都好了吗？”

对：“别的病算好了些。”

问：“我看你起跪等事情精神尚好。”

对：“精神总未复原。”

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对：“这事甚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对：“他办事和平精细。”旋即退出，其后又入见。

慈禧问：“尔在直隶练兵若干？”

对：“臣练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四千，共为七千，拟再练三千，合成一万，已与李鸿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办理。”

问：“南边练兵也是最要紧的，洋人就很可虑，你们好好地办去。”

对：“洋人实在可虑，现在海面尚不能与之交战，唯当设法防守。臣拟在江中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轮船。”

问：“能防守便是好的，这教堂就常常多事。”

对：“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信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明年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意整顿。”

到了11月，曾国藩离开京城，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京城。一月后，曾国藩接印上任，先办马新贻一案，刺客张文祥略审讯就定死罪。第二年夏季，曾国藩巡视各处，凡是名胜之地，都一一游

第六章 慈禧和太监

中国近代的史官、言官们和帝师、太傅都不断强调这样的事实：明朝的衰微，以至于亡国，确是由于宦官的专横跋扈、把持大权所造成的。关于这一问题，对于朝廷王权的传统道德说教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根本不考虑大多数作者的立场，希望劝说君主不要接近太监这一类的叙述非常多。这些奏章中通常只是出于对久远的一种组织的虔诚的陈词滥调的一部分，这些模糊的说辞经常出现在中国官场中（不独中国是这样）。当慈禧太后执政的时候，太后的罪恶日益增加，弊端也更加严重，大臣也经常对此进行抨击，太后也曾进行奖赏并采纳他们的意见。太监弄权所造成的危害，慈禧太后也深深地知道，只是予以容忍。中国自来都抨击太监制度的罪恶，但是五十年来也没能从根本上废除它，使中国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无疑，1898年的政变，因为光绪帝实行新政，想首先废除此种弊制，所以招致李莲英的仇恨。至于义和团叛乱，已经清楚地证明是内阁大臣利用自己的影响造成了排外运动的帝国悲剧，如果进行公正审判的话（据说是出于英国使团的保护），李莲英应该被列为排外的黑名单之首。这里提到李莲英的作用，是想知道当时士大夫痛斥太监制度的弊端，当时各省的官员也有人提出这种看法。因此，尤其是在1911年革命进行的五年当中，进步、爱国的中国官员如总督袁世凯和唐绍

第七章 礼节问题

下面的一道密折，是吴可读于 1873 年草拟，虽然在奏折中没有直接提及慈禧太后的生活和性格，但是仍然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宝贵，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国官僚阶层的极其傲慢以及慈禧所生活和代表的朝廷对周围事物的天真和无知。像这样的文件，要寻找的话非常多。中国人始终抱持着这样的信念，认为外国人是夷狄，为野蛮，每当诉诸民族感情时，对西方总是抱着蔑视的态度，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由来已久。他们想当然地随意构造幻境，顽强固闭，虽屡次遭遇挫折和羞辱，仍不改故态，今与外国使团交涉，犹持此心态。如果从奏折的大概情形看，可知这个女人，她的行事和个性，左右了全体中国人和其国家的对外关系近半个世纪。看奏折中所说的，使人不得不佩服她看问题的深刻性，远胜于周围的近臣。最后，这道奏折中潜伏着某种幽默感（可能没有意识到）。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窃自各国使臣，赉呈国书请觐以来，诸臣会议，初则争以见与不见，继又争以跪拜与不跪拜，相持不决，近半年矣。臣窃见二三同志对小臣妄言，此何等事，而直举国纷纷若是乎？孟子曰：君子于禽兽何难？各国之主，由各国之臣民废置如弈棋，此臣所闻也。其在京者，出门时妇人前行，

或乘轿，男子为之执役步行在后，此臣所见也。观其条约，无虑数十，几近万言。问：“有一述及亲亲尊贤国之九经否？”曰：“无有也。”问：“有一字道及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否？”曰：“无有也。”不过曰某项有利，某项于中国亦有利，以利自处，而又以利诱中国。彼不知仁义礼智信为何物，而我必欲其率五常之性；彼不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为何事，而我必欲其强行五伦之礼；是独聚犬马羊豕于一堂，而令其舞蹈扬尘也。然则即得其一跪一拜，岂足为朝廷荣？即任其不跪拜，亦岂为朝廷辱？而议者之意，则以为必须如此郑重，再四而后允，则彼将曰：中国欲此等小事，尚不肯轻以我与，则事有大于此者，更无望矣。于是要求无己之心，自此而遂息。则我之势尊，而彼之势屈，臣愚以为我之尊自若也，不因彼之尊之而我始尊也。彼之不屈自若也，不因我之屈之而彼屈也。彼窃见我所重在跪拜，而忌在不跪拜，所畏在用兵，则常增吾所重，益吾所忌，而未我所畏。盖我之势一弱，彼计无施而不可。

臣所闻各国往来文移，所进表章，有如许妖魔鬼怪，不知何物之某皇某帝，竟与我皇上并列矣，诸臣不彼之耻而耻此乎？前岁俄夷由伊犁而入新疆，自东而南而西，包中国万余里，创千古外夷入中国未有之举。其措置甚大，其处心积虑甚深甚毒，诸臣不彼之虑而虑此乎？诸臣以为各国不从中国礼节，即足为中国羞，而臣以为各国若从中国礼节，更足为中国害。自古国家大局，时与势二者而已。度吾时未可与争，势未可与校，则当别求吾自强之道，而暂行吾权宜之计。昔子贡问政，孔子告以足食、足兵、足信。迨子贡以不得已而去请，孔子曰：去兵，又曰：去食。圣贤谋人家国，动出万全，断无鲁莽从事之理，去之云者，平时必有一番经济作用。成竹早已在胸，并非直至不得已时，而始仓皇

自知罪当万死，臣不胜诚惶诚恐，谨奏。

这道奏折递交上去之后，太后批谕，说：

所奏甚是，已有旨许各国使臣进见，并听其行本国之礼矣，朝廷怀柔远人，且严中外之别云云。

读了以上奏折，需要首先知道上奏的人，是正直无私的御史吴可读。吴可读的大名，几乎妇孺皆知，同治帝宾天的时候，吴曾力争立嗣的问题，以反对太后的意旨。如果中国人心中都如奏折中所说的出于良善而做出勇敢的决定，则为何有那么多多的谬说，引起民众发动暴动呢？吴尖锐地讽刺外国人的条约，不过贪图通商，出于卑鄙好利之情。这是典型的中国正统士大夫的态度。

第八章 同治帝亲政及其驾崩

1872年11月,即同治十一年,两宫太后同下一道谕旨,重新说明了垂帘听政的原因。接着说皇帝已长大成人,于是就命钦天监选择吉日,作为皇帝亲政的日期,钦天监复奏正月二十六日为大吉之日,两宫皇太后于是下了归政的谕旨。谕曰:

朕奉慈安端裕皇太后慈禧端佑皇太后懿旨,皇帝寅绍丕基,于今十有二载,春秋鼎盛,典学有成。兹于本月二十六日躬亲大政,欣慰之余,倍深兢惕。因念我朝列圣相承,无不以敬天法祖之心,为勤政爱民之治。况数年来,东南各省,虽经底定,民生尚未义安,滇泷边境及西北路军务未止,国用不足,时事方艰。皇帝日理万机,当敬念惟天惟祖宗所以付托一人者,至重且巨,只承家法,夕惕朝乾,于一切用人行政孜孜讲求,不可稍涉怠忽。视朝之暇,仍当讨论经史,深求古今治乱之源,克勤克俭,励精图治。此则垂帘听政之初心,所夙夜企望而不能或释者也。在廷王大臣等,均宜公忠共矢,勿避嫌怨,本日召见时,业已谆谆面谕。其余中外大小臣工,亦当恪恭尽职,痛戒因循,宏济艰难,弼成上理,有厚望焉。

长。到第二年 12 月，皇帝得了天花，不能临朝，两宫太后代为执政。到了月底，皇帝下了一道谕旨：

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并荷慈怀曲体，俯允内外各衙门章奏，代为披览裁定，朕心实深欣慰。允宜重上两宫皇太后徽号，以冀仰答鸿慈于万一，所有一切应行典礼，该衙门敬谨办理。

皇帝身体已经虚弱不堪，不能抵抗病势，于是在 1875 年正月十三日下午八时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龙驭上宾，两宫太后及王公大臣约二十多人在一旁侍候。当时有一位御史上奏，力参内务府二人，说他们引诱皇帝，为邪僻之行，以至皇帝不长寿，请立罢其职。太后准奏。慈禧仍想用桂庆，嘉奖其忠爱，但桂庆已对仕途心灰意冷，不愿再出。同治帝早薨无嗣，推其缘故，都是因为慈禧太后贪权所造成的。如果不是这样，则皇后既然已经怀孕，或能生产一子（按同治皇后有孕之说，恐不确切）。如果皇帝有嗣，则皇后将被尊为太后，而慈禧必然退处于无权的地位，因为慈禧以前之所以能执政的原因，是居于太后的地位，如果皇后产有皇子，则慈禧不能仍执掌政权。

当时皇族之中，嫉恨太后的人非常多，等到皇帝驾崩，于是倡议立道光皇帝的长孙溥伦继位。当时王公主主张立溥伦的人，都说其合于皇朝继承秩序，但是慈禧已经决定揽权，即使违反众意，破坏家法也不在乎。慈禧意志刚强，毫不疑虑，专图巩固其政权，凭着自己的手段和声威，以扫除一切障碍。当时，慈禧与慈安不睦，慈禧因杀安得海的事情怀恨在心，对恭亲王也深恶而不信任，所与商量的，只有醇亲王一人，即道光帝的第七个儿子。醇亲王也有才能，其福晋即慈禧之妹，所以慈禧决意立醇亲王的儿子

不到半夜,幼帝已正式即位于宫中,哭泣不止,恐怕预知其入宫乃为凶兆。他的母亲即慈禧之妹,也同时入宫,此外更有乳媪数人。登位之初,首先到大行皇帝前行叩首礼,这是历代的成例。当时皇帝还年幼,于是两宫太后继续监国,以两宫皇太后之名,同下一谕,说大行皇帝无嗣,不得已,乃以醇亲王之子入嗣文宗,承袭大统。俟嗣皇帝后生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其皇后遗腹子,则绝然不提,于是皇后之希望全绝,而众人也知道她无能为力。王公大臣等依照前例,同上一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两宫皇太后下谕答应,说皇帝幼冲,时势艰难,不得不听从臣下之请,出而“垂帘”,使国事有所秉承。这些都是表面的形式,不得不这样做。

慈禧又下旨将修理西苑颐和园之举,暂行停止,说此大丧之时,无心及此,实因慈禧不能离开宫中。慈禧所以能以自己的意见,破坏祖宗家法,而立醇亲王之子者,实由其平日之得人心及其处置有法,令人倾服。新立的幼帝,身体孱弱,当时的人都知道长大之后,后嗣必艰,也曾有人以此劝谏慈禧,而慈禧不为所动,这明明是由慈禧专权喜功所造成的。由此时竟至1908年,两宫相继宾天之前,外间时时谈论帝之登位,预兆不佳,恐其不会长寿,不能比过慈禧,且有人认为慈禧必享高寿,或更经一次大事,而继续以执朝政。但是这种种预言,其后没有灵验。慈禧原本撤帘归政与皇帝,但当戊戌政变之后,若不是害怕南方有变,恐怕连皇帝的命也难保住,而又见幼帝登基之事。皇帝的年号之所以取名“光绪”,意思是取皇帝乃道光嫡派之孙,且希望咸丰、同治二朝的忧患,到此时能够彻底根除。当时又加谕,加徽号于大行皇帝之后,但这些虚荣,不能阻止皇后殉节之志,于是其在三月二十七日自尽。皇后的死固由于殉节,也是心怀不平所致。这种事情议论不一,甚至有人说皇后自尽,是慈禧讥讽的原因,而外间感动越深,议论就越频繁,如果没有殉节之事,则必不如此,这

是一定的道理。

皇后殉节之后，御史及外省颇有上奏，说醇亲王之子不当立，都是在指斥慈禧。至于慈安太后，外间都知道她向存谦虚谨慎，不问事。此事出来以后，影响很大，国人对慈禧太后的感情，因之大减。后四年，吴可读自尽于蓟州，即同治帝陵寝附近，力争不为大行皇帝立嗣之误。慈禧见此情形，也深感不安，所以又下了一道谕旨，申明前旨，将来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之统。醇亲王为帝生父，又无叩头之理。他的奏折中说初闻自己的儿子被选，非常震惊，不知所为；回家之后，心里还在颤抖，神经错乱，如痴如呆；再加上肝病发作，焦灼得很，恐怕不久就要去世。慈禧看了以后，批令大臣集体议论，后允许开去各项差使，凡是朝贺等典礼，都不参与。但是如果有要政，则需要两宫太后的咨询，遇到慈禧万寿，在便殿行礼，不随大臣朝贺。慈禧以前所管理的军队交与醇亲王，同时醇亲王又受有训令，以自己的经验，告诉给醇亲王。当时的军队，积弊很多，兵丁都是无赖之子，兵官也毫无知识，虽有如无也。回忆同治初年，慈禧初次垂帘的时候，这已经是她第二次重执国柄了。

第九章 吴可读的抗议和自杀

在同治帝年轻的遗孀殉节之后，合法的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就立刻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及至慈禧太后破坏了历朝所制定的传统家法，继承人的人选问题，成为保守派和王朝的支持者们格外关注的事情。军机大臣的下属满洲官员在请愿书中表达了不满，关于继承大统，必须做明确的规定，以诏告天下，根据最终皇位继承人的制度应当采取措施保证皇上成为同治帝合法的继承人。请愿书的内容如下：

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当稍为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海内臣民方将享太平之福。詎意大行皇帝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凡食毛践土者，莫不吁天呼地。幸赖两宫皇太后坤维正位，择继咸宜，以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钦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仰见两宫皇太后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圣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统绪，亦得相承勿替，计之万全，无过于此。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

常规的做法是严重的,上天无疑也会目睹皇家的罪恶,若像通常一样,也不会冒犯“愚蠢的百姓”,但是个人主义以及中国官员之间的相互猜忌是非常常见的,并且总是以协调一致的行动和补救措施的观念先行的。

但是有一个官员,冒着被定罪的危险以大无畏的勇气,采用由来已久的自尽的权宜之计,吸引了整个国家的眼光去注意继承的问题,这是许多优秀的著作做不到的。诉诸自杀以表示自己愤慨的爱国行为来证明他们真挚的悲痛,这是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认为值得赞扬和肯定的行为。虽专制之君主,亦不能不重视之。他以自己最后的言行表达最高的价值。而且这种行为背后还有某种大无畏的气概和文化哲学,这种气概连罗马的贵族也会刻骨铭心的,这说明他的死所带来的声望一定会激起人们对正统的热爱,正如人们对和平的热爱。

这个名字将永远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他作为民族和真诚的信仰的捍卫者与不合法的继承者小皇帝光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人就是御史吴可读,他是正直和无畏的学者中的杰出典型。个中原因可以在他临别的上奏中表现出来,他在同治帝死后一直等待了四年,他抱着一线希望以帝国文人官员惯用的那种表达不满的形式,希望慈禧太后能够颁布新的法令以控制未来继承人的人选,以安抚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同治帝的亡灵。他在希望中终于绝望,于是抓住举行已故皇帝葬礼(1879年)的时机在他的坟墓前自杀。正如他预知的,他的死将会在帝国所有的文人官员中留下深刻的记忆,并成为一种绝唱。他的死造成的影响足以说明慈禧太后是错误的。认识到御史抗议之下潜在的公众舆论的力量,慈禧太后尽量答应死者冤魂的请求,以满足他对同治帝未来的继承人的安排,但并不仅仅是由于吴可读的死才影响了她的决定并感化了她迷信的心灵。在以后的日子里,尤其是在她逃亡西安的时候,她意识到了他的影响以及对她罪行的惩罚,

因为当时灾难正突然袭击皇室。

作为行动准则的范例,平静的精神结构是儒家哲学系统的精华,因此值得我们予以仔细的研究,我们将他出于忠诚而以死尽节的故事完整地叙述出来,也将他请愿书中的内容翻译出来。

他的自杀发生在马伸桥的一座小寺庙里,紧邻着同治帝的陵墓。他死前以一个绅士和学者的态度安排了他死后对他的遗物的处理,以免给他的家庭和朋友带来不安。他对管理神殿的牧师、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说了下面一段典型的话:

周老道知之,尔万勿惶恐,我并非害尔者,只不能不借尔清净之地,以归我清白之身。尔可即速一面报知州主(尔可先报此地武官老爷,望武官老爷马上报告州主,所有信函并折匣均交武官老爷转呈),一面以银数两市一薄材,用沥青刷里,我衣冠俱已齐备,只将鞋底皮掌割去,速将装殓入棺(临时自将右手四指误触刀刃,所以有血棺木,地方可与石掌柜商量,用二十余金亦可)。州大老爷想亦无可相验,我并非冤仇而死,俟其看视后,即行封钉,缝子多用漆漆几层,即候朝廷查办。后可用数两买一不系山陵禁地一块,速速入土。此节我嘱托贤牧伯,成全我一生忠爱之心。且天下黄土,何处不葬身,而必归乡里乎?

我匣内有京秤纹银四十五两零(我带来钢表并衣物,宅中自有记载),除费用外,可余廿余金,一并赠尔,为受惊薄仪。我儿子若来,我已令他再厚给尔也(我死于此,我儿子未能视含视殓,尔一切代他办理,我岂有到来不感激尔的道理。我身须好好防闲,勿令毁伤为荷)。想此事,州主亦断不令书差或有难为你之处,慎勿惧,此白(尔万不可动我信,并要紧折匣,明日一早即将我身解下,停在外间阴凉不见日)。

第二书云：

再告周老道知，我因住屋与尔师徒逼迫，恐其惊醒尔等解救，则我事败矣，故用自己带来洋药服之，则缢首之时，尔等锯亦无济，总之与尔无干。尔却不可似这几日，诸事把持，即尔徒尔亦不令承办我事（若仍把持，独自出主意，是尔自招其害，切切）。尔须好好尽心，速速报官，再明请本街老成、庙中首事人替尔指示一切。无多嘱，尔须速速报官，请帮手为要。

第三书云：

告周老道知，尔万万不可放闲人进房中来看，又不可令小儿们并妇女稍近我旁，此乃自尽其分，并非奇事，有何看处，识者方悯之不暇也。至嘱至嘱。

接着对他的儿子来说，他在信中表达了死的愿望，体现了许多儒家学者所怀抱的理想和信念，在其与子书中体现着其尊严、对古代血统的骄傲以及自己的恪尽职守。

吾儿志焕，尔闻信切不可惊惶过戚，致阖家大小受惊。尔母已老，尔妇又少，三孙更幼小可怜，尔须缓缓告之。言我已死得其所，不必轻生为忧。我家谱自前明始迁祖以来，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泽，七十岁清白之身。我少好游荡，作狎邪游，然从无疑我大节之有亏者，故同乡及两书院及门诸子，至今犹愿吾主讲席。我以先皇帝奉安有期，故昨年左爵（指军机大臣左宗棠）相聘书两来不就者，原以等今日也。

速速速速速速。尚有许多未尽事宜，不能细记，缘时有限，不及也。

第四书云：

志桓再知：周老道我甚不放心，然亦小人图利，尔不可难为他，我已托州主贤牧伯矣。此等小人，只当念其好，忘其不好处。我一生最恶牵扯他人，今不能不借他庙内，以为安厝我之地方。棺木只用十余两，葬地不过一席，亦只数金，我罪臣不可厚也。至我之所以迟迟到今日者，以国家正有大事，岂可以小臣乱宸听。况时值圣朝，我两宫皇太后并我皇上，宵旰勤劳，数年所降谕旨，无不人人称快。我每读之，至于泣下，恨我已衰，不能出力。叠山先，文山后；睢阳早，许远迟；尔父岂敢仰比古人。且当圣明之世，遇圣明之主，岂能与唐中衰宋末乱比。况又非唐明宋理之君，然其处死则一也。世乱识忠诚，非佳语，亦非吉兆也。慎勿惊为奇事，我不遽引决者，正为俟朝廷大事峻耳。尔可遵我前函谕，作速奉尔母并眷口回家。好好教三孙读书，以备将来选用，不必扶柩而回也。不能尽言，谕尔大小两函，不妨呈贤牧伯刘公阅看，亦不妨人人见之。惟两奏草底，尔亦不可拆看。我已封固，夹在卷夹内，请刘公交尔。

他上给君主的奏折，实际上（正如他在给他儿子的信中明白表示的那样），是对帝国堕落的统治者的控诉，顺便说明他对帝国继承问题上的正统观点。导言中已经提出了他要写的对象，希望作者的死能促使慈禧太后在为同治帝选择未来合法继承人的时候，能够符合王朝的先例和法律。这份特别文件的内容如下：

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怯罪臣闻治国不讳，安国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可忘，则进苦口于尧舜，为无疾之呻吟，陈隐患于圣明，为不祥之举动。罪臣前因事愤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先皇帝曲惕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必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自不待言。

罪臣窃以为未然，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闲然。况醇亲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观王当时一奏，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容伪为，臣读之，至于歌哭不能已已。倘王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为国家旧人，犹以黄望琮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

之不验，使天下后世谓臣明。等杜牧之罪言，虽逾职分；效史鳅之尸谏，只尽愚忠。臣尤愿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祖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余。罪臣言毕于斯，愿毕于斯，命毕于斯。

附 言

罪臣曾任御史，故敢冒死具折，又以今职不能专达，恳由臣部堂官代为上进。罪臣前以衙门所派随同行礼司员内，未及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学士宝鋆，始添派而来，罪臣之死，为宝鋆所不及料，想宝鋆并无不应派而误派之咎，时当盛事，岂容有疑于古来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龙驭永归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谨以大统所系，贪陈缕缕。自称罪臣以闻，谨具奏折上。

第十章 慈禧成为唯一的摄政者

举国为同治帝送葬的仪式举行完毕，他的遗体经过朝廷占星家挑选吉利日子而得到安排，多亏了吴可读，他的亡灵才得到了安抚。太后郑重地答应在合适的季节为他规定一个合适而且合法的继承人，紫禁城里的生活在东宫和西宫皇太后的联合摄政下平静下来，重新进入了最佳状态。

但是不久新皇帝，一个紧张而又脆弱的男孩子，成为了慈禧的眼中钉，而正是她将其推上皇帝的宝座。当他由婴儿期进入童年，正是大约掌握普通知识的年龄，据说在宫里深得慈安太后的喜欢，受到慈安太后友善和同情的对待，因此她赢得了孩子的心。在他天真无邪而又孤独的青年时期，他经常到东宫那里去；然而慈禧，她的傲慢、决不容忍有竞争对手，即使幼小皇帝的一举一动也不能掌握在另一个妇女的手中。也不乏有人经常告诉她或是她的同僚，这一切都是出于私下和隐蔽的动机，鼓励这个孩子反对并冒犯她。在这些情况下，年轻的皇帝不可避免地成为两个妇人之间嫉妒和摩擦不断增加的原因。

慈禧无疑憎恨慈安太后的教唆而形成了这个男孩的性格。在朝廷上，所有的人和一切的事情都可能成为阴谋和党派的工具，年轻皇帝的态度不能不引起她的深切关注。她意识到慈安永远不会成为她的强大对手，因此慈安应该欣赏皇帝的自信并赢

得他的支持,鼓动他成为反对她的一派的中心(正如他所做的),这对她的形势可能就有点不妙了。当皇帝的少数派越是变本加厉的时候,对于她来说采取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就越是必要的。前此乾隆帝有一妃子,因为奢侈游戏的原因,而失去了母后的欢心,被迫赐死。

两宫摄政之间发生的进一步摩擦的原因是在1880年东陵的巡行,当时皇帝已经九岁了。在这个场合下,慈安明显受到恭亲王的鼓动,坚决不肯相让,坚持在对祖先陵墓举行的所有祭拜仪式上的优先权,在每一个祖坟前面行俯卧的礼仪。当两宫太后到达咸丰的陵墓时,发生了严重的摩擦。慈安作为已故君主的贵妃,声称她有主祭的地位,并同时将她的同僚归入右边的位置,让最受尊敬的左边的地方空着。因为慈禧对这些感到不满,慈安继续提醒她,她们是共同摄政。向咸丰帝献祭就成了疑问,慈禧声称她作为贵妃具有优先权,在死后她已升到母后的地位上。作为贵妃,礼仪要求她在献祭的时候要在一边略靠后的位置上,但是留给尊敬的慈安的空位属于咸丰帝第一个宫妃的位子,这个妃子在他即位之前已经死了,死后被追封为贵妃。慈禧意识到这种加在她头上的的侮辱是恭亲王和皇族贵族鼓动的结果,她打算屈服,她专横地坚持要按自己的实际品级和权利采取相应的地位。争吵非常尖锐。慈禧正如她所盼望的,度过了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她每想到在祖先坟墓前的场景,以及当着周围大量随从的面对她的侮辱,从各方面来说对她的地位都是严重的挑衅。她已经在这次事件中丢尽了脸面,事实上这也影响到了她以后的行动和她与同僚之间的关系^①。

^① 很奇怪她会注意到在帝陵前经常发生不体面的争吵,其中的悲痛和激情,长久地郁积在宫廷中,发现了表达意见的机会。像这样的情况发生在1909年,在埋葬慈禧的时候,同治帝和光绪帝在世的宫妃们对于隆裕太后类似的优先权问题发生了争吵,拒绝返回城内,一直愤怒地留在坟前,后来才在派出的王朝贵族的劝说下谦恭地回去,对于正统来说到处都是大的丑闻。

在到东陵巡行的队伍中,荣禄是负责皇家卫队的总指挥,他是最值得两宫太后信任的护送人员。不久在返回北京以后,即使他作为慈禧面前最喜欢的人,也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招致了她的不快。自从在热河由于载垣等人的共谋,尤其是在随后同治帝死后的危机中,这个强悍的满洲人深得慈禧的宠爱和信任。作为她的管家,他一直有进入紫禁城的权利。但是在1880年,无疑他因不慎与已故皇帝宫中的嫔妃私通,饱受了对不自由的宫廷生活的厌倦之苦。这个丑闻是由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太后面前禀报的,但太后和荣禄之间从来没有丧失过爱。经过这次事件之后,宫廷中谣传四起。慈禧碰巧在宫廷中妇女的闺房中发现了他的勾当。荣禄立刻被剥夺了所有的职位,在接下来的七年内过着闲居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慈禧虽然保持住了她的高傲,但却由此丧失了可以信赖的忠诚顾问。不久,她就发现在那些奉承她的朝臣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他的位置;她非常想念他睿智的讨论、勇气和忠诚。但是一旦将他打发掉,她又极不愿意在他面前因为改变念头而在朝廷中丧失颜面。他的免职无疑加剧了她和慈安太后之间的摩擦,因为她怀疑慈安是与荣禄联络的同党。

最终于1881年3月,两宫太后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争吵,争吵主要是大太监李莲英以及他态度上的傲慢而引起的。慈安抱怨说她同僚最喜欢的这个忠诚奴仆无视自己的存在,使她根本没有权威,因此她才会被她自己的下属讽刺。她对此事甚为不满。她于是很快就揭发这个大太监臭名昭著的污行,那就是尽人皆知的所谓“九千岁”,这个无赖使她十分恼怒。^①

此时争吵特别厉害,一直以后影响到两个太后之间的关系根本无法和解。大家都心照不宣,普遍认为怒火到了严重的地

^① 这个称呼原来是给予明代的一个太监,由于他对风流放荡的主子的影响,他死后皇帝对他给以褒扬。同样的称呼也曾被宦官安得海使用。

步,是任何措施也解决不了的。况且慈禧太后对她权威的任何挑战都非常不耐烦,当时普遍有人认为是慈禧太后用毒药害死了她的同僚。在东方的朝廷中发生这样的谋害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拿不出证据作为反驳。因为不幸的事实是那些对慈禧太后野心造成阻碍或者那些招致她不快的人,常常都以不幸而终。当然这一切我们要想置之不理,就不能不对各种场合所发生的邪恶的阴谋视而不见。但是这些情况太多了,以至不能完全被仅仅看作是一种巧合。在当时,慈安太后突然得病而且是一种神秘的病,根据朝廷诏书上说的话说她“驾鹤西行”,在3月10日的晚上去世了。按照当时习惯的规定,在她死亡之前要草拟一份遗诏,而且这份诏书应该被后人看到,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一点遗诏的痕迹。这一切连同她的死亡一样,早已由她的残忍的同僚安排好了。在提到咸丰帝的贵妃的时候,年幼的皇帝记录了以下这样的事实:皇帝对她给予他的教育进行了公正的评价(她对皇帝的教育一直非常感兴趣)。诏令中的内容如下:

……且自御极以来,典学维勤,克懋敬德,予心弥深欣慰。虽当时事多艰,旰宵勤政,然幸体气素深强健,或冀克享遐龄,得资颐养。本月初九,偶染微疴,皇帝侍药问安,祈予速痊。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深思渐散,遂至弥留,年四十有五。母仪尊养,垂二十年,屡奉庆典,迭晋徽称,夫复何憾。

慈安生前曾恳求在她死后要以简朴的风格办理她的丧事,皇家致丧的日期从27个月减到27天。她的诏书的最后颇富有同情心,好像慈禧早已掌握了诏令的草拟权,因为她在诏令中把慈安描绘成一个“在宫廷中崇尚节俭的榜样”。她生前在她举行的宫廷仪式中不断阻止所有浮夸的作风。正如许多年来御史和高级官员

们对慈禧的控诉,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慈禧的铺张浪费。与慈安最后请求举办节俭的葬礼作为她简朴的生活的写照相比,无疑对慈禧来说是明显的讽刺。

慈安死了。年轻时的玩伴,这个姑娘过去已经无数次面对庄严而神秘的紫禁城,后来成为女人后,因为不能为皇室诞下继承人,不得不抹掉自己的性格转而支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多年以来懦弱的竞争对手——慈安再也不会给她制造麻烦了。从此以后,不用再篡夺权威,慈禧就能自由地掌握帝国这条大船,她成为帝国唯一的摄政者。

慈禧共同摄政的同僚死了以后,她从长期存在的是非中解脱出来,她终于获得了自由可以为所欲为,她的野心就是将由她单独毫无争议地控制国家的意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首脑。许多年来,自从她最喜欢的太监安得海被恭亲王和联合摄政的慈安撤换以来,她与恭亲王的关系一直很糟,因为她嫉妒他的影响及在政治才能方面声名鹊起的声誉。几年前她让恭亲王担任政府的顾问,从他那里学到了他行事的风格,并为未来的政府描绘了蓝图。慈禧不仅要给他分配公务,而且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成熟的经验,尤其是在外交方面的经验,在必要的时候她能容忍朝臣的抱怨。1884年,不管怎样,她觉得已经强大,足够独当一面,与法国的战争(是因为中国要求对东京即越南北部的宗主权而引起的争端)给了她一个机会和借口铲除恭亲王和他的军机处同僚,并给他以致命的打击。

她很快想到的一个将他撤职的借口是法国在闽江上摧毁了中国不堪一击的舰队,但是实际上太后陛下的真实理由是她相信恭亲王正和年轻的皇帝一起预谋反对她。他最近在某种程度上负责朝廷的一切上奏,因为在几份奏章中几个御史有力地公开谴责她道德堕落、挥霍无度。

她下诏解除这位政府的顾问,充分展示了她的手腕,从中

一直身份低微、没有得到任用。在发生了与日本战争的首次灾难之后,慈禧尽管已老但仍很明智,再一次向他寻求帮助。他再也没有享受到像早年初次摄政时的那种对慈禧太后的影响力,但是在他复职以后直到1898年去世,他在外国人中的名声还是挺大的。慈禧尽管不喜欢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已经不失尊严地接受了对他的降级。

在发布了以上的诏令以后,恭亲王被礼亲王成功地提拔上来,礼亲王是八个亲王家族的首领及努尔哈赤小儿子的后裔。他参与军机处的工作,在所有军机大臣中,比张之洞和孙毓文这些同僚地位略高^①。而后者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死敌。在任命他为军机大臣的时候,慈禧遵循她一贯喜欢的方法,在她的顾问中制造纷争,以便保持在他们之间由冲突势力所形成的她权威的平衡。

太后陛下的第二步就是激起暴风雨般的反对和批评。她命令在紧急问题上,军机大臣在向皇帝建议之前,应该与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协商,但是又补充皇帝在获得了大多数的许可后,她可进一步地就重大问题发布指导。这不仅完全是新的而且是一个不成文的改变,因为这事实上使皇帝的父亲成为执行者的头领,但也潜藏着对1875年给予国家的庄严保证的破坏,即关于给同治帝培养一个继承人。这一度激起了强烈的恐惧,醇亲王由此可能劝说他的儿子忽视了已故皇帝所立下的先祖的要求,因此构成了新的醇亲王家系。采用这样的策略对醇亲王有莫大的诱惑,因为与他和他的妻子(慈禧的妹妹)协商在他们死后就可享受到皇家的头衔和皇家的荣耀。在那种情况下,同治帝的统治事实上被取消了,后代传到大清王朝的远支就成为可耻的末流而不被

^① 孙氏到1898年2月一直得到宠幸,皇帝受翁同龢的影响想解除他的职务。当时慈禧太后对国事漠不关心,大量时间花费在戏院和颐和园中的娱乐上,对宫廷中的政治作壁上观,因此孙氏的生活一度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

尊崇了，叶赫那拉氏族就成为最有影响的家族。因此造成将来范围广泛的争吵、叛逆、计谋和朝廷中的阴谋诡计。事实上这种地位造成某种程度上颇类似于英国历史上约克家族和兰开夏家族的竞争。

一个皇族成员盛煜及其他学者，在上奏中强烈地要求慈禧太后取消这个任命并建议如果真需要醇亲王的意见的话，应该直接向她禀报而不是向军机处禀报。在奏臣中引起了许多争论，所有的人都盘算着挽回醇亲王的颜面而阻止他接受这个职位。他们怀疑他的健康是否能承受得住那样的压力，这个职位的责任与他的高位相一致；同时他们预见授予他独裁权力实际上无疑使他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结果太后将会是第一个表示悲痛的人。

此外，嘉庆皇帝不是曾经宣布（在 1799 年）凡是亲王世系，除了在紧急的情况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参与军机处的事务吗？

“的确是这样。”他们总结说，“凡出身亲王的人，利用职权，不能像普通国事那样遭受同样的惩罚，因为这个原因，他不应当担任政府职务。恭亲王曾经拥有这样的高位，但只是临时的，在任何情况下，与他协商的权力都远远小于赋予醇亲王那样的权力。因此我们尊敬地邀请你陛下虔诚地遵照王朝的法律，取消赋予醇亲王商议国事的诏令。”

作为拒绝之理由，请愿书起草者发现醇亲王并没有指望参加每天上午宫廷中的会议，他也没有篡夺帝国的特权让军机大臣到他的居处开会，御史们还不规则地公开指责亲王作为军机处之首脑所犯的错误。

御史赵尔巽（一个正直的官员，后来在满洲和四川担任总督）也以同样的口气上奏，如果一切都要醇亲王决定的话，他就发现军机处显得人满为患，作为皇帝的父亲，他的地位使他根本不可能胜任这个职位。“为什么，”他说，“她太后陛下不命令亲王

在需要他建议的时候不侍奉左右,让他亲自向她阐明他的观点呢?在这个过程中就不会有反对的意见了。”

对于这些抗议慈禧回答道:

……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始暂时奉命,此中委屈,尔诸臣岂能尽知耶?……经此次剴切晓谕,在庭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奏,应毋庸议。

这份官方抄件有趣地提示着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她在处理类似对于忠诚和尽职的问题上与慈禧太后有着惊人的相似。

第十一章 退休的慈禧

1887年光绪已经十七岁了。慈禧看到她面临着从统治内外的迹象上看都有归政于光绪的必要。这个变化自然容易被她周围的那些喜欢逢迎的大臣和皇室贵族所理解，这些人在最后的十年里都沐浴在她那无拘无束的权威和保护的阳光之中，因而他们的地位和优势可能会面临着另外集团的威胁。因此她希望从责任重大的公职上退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是，请愿和抗议不断涌来，乞求她继续控制国务哪怕是一会儿。她决定不为这些劝说所动。直到1889年2月她才决定把国家的统治权移交给皇帝，这时皇帝和她的弟弟桂祥亲王女儿的婚姻已经确定。

慈禧当时已经五十五岁了。她掌握着天朝帝国的统治已经将近三十年。她尝到了独裁政治的甜头，对她的统治能力非常满意，但她好像并不想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她乐于将正式的紫禁城的国事交出来而自己在颐和园中过着相对自由的生活，而颐和园当时也正在重建中。她总是渴望变化，她被大臣们和官方文告折腾得厌倦了，列强对中国边界领土的垂涎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她对辉煌的宴游和休闲也感到毫无兴趣。她不能一直待在朝廷上，光绪帝还活着，只要不是公然篡夺的行为，而仅能等到他受到考验、发现自己的欠缺，就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不放手让他去处理政务。一些外国和中国的作家一定会归因于这一时期

她的放任政策,认为她的手腕尽管隐蔽,但从来没有从紫禁城的国家事务中抽身而退。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看法得到了验证;但是慈禧在颐和园的退休,粗略地讲持续了十年,在这相当长的时期内她无疑不再关心国事,更不用说这直接影响了她内库的补充。

但是当剥开她统治外在的和看得见的迹象,可以看到慈禧无意要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因为她与当时的国家事务失去了联系。从她退后在北京的山脚下建立的豪华的隐居来看,她可以密切注视皇帝的作为,并在首都和各省保护她私人追随者的利益。她从来没有放弃过任命大太监以解除官员的权力。

在让皇帝和她的侄女订婚后,慈禧避免再犯以前在她的儿子同治帝身上所犯的错误,他与善良而勇敢的皇后的婚姻成为反对她的危险的诡计,直到死后才摆脱了对她的冒犯。这份经历提醒她,在目前情况下,她要选择与皇帝巧妙的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必须在他身边安插一个人经常监视并向她报告皇帝的行动和倾向,她天生拥有叶赫那拉家族的智慧 and 意志力。最初她与皇帝关系非常糟糕。他们之间经常爆发激烈不断的争吵,这在朝廷中已不是什么秘密,在这些争吵中年轻的皇帝通常都成为胜利者。造成的自然结果是,光绪帝培养并表现出对两个贵妃的喜爱,这两个著名的贵妃分别是“珍妃”和“瑾妃”。

皇帝设想自己统治伊始,就对那些叶赫那拉氏族的高级官员表现出强烈的感受,趁此机会应当加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这就必须将皇帝父亲协商的权力提高到比她已拥有的权力更大的地步,这关系到他作为皇帝的神圣性。这个建议一提出来,便遭到了慈禧太后的拒绝,说是为了给醇亲王一点“颜面”。这说明在中国的王朝事务中的潜流是如此困难,是欧洲人很难追寻的。

醇亲王追随者的观点在向慈禧太后的上奏中再一次提出,这个人便是吴大澂,以前曾做过监察御史,当时担任黄河河道总管的职务。在这张奏折中,他提出要让醇亲王担任海军部部长,

并赞扬了他的为国敬业精神、热情和忠诚,看到他毕竟是皇帝的父亲,因此在王朝上下享有崇高的敬意,为了表示这份孝心,皇帝应该马上颁令。请愿者还进一步劝告说作为天子应该得到权威的特别认可,应该尊敬父母,遵循孟子的“圣人人伦之至”。像通常一样,这篇奏折强调他对历史先例的引用,并举了一个例子,提到在乾隆帝编辑的朱熹的著名历史著作中,宋代的两个党派在授予皇帝父亲的称号上发生了矛盾(公元1050年)。在那个例子中乾隆陛下(作为一个评论者)反对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因为他支持皇帝的父亲并为之辩解,作为对孝道的提倡这个问题,应该格外尊崇。他引用了明代(公元1525年)的一个例子,尽管他父亲过去只有亲王的头衔,皇帝还是想把他的父亲升到皇帝的等级上。换句话说,乾隆帝把以前王朝的先例当作最高权威,把父子之间的血统关系放在高于其他一切关系的习惯之上。请愿者最后建议,尊醇亲王为太上皇的称号,慈禧太后应当在她统治的最后实践中宣布这一点,因此皇帝陛下对孝道的虔诚才能彰显。

有一切理由相信以上的请愿书立刻触动了有关官方,使得她有机会将她自己的观点列入记录,并赋予醇亲王家族极大的荣耀。在赞扬了亲王和他始终不渝的忠诚以后,她继续说:

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本日据吴大澂奏请飭议尊崇醇亲王典礼一折,皇帝入继文宗显皇帝,寅承大统。醇亲王奕诤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十余年来,深宫派办事宜,靡不殚竭尽心力,恪恭尽职。每遇优加异教,皆再四涕泣恳辞,前赏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非徒深宫知之最深,实天下臣民所共谅。自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醇亲王即有预杜妄论一奏。内称历代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侂秀王之

封为至当。虑皇帝亲政后，金壬倖进，援引治平嘉靖之说，肆其奸邪，豫具封章，请俟亲政时，宣示天下，俾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其披沥之忱，自古纯臣居心，何以过此！此深宫不能不嘉许感叹，勉从所请者也。兹当归政伊始，吴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将醇亲王原奏及时宣示，则后此邪说竞进，妄希议礼梯荣，其患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并将醇亲王原奏发抄，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轨，超越古今。即贤王心事，亦从此可以共白，嗣后阙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覬覦乎？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醇亲王原来的奏章呈上的日期是1875年，除了其中多所陈述以外没有特别的重要性，即使在当时那个时候，在帝国继承问题上仍然产生了危机感，相当多的人都渴望对未来的形势作出一些调整。他在奏折中所表达的意思已经清楚地加以晓谕，就是他希望阻止那些谄媚者以他的名义在紫禁城中结成党派，这些念头（可以看得到）已经过去。他表示对陛下开始的统治感到悲痛，“官员来源混杂会导致他们自以为，通过狡猾而不忠的建议，他们就可以蛊惑皇上，通过制造纠纷的机会他们就可以升到高位”。

皇帝的父亲因此继续保持世袭亲王的头衔。

不久以后慈禧太后从公职上退下来，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也得了病，最后病情加重，直到1891年1月1日死去。1890年，监察机构，对法律和孝行的虔诚的礼仪和法律的惯例十分关注，抓住时机，上了一份抗议的奏折，吸引了她太后陛下注意自己的责任，以及皇帝陛下的责任，包括探访废疾者的责任。慈禧太后指责检查机构作为对他们的回答，由此使她坦率地注意到自己的行为，这种举止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伊丽莎白女王处理类似抗议的方法。不管怎样，她得到暗示，在1890年夏季，不断地去醇亲王的病榻前问候。

偿),在他们中间,忠诚的荣禄一度回到老佛爷的身边,并荣升为北京戍守部队的指挥官(在他人生最后的三年内他一直待在西安当闲职的鞑靼将军)。帝国的每位官员都被“邀请”捐献自己薪水的25%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慈禧太后,仅这一项收入就达到了几百万两白银,为豪华的欢宴准备好了一切。为了显示对她老人家的尊崇,在北京和颐和园之间的大路上矗立的凯旋拱门达五英里之长,而当时不断的灾难正突然袭击着中国,不久以后就爆发了中日战争,使得她不得不重新考虑当时的形势,最终取消了祝寿的安排。她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略感悲惨的诏书:

本年十月予六旬庆辰,率士胥欢,同深忭祝。届时皇帝率中外臣工诣万寿山行庆贺礼,自大内至颐和园,沿途蹕路所经,臣民报效,点缀景物,建设经坛。予因康熙乾隆年间历届盛典崇隆,垂为成宪,又值民康物阜,海宇又安,不能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情,在颐和园受贺。詎意自六月后,倭人肇衅,侵入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至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仍,两国生灵,均罹锋镝,每一念及,悯悼何究。前因念士卒临阵之苦,特颁内帑三百万金,俾资饱腾。兹者庆辰将届,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受台菜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着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钦此。朕仰承懿旨,孺怀未安,再三吁请,未蒙慈允,敬维盛德所关,不敢不仰遵慈意。

中国被日本的军队彻底打败,这对大清王朝来说无疑颜面扫地,并且引发了南方各省要求改革的激烈狂潮,最终导致了政变和义和团起义。无疑,战争的后果能否在不牺牲和被羞辱的情况下避免,在这一点上,慈禧太后表现出了超常的睿智,为了避免担当最后战争失败的责任,皇帝必须表达自己作为决策者的

身份并负出部分责任。她知道,正是由于大太监的建议,为了给她提供资金重建并装饰颐和园,海军已经多年资金短缺,而这一事实连中国当时最为著名的一些顾问也并没有意识到。

作为一方总督,李鸿章建议应该以武力保持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而他这一主张通常总是受到各方责备。但是从对这个问题个人认识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像许多帝国其他的部长所面对的情形一样,在决定是否要冒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危险之前的最后一刻他一直是犹豫不决的。关于这段历史,可能会更翔实地保存在天津的总督衙门和北京的海关总署的文献,不幸于1900年被毁,其中引起的直接原因也许从来没有被彻底地弄清过。李鸿章也许意识到日本两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第一次(1874年)以获得赔偿告终,第二次(1885年)被迫承认日本控制朝鲜,这样的一再让步终于直接导致目前的危机。他意识到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那样对中国政府也没有什么好处),不久就会导致丧失对满洲行省的控制,正如那些行省在1905年所造成的命运未卜的事实那样。当时中国勉强同意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在外交上开始对中国所采取的敌意方法并对中国进行的攻击是不合道理的。李鸿章完全知道日本多年来所做的准备,也同样知道自己国家的海军和军事资源的缺乏,但是他像1900年的满洲人一样被官员们所包围,这些官员们对中国巨大的优势充满着信心。他得到了驻朝鲜军队(袁世凯)的保证说英国即将在日本开始的敌对行动中帮助中国。无疑英国对中国政府充满同情,这一点很明显地反映在英国驻汉城(现首尔)总领事的态度和行动中^①。

中国历史学家公开地对李鸿章鼓动朝廷和皇帝进行一场反

^① 瓦尔特·希列尔先生,由袁世凯于1908年任命为军机处的外国顾问。当袁世凯被迫在日本人进军之前从汉城(现首尔)逃走,他由一支水兵护送到济物浦(即韩国的仁川港)。

对侵略的战争上进行控诉。这种责难在海外通常得到支持。事实的真相是李鸿章最初支持中国派军队镇压朝鲜的起义，但他反对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与日本发生战争的措施。不管怎样，在最后的情形下，他一旦发现战争是日本的目标时，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积极劝说下，要作出应付一切的最后准备，他派出命运不济的“高升号”，而当时“高升号”的全体船员的任务是在朝廷授权下到朝鲜了解战争的事实。“高升号”刚被击沉，他就得到战役灾难的报告，自然努力将他在战役中的责任减小到最低限度。

外国人责备他发动对日本的战争，正如他们以后攻击他将满洲卖给俄国一样；国人则攻击他背叛中国向日本求和。慈禧太后对这位总督也不是十分喜欢，尽管她钦佩其非凡的才能和机敏的处事。但是，就在战争之后，他受到了几个御史的攻击，她发现他的名字总是与被归咎的责难联系在一起，而她则总是为他辩护，这是她的一贯做法。1895年一个名叫安维峻的人大胆地谴责太后陛下和总督大人（指李鸿章）给中国所造成的灾难。他说：

安维峻奏：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今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对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则有意勒扣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以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节署为捕逃藪，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为美国人有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惊之说，竟敢直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

始,正如隆裕太后所说,他们的主张往往与宫廷中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慈禧太后的侄女(即皇后)开始公开地疏远皇帝,随着改革趋势的发展和形成,他们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张。从1894年到1896年,皇帝对她威严的姑姑的态度没有明显的变化,也没有引起任何一点关注,但是这个受到排挤和压抑的男人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和的前兆。当1896年,皇帝的母亲(慈禧的妹妹)死去,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最后一个友善关系的纽带和可能的和解已经被彻底切断了。

服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康有为对慈禧太后和荣禄的抨击明显地不是出于爱国者的愤怒而是他基于这样的事实,只要慈禧太后仍然掌握着权力,他的野心就永远不会实现,更不用说获得自己的地位。

第十三章 百日维新

就在康有为第一次拜见之际，维新的诏令一次接一次地迅速颁布。旧的考试制度从宋代以来势力一直都非常强大，短暂的中断（在康熙帝统治时期），此时一定要废除。皇帝说，在将来，在公开的考试中试卷一定要注重对实际问题的考察；而对古典知识的考试，只保留在文学课程上；对官吏的候选人将考察他们对其他国家历史和当代政治知识的掌握上。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礼部尚书许应骙（他尽管是一个广东人，却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遭到了御史宋伯鲁和杨深秀的公开指责，他们指责他阻碍维新诏令的颁布。他们恳求皇帝要“表示圣怒而将许氏降到四品官以警告其他敢于冒犯改革的人”。

宋伯鲁等奏：

臣伏读四月二十三日上谕，仰见皇帝赫然发奋，图新自强，而尤垂意于学校外交两事，此诚储才之急务，保邦之远猷也。臣维礼部为学校总汇之区，总署乃外交铃键之地，必得人以为理，始措置之得宜。窃见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品行平常，识见庸谬，妄自尊大，刚愎凌人。礼部为文学之官，关系极为重大，国家学校贡举之制，多由核议。皇上既深维穷变通久之义，为鼓舞人才起见，特开经

才，转移风气起见，当经议准复陈。若臣意见参差，可不随同画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诽？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任意捏诬，已可概见。至岁举中额，应由臣部妥议具奏，恭候钦定。臣维事关创始，当求详慎，自古名臣著论，斤斤以珍惜名器为要图。况乡举一阶，胶庠所重，倘过为宽取，恐滥竽充选。鄙夫之所喜，即志士之所羞，人才何由鼓励？是以与同部诸臣熟商，定额期于协中，既不敢存刻之见以从苛，更不敢博宽大之名以要誉。且现未定稿，该御史竟谓臣务欲裁减，不知何据而言？向来交议事件未经复奏以前，言官不得搀越条奏，今该御史隐挟存见，逞臆遽陈，殊非体例。原奏又称诏书关乎新政，下礼部议者，臣率多方阻挠一节，近来迭奉明谕，如汰冗兵，改武科诸政事，均不隶臣部，岂能越俎代谋？此外惟杨深秀厘正文体一折，系奉旨交议。按之西学时务，无甚关涉，且未拟稿，何得云多方阻挠耶？原奏又称臣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之如仇一节，窃臣世居粤峽，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讲求西法，物色通才，如熟习洋务之华廷春，精练枪队之方樾，善制火器之赖长，均经先后奏保。及东中事起，三员业早凋谢，未展其才，臣深惜之。方今时事多艰，需才愈亟，凡有偏长片技，堪资实用者，臣断不肯四区之交臂。即平日接见门生后辈，无不虚衷咨访，冀有所益，并助以务求实际，无尚虚华，初何尝痛诋西学？该御史谓臣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似指工部主事康有为而言。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幸进，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观听。即臣寓已干谒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嗣在臣省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比者飭令入对，即以

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乃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舛望。臣在总署，有堂属之分，亟思中伤，捏造浮辞，讽言官弹劾势所不免。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尝论今之西学自矜者，绝无心得，不过藉端牟利，借径弋名，臣素服膺其论。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师，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谣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臣嫉恶如仇，诚有如该御史所言者。原奏又称臣深恶洋务一节，臣自承乏总署，已逾一载，平日仰蒙召见时，辄以商务、矿务、制船、制械等事，皆属当务之急，屡陈天听，请次第施行。臣是否窒塞风气，应亦难逃圣鉴。窃自胶事定议后，总署交涉事件，益难措手，倘徒争以口舌，断不能弥隐患。臣望浅才庸，自揣万难胜任，惟有仰恳天恩，开去总署差使，俾息谗谤而免陨越，实为厚幸。

皇帝为许应骥对康有为公开的谴责感到非常愤怒，但是他还不能鼓足勇气解除他的职务从而冒犯慈禧太后，因为许氏非常迎合她的口味并得到她老人家的保护。慈禧太后不仅细读请愿书而且也为许氏所警惕的维新者的革命趋向而暗中留下了印象。从那天起，尽管没有公开反对维新，她已经开始怀疑康有为对皇帝的影晌，但是她在等待时机。她不露声色，否则光绪帝就会解除许应骥的职务。她特别召见王文韶，王当时在将大权移交给直隶总督荣禄后刚从天津回来。他坚决支持许应骥，并且要密切注意皇帝所颁布的有关措施。在这次拜见之后，光绪帝颁布了一道诏令允许许氏保留职位，但是警告他将来要在礼部和总理衙门的职位上更加努力。许氏把这看作由于慈禧的保护而获得的决定性的胜利，比以往更加反对维新；由于在礼部的他的同僚

满洲人怀塔布站出来坚定支持他。

皇帝的下一道诏令是重建京城的满洲军队,而这支军队过去已经衰微不堪,并在各省建立大学和高等学校,而相应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

御史文悌上了一道奏折控告他的同僚宋伯鲁和杨深秀出于对许应骙私人嫉妒,借口蛊惑皇帝以制造与慈禧太后的不和。这激怒了太后陛下,她立即以激起党争为由解除了他们的御史职务。他们在上奏中已经承认了对许氏的责难。文悌因此进行指责,并怂恿怀塔布到颐和园努力博得老佛爷对他的同情。然而她拒绝在这件事情上采取行动,这时候还没有埋怨皇帝的成熟的时机,她宁愿给那些进步分子他们想要得到的机会。这促使她将裕禄,她的一个旧宠任命为军机大臣,这个官员经常定期地向她报告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他是以刚毅为首的顽固派的代表,反对维新。后于1900年在担任直隶总督时,他没有支持刚毅屠杀外国人的阴谋计划,刚毅是一个著名的义和团运动的支持者。只要有刚毅、王文韶和裕禄这三个人在军机处,维新就很少有机会并达到真正的意图。不管怎样,皇帝会愿意发布诏令,但是在保守派发动反攻之前,他们一定要赢得慈禧并使她公开站在己方一边,包括荣禄在内。

大约在此时光绪帝责备另一个御史在书法上的一个小错误,就是说一个字^①写得不正确。然而,一星期之后,皇帝下了一道诏令,明显地表现出受了康有为的影响,在这道诏令中要求在以后的公开考试中书法不再形成特殊的条件。“在某门公共选拔考试中整洁的书法无疑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在将来的重要考试科目中将任命抄写员。”

在6月8日这一天,皇帝诏令出版帝国的官报,康有为被安

^① 皇帝在这样的问题上以自己的固执己见而自豪,许多年轻的官员都因为他急躁的脾气在严格处理他们的举止上而害怕他。

排为上海的邸报总负责人。这些官报都是官方报纸，他们的目的是传播一般性的知识。他们都将受到政府的补助。这些官方报纸都要抄写以供皇帝细读；并且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所有的弊端都可以大胆地被揭露。康有为指导草拟这方面的出版章程。

6月23日这一天，皇帝又发布了一道有力的诏令，倡导官僚阶层要将注意力转移到维新方面。皇帝宣布，迄今为止官僚中所表现出来的拖延推诿令人感到沮丧。在政令中说：“停滞是内部严重疾病的征兆；令人绝望的弊端产生于麻木不仁之中。积极的改革家如陈宝箴，湖北总督，成为官绅们激烈辱骂的目标。因此我想让你们原谅我的焦急而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才能从倒退的过去中获益，才能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

皇帝又下了一道诏令命令建立海军大学作为重建中国海军舰队的第一步。铁路和矿物局建立在北京。广东改革家梁启超负责译书局，出版外国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方面第一流的著作，每一名助手给一千两白银作为其日常费用。

但是新的变化比这些更令人吃惊，保守集团由荣禄在请愿书中对发布的诏令作出了反应，荣禄一直支持在军事方面的改革。因此，宣布皇帝将陪同慈禧太后乘火车9月5日到天津，并在那里检阅军队。保守派听说慈禧太后将乘火车旅行都感到惊骇，但是慈禧太后一直喜欢在冬宫的小铁路上乘坐火车，一想到这样新奇的游览她非常高兴。然而依照满洲人的礼节对此是不以为然的，更为沉重的打击是下一道诏令，要废除许多陈旧无用的政府机构和闲职部门。冗职，这是几代以来那些数以千计闲散人员都感到有利而乐于钻营的部门，但对国家来说是一种负担。

这道诏令被公然谴责违背了满洲王朝的传统，各方面都呼吁老佛爷保护统治阶层的特权。然而两天以后爆发了攻击，所有礼部的高级官员，包括许应骙和慈禧太后的亲信怀塔布因为被秘书王诏查禁了请愿书而立刻撤职。在这份文件中提议皇帝应

当陪同慈禧太后到国外旅行,先到日本,最后到欧洲去。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几乎所有担任高级官职的保守派都齐聚颐和园恳求慈禧太后,说挽救国家唯一的希望在于她重新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老佛爷让他们再忍耐一下——所有的计谋都用光了,但是她也不准备动一下。

康有为认识到危险将近,他误以为慈禧太后优柔寡断,从而促使皇帝反叛她的权威。他一再向光绪帝保证说她对维新的同情是虚假的,恰恰相反,她本人是中国觉醒的主要障碍,她的印象的确是国家腐化和沉闷的重要因素。怎么能允许她每年浪费政府的数百万资金保持她在颐和园建设上的挥霍呢?他建议皇帝发动奇袭,包围她的住处并活捉她,将她囚禁在冬宫湖上的小岛上以度过她的余生。然后,他发布诏书历数她的罪状并宣布自己的决心和意图,再也不允许她参与政府的事务。这次谈话是在宫廷中的密室里进行的,但是有理由相信由李莲英雇佣的一个太监作为奸细,把这一切报告给了慈禧太后。皇帝竟愚蠢地参与到支持这个计划的行动中,但是决定在实施之前要等待宫廷原计划到天津的旅行。他知道要确保计划的实施,必须能够获得军队向他效忠,他认识到只要荣禄掌握着外国训练的直隶军队,他就别想动太后一根手指头。因此,在皇帝看来,这是他面临的最大障碍。真正的危险在于慈禧太后个人的巨大影响和她丰富的资源,他显然低估了慈禧,误以为她的不行动是由于优柔寡断。

这时候他继续发布新的政令,一边命令在北京铺筑碎石路,另一边招募军事力量以加强国家的防卫,此外还准予满洲人离开北京,在各省谋生。在7月27日,他颁布了最后一道重要的改革诏令,从以后所发生的事件来看,这份文件显示当时皇帝的心情是悲惨的:

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牧民之政,中外所同,而西

人考究较勤，故可被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囿于成见者，谓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令教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新法，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令其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交迫，尤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犹有未知，咎在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大夫，不能广宣朕意，共知其法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着查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刊刻月誉黄，切实开导。着各省州县教官详为宣讲，务令家喻户晓。各省藩臬道府，飭令上书言事，毋得隐默顾忌。其州县教官应由督抚代递，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不得稍有阻格。总期民隐尽得上述，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此次上谕，并着悬挂各省督抚衙门大堂，俾众共观，庶无壅隔。

但是至此，皇帝已是黔驴技穷了。慈禧太后从隐蔽的深宫中走出，光绪帝执政的短暂时刻也结束了。

第十四章 1898年的政变

1898年8月,宫中的形势(只有几个人知道)使慈禧太后赢得了反对派的支持;然而她推迟了决定性的一步,直到她和皇帝在9月决定去天津视察。在重新摄政之前,她打算与荣禄协商,因为她明白南方各省普遍对她充满敌意,她希望能有所缓解,并要尽可能避免采取任何公然篡夺的措施直到她准备好了一切。8月1日,皇帝住在颐和园,亲自召见袁世凯,详细与他讨论王朝的政治计划。袁氏(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应感激李鸿章对他的保护,使他升迁非常快。尽管他的许多竞争对手和政敌把1894年与日本灾难性的战争,归因于他在驻朝鲜军队的专断行动上。他的报告说明了在汉城陷入的处境,如果他们不惹起事端,危机也会使中国政府派遣军队进驻朝鲜。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有备而来,他们希望尽快结束中国在朝鲜的统治。事实是,这并没有削弱袁氏的



袁世凯

个人声誉和他在朝廷上的影响。因为皇帝的这次拜见是由袁世凯公然宣称对维新的兴趣而引起的，皇帝确信自己已赢得了强大的支持者。皇帝已经认识到他现在必须对老佛爷不妥协不退让，就在最近她严厉谴责他竟然接受了康有为的提议，他应当依照自己的权威行事。他知道，在帝国里没有一个像荣禄这样突出的满洲人，因为他总是忠诚地支持慈禧。正如北京所关心的，如果老佛爷一味积极地站在反对派一边，没有一个中国汉人敢公开反对老佛爷。北京只有两个高级官员有望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两个人就是广东人张荫桓和贵州人李端棻。但是如果他能获得对北方外国训练的军队的控制，反对派也许会被击败。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解除直隶总督和对外国训练的军队有指挥权的荣禄的职务，这一切必须在慈禧太后识破这个计划之前动手。皇帝因此打算在天津的衙门里处死荣禄，然后迅速带领一支 10000 训练有素的军队赶往京城，他就能将慈禧太后囚禁在颐和园里。北京的大多数著名的反对派分子，例如刚毅、裕禄、怀塔布和许应骙在他们的住处被逮捕，这些人理应受到惩罚并被投入监狱。这是康有为、御史杨深秀和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和刘光第提出的计划。在第一次召见袁世凯的时候，皇帝就告诉了他要坚持维新的政策，在问到如果让他指挥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时，他是否对他的统治表示忠诚。“臣将竭力以报陛下之恩”，他回答道，“即使只是沧海一粟，只要臣有一口气在，必当肝脑涂地，以效犬马之劳。”

得到了袁世凯的承诺，看到他对维新明显出于真正的热情，皇帝直接颁布了以下一道诏令：

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当勉

理西园里的英秀门,那里是瀛台坐落的地方,是他进入宫苑之后接待她老人家的地方。

袁世凯中午之前便到达天津,立刻前往荣禄的总督衙门。他问荣禄是否把他看作忠实的兄弟。(两个人曾在几年以前发誓拜过把兄弟)“当然我把你看作我的兄弟。”总督回答说。“你也许会知道,皇帝派我来杀你,但是我背叛了他的计划,因为我忠诚于皇太后,也爱你这个兄弟。”荣禄显然没有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只是对老佛爷对这些事情一直一无所知感到吃惊。最后他说马上于当天晚上赶往北京去见慈禧太后。袁世凯把皇帝的诏令交给他,荣禄乘坐一列专车,下午5点钟就到达北京。

他径直进入太后的住处,不顾不奉特旨任何省级官员不得随意进京的严格礼仪,更不顾严格的护卫宫门出入的规定,径直就进入了太后居住的地方,叩头三次,大声惊呼:“救命,太后陛下!”“在紫禁城里你要求什么庇护,也没有什么人会伤害到你,你也不必这样害怕嘛?”老佛爷回答说。荣禄上前去把所有策划的细节告诉了她。勇气和男人般的才智使她必要时能克服一切障碍,她命令他秘密传话给保守派的领导人,立刻在瀛台召见他们(当时皇帝仍在紫禁城内)。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所有军机大臣,几个满洲亲王和贵族(庆亲王,虽然在危机时刻有很好才能,但因为有病而申请了病假,所以暂时不在),还有各部的高级官员,包括两个被皇帝撤职的部级大臣(许应骙和怀塔布)都集合在太后的面前。这些官员都双膝跪倒在地,乞求太后重新执政,挽救被蛮夷文明的罪恶蹂躏的帝国。太后迅速安排紫禁城的守卫,用荣禄的军队所代替,同时,让荣禄返回天津听候进一步的命令。会议大约在半夜里召开。皇帝在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准时进入中和殿细读礼部草拟的连祷文,这是第二天要在秋祭守护神时朗诵的祭文。他在离开中和殿时,便被卫兵和太监逮捕,押送到瀛台湖心岛上的小宫里,并通知他说太后不久就会来拜访

他。下面是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诏书。谕曰：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竟业之余，时虞从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在皇帝诏令下了之后，紧接着又下了一道诏令撤去宋伯鲁的御史之职，理由是他的恶名和引荐梁启超等。太后陛下颇迁怒于此人，因为他竟敢在最近的上奏中冒天下之大不韪指责她的道德，但是他没有参加反对她的阴谋，她饶他不死。

慈禧定期在李莲英的陪同下到湖心岛的小宫中去看一看，命令将皇帝的太监都换成了自己的人。（光绪帝以前的奴仆要么被处死，要么被流放。）一个满洲人从慈禧的小弟弟桂祥那里听到了一番话，说我们的权威就是在这次戏剧般的会议上发生的。慈禧太后厉声地对光绪帝说，她决定暂饶他的性命，目前无论如何允许他保留皇位，但是从此以后他必须被严格看管，他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向她报告。至于他的改革计划，起初她是鼓励的，但是绝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被愚蠢的假想冲昏了头脑到了这么深的地步，这些改革措施都将被废除。他怎么能够忘记他欠她的一切好处，他的登上皇位，她的宽宏大量允许他管理政府，他是一个可怜木偶，根本不配当皇帝，她什么时候愿意就能摘掉他的皇位。但是她说，没有一个处在高位的满洲人愿意他被撤去皇位，大家都催促她重新摄政。确实他在汉人，所有的叛党那里有许多同情者。她在合适的时候会处置他们。光绪帝的妃子（珍妃和瑾妃，其中的一个妻子他好像非常钟爱）跪在慈禧面前，恳求她不

要再责备皇帝。其中一个妃子甚至壮着胆子说他毕竟是合法的统治者，慈禧若没有他，必然会被取消上天的委任统治。慈禧愤怒地将她从眼前赶走，并命令将她囚禁在另一个宫中，在那里她一直被囚禁到1900年。这时有了机会报复专横的太后^①。

光绪帝几乎没有跟贵妃说过话，她被命令与皇帝待在一起，她是慈禧的侄女，深得慈禧的信任并暗中监视皇帝，并将他的行为报告给太后。他不允许见任何人除了她和侍奉的太监，或者除了去见太后陛下外。

在临终时光绪帝一直责备袁世凯背叛了他，正是袁世凯使他遭受羞辱，他所希望的政府改革计划结束了，他还必须忍受在湖心岛上二十三个月的监禁生活。他死前的最后遗言几乎就是乞求他的兄弟们记住他永久的痛苦并答应为他没有做成的事业复仇。至于荣禄，他说那样做是自然的，因为他应当首先想到自己的职责就是警告太后陛下。毕竟在他计划将荣禄处死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献身或忠诚。老佛爷的憎恨也是自然的，因为他策划了反对她的计划而没有成功。但是袁世凯已经庄严地宣誓忠诚和服从。皇帝永远不愿与他说话，即使他当上直隶总督，登上权力的最高峰。

在慈禧去世以后，袁世凯卸职了，因为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实践了皇帝的诺言。这就是围绕着皇位内部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人性，这是决定人类命运因素在人类平衡上的永远不会结束的难题。

^① 在慈禧的命令下，她被投到一个井里，当联军进入北京时，朝廷正准备逃走。

第十五章 慈禧重新摄政

光绪帝的统治结束了,对他来说只保留了皇帝的空头衔。他过去曾有过机会,在他充满激情和新观念的青年时期,他不顾一切反对最高统治者的黑暗权力,可是他失败了。在同治帝去世后,慈禧再度最终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她曾经让她的侄子自由掌握政权,而她自己退休下野,让他独自掌握国家这只航船;如今他将这艘船驶进动乱和危险的大海,为了满足公众的愿望,她一再被要求出来掌舵,这是上天的意志,而不是她的错误。与其说她责备光绪帝的愚蠢,不如说恶毒的习惯和她儿子过早的死亡,把她带回到了二十三年前的权力中心。很清楚(许多声音在事实上恢复了她的自信)许多重臣一直都在为她继续垄断最高权力而不断地拼命努力,哪怕是给予的任何微不足道的支持她都不能不对他们进行密切的细察。

光绪帝的统治结束了,这个人尽管脆弱,但是在被囚禁的瀛台仍然存在,慈禧从来不会采取折中办法或处在言不由衷的地位。从这个可怜的君主进入湖心岛的囚室那天起,她就开始以传统的古典方式为他的归宿做了安排。她给皇帝提供了另外一个位置,他的青春和温顺使她能够牢固地掌握摄政大权。然而,因为南方人狂暴的脾气和欧洲人对皇帝乌托邦梦想不可思议的同情而可能发生的示威运动,她意识到做事还是有必要小心和礼貌。据

10月初京城普遍盛行的传言说,皇帝将会在这年岁末去世。

光绪帝注定成为他自己宫中的一名囚犯,这一点他很清楚,然而他必须扮演好傀儡天子,必须按每一个季节摆出的特定姿势去表演。在8月8日这一天,整个宫廷向慈禧太后行依制大礼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已不存在,只有太后的权威才是至高无上的。下午,由荣禄的军队护送,他从湖宫里走出来向月神的祭坛献牲。可怜皇帝走在空荡的由高级祭司组成的国家仪仗队里,由于政变而造成皇帝的地位岌岌可危。面对着一派帝国的盛况,此时他的思绪一定苦不堪言。他感觉到他本身就是下一个帝国的牺牲品,身处此屈辱的境地他是多么的孤独!

慈禧专心地回到原来的政府工作上,经过多年的操劳,她的热心一点也没有减退。起初她一定要证明她自己更愿意采取保守的政策,这一点对她的高级官员来说,一切都是正当的。她一定要除掉那些敢于冒犯她的人,在她周围都是她称心如意的男人们。

中秋节过后的几天,皇帝忧郁地出游,太后接着想起皇族的地位不足以使他们免受这次谋逆事件的影响,她的老练使她随时都能发现满洲亲贵中的任何一点阴谋的迹象(这使人不由得想起载垣的阴谋)。她于是在诏令中一再进行警告,在诏令中她判处贝勒载澍^①永远被囚禁在王宫的空室里。载澍大胆地同情皇帝的改革,他也很倒霉地与慈禧的侄女结婚,他与其侄女的关系一直很糟。因此,在百日维新之初,他建议皇帝一定要结束老佛爷对国事的干涉,也就是说宫中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报告给她,更不能站在反对派的那一边,让他们得到她的同情和参与。

政变后不久,京城的公众舆论分成赞成皇帝提出的改革一

^① 注意到在宣统统治下这个满洲亲王(载澍)摄政,皇帝的哥哥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被任命为满洲军队的总指挥,而在同一天,袁世凯被撤去了直隶总督的职位。皇帝为首的帝党,反对叶赫那拉氏家族,衷心赞成他的复职。

方和认为镇压他们是明智行为的另一方,但是出于京城中为政治歌功颂德的本能,通常说,这一切是不明朗的,主要还取决于从政者的权力手腕。从总体上看,同情是在老佛爷这一边。因为她有一种引导公共舆论的俾斯麦的方法,她能通过太监和茶室的闲聊方式指导信息的传播,以一种算计的方式吸引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本能。在目前的情况下她着重强调皇帝缺乏对孝的虔诚,以他策划对他威严的婶婶的背叛(在正统的儒者看来这是不可饶恕的事情),而且事实上他喜欢同情和支持外国人。这一论据即使在那些进步的中国人眼中也足以使他倒霉。因此,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太后在危急时刻表现出的判断力和自控能力是令人赞叹的,慈禧太后重新掌握朝政是完全合理的。这个观点甚至在那些原来也承认从皇帝的改革看到了中国新时代黎明的人来说,也逐渐被接受并由公使馆人员表达了出来。随后外交在面对一系列较少的阻力时是有弹性的,他们在接受既成事实方面是如此熟练(在缺乏自主的政策方面),不久以后使馆人员的官方态度——包括英国的态度,逐渐谴责皇帝在引进改革方面太急躁。从1900年以后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在已经催促了多年的改革,才被慈禧太后接受并成为一条原则。这一点再次证明,改革作为中国即将到来的再生而应该受到欢迎。1898年6月,英国外交大臣曾在皇帝的改革诏书中看到“朝廷最终彻底认识到需要根本的改革”。10月,当主要的改革家康有为由于慈禧的复仇被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救走,并由一艘英国战舰送到英国的殖民地加以保护(当时给人的错误印象认为英国将积极干涉中国的进步事业,如果不是出于人性也是建立在自己利益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出于权宜之计而不得不承认既定的事实,慈禧太后和满洲派自己的安全发生了严重的恐慌,他们把改革运动看作对满洲统治的敌意!两个月以后,由于受和平和祝愿的时机到来的影响,索尔兹伯里侯爵被克劳德·麦克唐纳先生

通知说外国大使的夫人们共有七位,已经收到慈禧太后陛下为纪念她六十四岁生日的庆典而出席的请柬,而且太后陛下“给人留下了令人赞赏的印象,不论对她所有客人所留下的个人风格还是她那温和而文雅的举止”。在那种场合,傀儡皇帝仅供展览,还要遵守礼节,并与所有的太太们握手。因此大幕放下来了,改革的计划也结束了,这是所有(几乎所有的)有关人等都满意的结果。

英国官员和其他外交大臣,不久就被不断传出来的流言“慈禧太后将要对皇帝采取极端的行动措施”所打扰,他们不断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做出任何违背道义的事情,从而破坏了欧洲人的感觉和尊严。总理衙门还得到通牒,外国将会重开会谈并发出警告以免皇帝突然退位。当英国外交大臣将干涉的消息成为茶楼里尽人皆知的事情,并在报纸上刊登,终于引发了愤怒:这纯粹是国内问题,这样的先例已经够多了,而外国人的意见万难接受。皇帝接受外国人的观念在满洲人眼里是一种罪恶,但是这种征得外国同情和支持的做法对于满洲人和中国人来说同样可憎。

不久事情就安定了下来,这已经是一个陈腐的惯例,人们得知老佛爷再度掌舵又满意起来甚至有点高兴。在京城消息不胫而走,为了即将上演的戏剧精心准备,光绪帝打算谋杀慈禧太后,他得到的惩罚与他应得的惩罚相比是极其轻微的^①。学者们在编写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文章时,都把他和唐代的皇帝相比(公元762年),鼓动对他那个时候的皇太后的谋杀。光绪帝的死因此被随意进行预测,其影响大打折扣,无疑这些在北方很少引起或根本引不起评论,但是在南方却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公众的情绪一直在适时地酝酿着,慈禧太后以一个受害者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书声明天子得了重病,那种语气既没有表示惊讶也没

^① 这是中国官场方法的一个例子:上海道台当要求英国领事馆帮助逮捕康有为时,毫不犹豫地皇帝死了,是被主要的改革家谋杀的。



有表示忧惧。而各省派出的医术精湛的医生为皇帝看病,被看作是必要的礼节性的让步。“自从4月以来,”诏书上说(自从“百日维新”以来),“我已经得了重病,但是我找不到缓解我病情的方法。”这是他对于将要临近的疾病形式上的声明。

在为皇帝看病的所有人中,有一位是陈联芳,是中国医生中多年来最著名的一个。其中一位作者写在出版的《泰晤士报》上的文字详细叙述了他在京城经历以及他的职责,都是当时他自己所提供的:

当诏令发出召集各省总督和巡抚派著名的医生到北京去询问有关陛下的病情时,陈联芳接到了苏州巡抚的命令要一刻不停地前往北方。这本身就说明,除了职责的志趣不相投而且无报酬外(这一点陈氏是知道的),对于一个体格病弱的年纪已超过七十岁的人来说是没有一点保证的,但是他几乎没有躲避这个任务的可能性。他于是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带了两个忠实的助手,或者说学生,提前收到了巡抚所给的总数6000两的路费和报酬,就一路跋涉并到军机处报到。当他到达那里,他发现已有三个本国出名的医生在侍候,随时听候皇帝的使唤。德塞夫,一个法国使馆的医生,他历史上曾多次访问皇帝,他对天子脉搏诊断仍然引起了使馆人员的兴趣。上了年纪的本国医生带着掩饰不住地对法国医生的鄙视的口气说话,他对法国医生对病情的诊断和他提出的治疗方案都感到不满。他自己对皇帝疾病的描述,用语言表达不像写历史小说的作家归因于欧洲中世纪时代的医师那样。他虔诚地提到在工作中对他的统治造成影响和幻想的人,而这个人令人敬畏的。通过他因发热而造成的脸红及神秘的原因可以知道,这些最平常不过的事情更适合中国人而不适合英国读者。

不管怎样,他的描述清楚地指出呼吸器官疾病,他说这种疾病已经存在了十二年多了,对于普通的衰弱者来说所出现的发烧情况,他不得不把它归因于精神紧张并伴随着体质的虚弱。在他离开北京(大约11月中旬)时,发烧已减轻,病人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种病人,在他看来病情已经如此严重,如果可能的话,他决定放手不管。在他年轻的同行掌握之下,通过贿赂朝廷官员的手段他最终就能达到目的。问他皇帝的情况是否危急,他神秘地回答说如果他能活着看到新年的话,他的精力在春天就会慢慢恢复,他彻底康复也许有望。

在他到达北京后的几天,陈氏接到军机处的一个官员的命令召见他,皇帝和太后在宫廷南边的厅里等待着他的拜见。会诊询问的是关于中央帝国统治者神谕的障碍,这就有点令人好奇,也暗示着中国国内政策采取保守主义的可靠性。陈氏进入大厅,看见皇帝和太后就双膝跪倒,礼节性地叩头以后就穿过他们所在的公寓。皇帝和太后坐在台子上一个矮桌子的对面,在会谈期间彼此面对着面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皇帝面色苍白、情绪低落,喉咙因为不舒服而有点愤怒的样子,明显是因为发烧而造成的,椭圆形的脸庞显得有点消瘦,更使他的面容显得轮廓分明,长着像鹰一样的鼻子,在医师的眼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外貌长得像外国人。太后经常打断他的话,她看起来保养得非常好,外表非常聪明,好像对病人的健康和他的身体的舒服非常热切和关心。太后经常不顾礼仪地询问医生关于陛下的情况,并进一步描述皇帝的病征,而皇帝经常以一句话或点头偶尔表示对有病的确认。在这种独白的过程中,医师遵循着皇帝拜见的礼仪程序,将目光紧盯在地板上,一边听从着太后的命令,一边仍然跪着,他被允许一只手放在皇帝的手腕上。但是感觉不到脉搏的跳

动,接触到的是一只无力的手,首先是触摸手腕的一边,接着触摸另一边。做完之后,太后继续叙述病人的痛苦,她描述了他舌头的状况和嘴及喉咙的溃疡,但不允许医师检查这些地方,他被迫利用非专业的描述。当他明智地发现很难看清病人的舌头,因为皇帝的尊贵的地位迫使你不得不盯着地板看。太后最后将病人的情况说了一遍,陈氏退回身来,将诊断结果递交给军机处,并一起将意见呈上去以供将来的治疗,随后由官方传达给皇上。他的意见要点是开一些本国产的传统滋补品,并建议尽可能地在精神和身体上多休息。

上年纪的医生神谕般的预言是正确的。皇帝终于熬过来并能看到新年,以后体力又恢复了,某种程度上归因于皇太后害怕外国干涉的结果,但主要是她认识到南方公众舆论反对她,出于权宜之计调和的结果。在粤省由于广东改革家所倡导的改革激起了他们反对满洲人的感情:这些南方人激烈地公开谴责满洲人以及他们所有的勾当,这就需要点燃起新的叛乱的火焰。南方也很清楚地意识到,消息在中国传播得很快,皇帝的生命现在处于危险之中,岁末将是他去世的时间了,来自各方面的抗议和警告从各省传到京城,不久就传到京城各部,而且传到皇帝那里。有一位署名经元善的上海官员,他以“所有士绅、学者、商人和上海公众”的名义提到诏令中皇帝的病情,并恳求太后、皇族和军机处即使皇帝有小病也要让圣上执政,要放弃所有想让他退位的想法。他描述江苏省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动乱时刻,并直接暗示有可能在皇帝死亡的事件中进行干涉。慈禧对这位大胆的官员非常恼火,并不是因为他控告她预谋谋杀的罪行,而是因为他敢以这样的方式来威吓她。她发出命令要立刻将他撤职。经元善害怕激起她明显的愤怒,逃到了澳门。但是他大胆的话无疑救了皇帝的命。

在所有省级权威官员中,唯一勇敢无私而且能够站在皇帝

立场上的人,便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敢于此时公开指责。慈禧非常钦佩他无私的勇气,但是她对他这种行为非常愤怒,那种举动堪与他的同僚,机敏的机会主义者张之洞相比。他是湖广总督,是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以至使改革之风在那个地区长吹不息。就在六个月前他引荐了几个进步人士(其中之一是他自己的秘书杨锐)给皇帝,就在风暴爆发之前还被光绪帝召到北京作为军机大臣支持陛下的改革政策。然而慈禧太后还没有站在反对派一边,皇帝还没有企图赢得袁世凯和其军队的支持时,张之洞就打电报给慈禧太后说他热情支持她的政策,并采取强烈地反对改革者的措施。这个建议是多余的,慈禧在着手某项工作之时,在她的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完成之前,她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女人。

8月11日,她召荣禄到京城支持她扑灭改革运动。刑部刚刚上了一道奏折催促并受朝廷之命审判康有为同党。慈禧作为答复,指派他们直接与军机处协商并以最为严厉的手段审问这些囚犯。同时她命令监禁大臣张荫桓^①,皇帝最信任的顾问和朋友。她发现:“此人享有令人憎恶的声誉。”这道法令不失时机地说明皇帝急于以怜悯调和审判,制止任何普遍的放逐或者复仇运动,“尽管充分意识到许多著名的学者和官员已经被改革者所腐化”。

太后的下一步,是在荣禄的建议下,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一道政令。在这道诏令中她证明反对派的政策合理性并确保保守派的地位。这份文件是其方法的绝好例子。在诏令中皇帝承认自己方法的错误,并自责出于忧惧感而造成改革运动中被归入“我们的官员”没有能有效地执行正确命令的印象,因此大家的面子

^① 张荫桓曾经在五十年庆典日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圣米切尔和圣乔治二等骑士勋章,在流放突厥斯坦后被处死,当时是由端亲王下的命令,义和团危机开始是立刻处决其原因。

另一名改革家名叫徐之敬,他是被刑部在同一诏令中判处终身监禁的。他在1900年8月被联军释放,当时他正被押送到太原府,并要把他交给法庭。但是他出于鄙视,不肯接受外国人的释放。这件事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官员的思想态度和对国家首脑诏令的尊敬。

都被挽回了。下面是颇具研究意义的被删节的翻译：

諭朝廷振兴商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并非好为变法，弃旧如遗，此朕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之臣民所共谅。乃体察近日民情，颇觉惶惑，总缘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体朕意，以致无识之徒，妄相揣测，议论纷腾。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淘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干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之本意。所有现行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灭彼增，转多周折，不若仍悉其旧。着将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行裁并局所冗员，仍着各该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辄多摭拾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多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说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我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行裁撤。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该地方官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致于民情不便，此外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疑。着六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核议，据实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朕执两

用中,不存成见,尔大小臣工等,务当善体朕心,共矢公忠,实事求是,以副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详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荣禄当时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并委以北方军队最高指挥权且控制陆军部。他因此成为帝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他握有的大权在满洲王朝的记录中没有先例。他再一次证明了过去逃亡热河那些日子以来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忠于太后陛下,他终于得到了应得到的奖赏。这是自然的,如果不是必不可免的,也是由于他在政变的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否则他会受到严厉的谴责,尤其是在国外。但是,从中国官员的角度来看,他的行动支持了太后陛下反对她的侄子——皇帝,这只不过是他的职责。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一直表现得比较明智、可信。随后在义和团起义的时候,他遭到了本国和外国报社的不断抨击,部分是由于康有为及其追随者散布的不值得反驳的谎言的结果,部分是出自于外国公使馆人员的偏见(从那时起产生的)和缺乏准确的信息所造成的。正如以后所显示的,所有他的努力都旨在阻止那种狂热爆发的潮流,以免太后陛下做出愚蠢的行动。在那些胆小、无知、残忍的满洲贵族中间,他的远见和勇气简直是鹤立鸡群。在慈禧太后长久的统治时期,唯一可以在行政管理才能和爱国主义上与他相接近的,是曾国藩(他的一生已经简单地叙述过)。从这时以前一直到他去世(1903年)我们发现,他曾经是慈禧太后的助手,她最可信赖的和得力的顾问,她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正如将在后一章所看到的,在1900年的时候,当老佛爷被骚乱和喊叫弄得发狂的时候,她被自己的希望所误导,她的迷信信念及亲信的意见,使她允许端亲王及其同伙有点破坏了荣禄的影响。尽管如此(这正如我们会在景善的日记中看到的),她总是求助于他,进行商议和寻求安慰。正是他,她可以在最后被击败的黑暗

时刻得到依赖，而他从来没有辜负过她。她逐渐认识到：他所提出的建议，有时是她忽视的，然而总是合理的。在中国历史上那些不确定的因素中间，在接下来的年代里有一点是无疑的，荣禄应该得到的在他的国人和外国人看来，地位比他至今已经受到的要高得多。在朝廷逃亡的时候，他本人从没有想到围绕他会有那么多的诽谤。他被深深地伤害了，他的正义感被凌辱了，在朝廷返回北京以后，他受到了外国使馆的冷遇。从那以后直到他去世，他都不愿意与他最亲密的朋友说，他永远不后悔他对义和团所持的反对立场，他不能忍受和原谅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对他的敌意和不敬。“根本不喜欢他们，”在一个场合，他说，“已经照应该做的去做了，那只是因为出于对太后陛下和满洲王朝的忠诚；然而，行动已经与外国人的利益一致，我被赋予了信任的权利。”

慈禧太后商议了很久，她急切地问荣禄如何对改革者进行惩罚。他主张强烈镇压的措施，认为这关乎满洲王朝的荣誉。六个囚犯被刑部仔细地审问，荣禄细致地询问他们关于康有为对慈禧太后的意图。在康有为的房间里找到的文件，使其了解了每一个密谋的细节。他们对谋划反对慈禧太后的罪行供认不讳。很明显在拖延审判时间上的失策，尤其是在满洲和汉人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在执行上耽搁的时间过长，无疑是要冒很大危险的，因为当时派性精神在双方不断增长。老佛爷和军机处同时作出决定，希望尽可能终止这场危机，按照预定的日期，当月的13日，改革者被执行死刑。他们在临死之前大义凛然，城外的行刑场所被围得水泄不通。据说在杨锐的书信中有一封皇帝交给他的密信，在这封信中慈禧太后遭到了无情的抨击。还有一封杨锐弹劾太后的奏折，列举了太后与六位高级官员的不道德关系，其中之一是荣禄，这些文件都被皇帝加了朱批。里面还引述了当时广东流传的民谣，指的就是太后所谓的邪恶罪行，并警告皇帝，满洲王朝现在终结的话，罪责都在慈禧太后身上。她的罪恶行为

堪与商朝(公元前 12 世纪)的商纣王所宠爱的妲己相比。妲己在宫中的酒池边犯下了滔天罪行。那时有点疑惑的是,太后强烈地为她自己辩护,她亲自验看了皇帝的手书,这些不忠的话与他的性格相合。太后陛下有报复性的倾向,她决定结束,不是一时而是彻底断绝所有他与改革党的关系。

对改革派领导人处刑的命令诏书是慈禧太后在荣禄的帮助下草拟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是用红笔写的,表明其重要性,诏书中一般都留有统治者自己书写的正式手迹。在强调改革国家管理的必要性之后,皇帝深深感到了政府不断增加的困难。这道诏书进一步说明了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利用危机时刻,开始策划叛乱的阴谋,目的是推翻太后;所幸,背叛的意图被揭穿,他们的密谋暴露了。诏书继续写道:

逾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创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鞏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其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

诏令还进一步判处康有为的同党梁启超死罪。梁启超是一个享有很高声誉的学者，他后来在日本获得庇护，在那里编辑著名的报纸。接着是三个重要的军机章京，他们正等着刑部审判的结果。诏令还补充说任何对他们死罪执行的推迟，在军机处看来，都会导致革命性的运动。因为这个原因，关于这六个囚犯的进一步司法审判仪式被分配下去，立即执行枪决。

在处决了康有为的追随者和同谋以后，诏令再一次强调了他们的领导者的罪恶。诏曰：

我们的王朝，是按照孔夫子的教诲进行统治的。康有为背叛了它，理应受到神和人们的憎恨。大自然的神力一定拒绝保护这样的一个人^①，只有根除这种有害的人，人性才能团结在一起。至于那些追随者，在极大程度上，被他那邪恶的学说所引导，他们人数众多，君主已经注意到他们的名字，皇帝一向是有责任对他的臣民抱有仁慈心的，我们决定不再对这些策划的阴谋进行追究。让所有有关的人以康氏为戒。让他们从良心上遵循圣人的学说，让他们一心一意把聪明才智献给皇帝陛下。

尽管以慈悲为怀，慈禧不再对这六位改革领导者之外的人有采取措施的意图，但是她还是禁不住回想起对她个人的攻击，这不由得激起了她的“圣怒”。下面引述的都是以上诏令中的内容。接着发生的事件是，新主子上台后张荫桓被不明不白地判处流放。他真正的冒犯在于他攻击慈禧太后奢侈浪费，还因为英国外交大臣胆敢干涉并请求饶他一命，这不由得使她更加怨恨。

^① 在她举行七十寿辰的时候(1904年)，慈禧太后对所有参加1898年改革运动的人颁布了特赦令，除了其领导者康有为和梁启超外，他们被排除在外，孙逸仙也被计算在内，他是一个逃亡者。

在另一道诏令中她提出的恳请荣禄让她去天津拜访的计划被取消了，因为荣禄害怕有人会加害慈禧太后。她女性的好奇心激起了她想到条约口岸拜访，以改变一下在北京隐居的兴趣，但她还是听从了荣禄的意见。军事重建在努力下继续向前发展，直隶军队的发展遇上了大好时机。

荣禄一到北京，便马上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个官职享有很大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尽管作为一个满洲人来说，他非常无知，缺乏能力，他以后还是负责天津的防务并密切注意周围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在这特殊的危机时刻，她对汉人普遍不信任，因此慈禧太后觉得由一个满洲总督控制这个军事要地以防止革命者有组织的活动是必要的。

在北京，唯一一个与改革派公开有关而没有受到惩罚的是礼部大臣李端棻。在等了几天以后，他发现在诏令中没有提到他的案件，他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他所犯下的罪行（引荐康有为和其他改革家为政府所用）也应当受到适当的惩罚。这道奏折本身也是一份非常有趣的文献，因为其对中国政府内部的几个鲜明的特点作了说明。这份奏折的作者，在承认自己的罪行以后，公开宣布对他的仁慈非常感激，但也对自己罪行没有被追究表示惊讶。他因为自己良心不得安宁，继续追问事情的原因，希望太后陛下能给他定罪，“对于那些以后胆敢引荐邪恶的人物给皇上的官员以警告”。慈禧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答复也同样有趣：

上谕李端棻奏滥保匪人，自请惩治一折，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今据事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末减，礼部尚书李端棻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惩戒。

函件颇多，多为康党来往之书信，上有石印，有待余亲自审查。书信中之内容多为密谋之事。一处竟然提名谭嗣同为中华共和国之总统！撰者之函牒目无所存王朝之讳，竟赫然用孔子诞生之年为号，其中一叛党厚颜无耻，竟大胆目现存王朝为废物。此类可憎之恶行有甚于造反与谋逆之罪。此函件足以显示皇上以怜悯之心不惜姑息迁就之人何许之多。今吾命人悉焚此信。

吾初于诏书中宣示康有为所组织之革命计划之阴谋，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不意近日不明真相之人中颇多传言谓康党不过为过分狂热之改革家者也。因此于此来往之函牒中知康氏实为卑鄙之徒，其蓄意渎职昭然若揭。我深信我国臣民，无论贵贱，咸知真相，将弃革命之乱言于不顾。如此将使正道大行，除恶务尽。

慈禧太后树立起了她个人的威严，但也由此播下了动摇帝国基础并引发剧变的种子。

第十六章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义和团的历史已有许多人写过，许多杰出的著述中都对运动的起源有所揭示，对此事再做进一步说明显得有点多余。然而从荣禄与他的朋友福建巡抚许应骙的书信摘要中，会找到新发现。不仅对直隶这场运动发展的原因，而且对慈禧太后最信任的顾问（指荣禄）的性格、私人意见和政治决策方法会有所了解。下面是写于1900年初的一封信：

义和团初起于鲁之贯县十八村，初名之曰梅花拳。时李秉衡为该省巡抚（1895年），初李氏并不禁止该拳之行动，反将之登名于军旅。去年夏，此团众与兵士频起冲突，军队指挥官因其行为而被巡抚撤职，所有团众囚犯尽为释放。他们此时的首领声称自己乃明朝皇帝之后裔，女子团体则称“红灯照”。去年秋，运动在鼓励下迅速扩展至直隶。荆州之地方官反复劝告人们不要相信所谓的魔法妖术，说这些团众只不过是白莲教的另一别称而已。地方官与法国教士关系友好，调查此事并将其遣散。这使我非常遗憾，因为我和王文韶都很了解这个人，当我们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时候，非常敬重他。

去年九月底团众公开在直隶打出大旗，上写着，“上帝

这些人必将失去控制，结果就会造成动乱和灾难。你无疑会同意我的观点，我的老朋友和同事，激起这些义和团众的主要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在普通的民众和皈依基督教的教徒之间的敌意如此之深以致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拖入敌意的边缘，政府也不顾一切地陷入邀请敌人在京城之墙下与我们并肩作战。我们已经脚踏在赤裸的剑上没有退缩的可能，在我们的事业中一点也不缺乏热情和豪情。

可是运动一开始，这些义和团众就害怕群集在一起以免清军能攻击并击垮他们，从这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他们并不是出于全无恐惧的普通本能。我们不能完全信任他们，但我觉得（尽管你会认为我有点荒唐）应该利用他们的狂热来激起我们正规军队的尚武精神。作为战斗力他们是完全没有用的，但是他们超自然的法术和魔力对于挫败敌人的锐气还是有用的。对于我们来说真地相信他们那愚蠢的主张，或者将之看成行动中有什么真正用途，不能说是致命的，也是完全错误的。即使在这些魔力的神话中有一点真实的话，那也必须在异端中才能找到，你只要看看中国历史上许多这样迷信的例子都是在反对统治王朝中结束的，你就会完全明白。你最近打电报给我劝我不要太着急，因为以你的观点看义和团战士在天津和大沽于6月20日的战斗中表现相当英勇。但我不敢断定，在任何情况下心中要牢记南北方人在战斗能力上是大有区别的，这一点是不错的。所有南方省当时出现了大量革命的秘密社会，走私的盐商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亡命之徒；因此一点火星，就随时可以点燃成骚乱之大火。这些南方人从职业上说都是一帮赌徒和骚扰滋事之人，所以他们不可能受爱国的本能所驱使，如果你把他们大量编入军队的话，就像驱赶一大群豺狼与老虎搏斗。结果是没有一只老虎会被消灭，数百

万你的百姓，可以如同绵羊一样，命运只能更加悲惨。从另一方面说这些北方的义和团众并不是由屠杀的欲望所激起来的，而是由种族的宗教仇恨所引发的。正如你所知道的，从本性来说既迟钝又顽固，而南方人机敏但不可靠，很难把他们统一组织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以达到既定的目标。这不就是 1894 年在与日本人的战争中军机处因为南方人的性格特点而如此愤怒吗？当时南方的那些男子们畏敌如虎，认识到自己处于绝望的劣势，便扔下武器不敢面对敌人。

这些义和团众不是训练有素的军队，但是他们随时准备战斗，敢于面对死亡。看到我们的人民表现出这样的勇气确实令人感到震惊，显示了他们同仇敌忾地反对外国人的热情。如果被这些勇敢的人的景象所鼓舞，我们会想象一刻之间整个帝国就会以他们为榜样，就能使我们摆脱因可憎的外国人的出现而感到的恐惧，我们完全错了，这种企图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我给你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让你在训练这些部队时不要犹豫不决。我不愿给你提这些建议，我也不能保证你在遵从这些建议的时候不会冒什么危险，但是最主要的事情是不要让朝廷的诏令成为这帮动乱分子聚集在一起的借口。我写这封私人信件完全是迫于忧惧，所以请你原谅内容的仓促和混乱，我相信你在合适的时候会给我答复。

(签名)荣禄

第十七章 景善日记

景善，满洲正黄旗人，出生于1823年。1863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成为翰林院编修，是研究宋代哲学的著名学者。第二年被任命为清朝内务府章京，1869年提升为高级章京，1879年升为财政部署员。他的父亲广顺，曾担任道光皇帝内务府大臣，与道光皇帝关系密切；他是慈禧太后家族的亲戚，与满洲权贵关系密切。景善因此有特别的机会知道宫廷中的所有闲谈，能够听到高级官员，包括皇帝身旁的汉人和满洲官员的意见并观察到他们的行动。在京城各部任职之后，其父于1894年退休。他是端亲王、辅国公载澜和惇亲王（道光皇帝的小儿子）儿子们的老师，因此与义和团运动的领导人之间关系密切。

从1900年8月北京突然降临的令人恐怖的灾难来看，景善的命运尤其悲惨。在暴风雨般的战役的突然袭击下，加上义和团众所造成的危险，使得当时死亡无数。疯狂的甘军士兵及少数民族的入侵者，旧学者景善的忧国之痛，他的妻妾们的争吵，他儿子们的不孝，这一切所激起的痛苦之感无甚于国家所遭受的不幸。但是不幸之中也有万幸。8月15日，在联军进入北京之后，慈禧太后逃亡，他的妻子，他的一个儿媳妇都自杀了。他于几个小时之后侥幸活下来，先后目睹了家人的死亡，长子恩澍将他推入他自家院子的井里。他的这个儿子随后因为庇护武装的义和

者中策划反对我的阴谋？因此我提出废除他的皇位另择新君，新君将在新年的第一天即位。因此，你们这些大臣现在将考虑光绪帝被废除皇位之后的称号问题。在明朝的景泰帝已有先例，他被降为亲王之后，他的哥哥在被蒙古人俘虏八年之后又被恢复帝位。”一时间宫廷里一片沉默。最后军机大臣徐桐提议给以合适的称号“浑德公”，即道德困惑的亲王，或者说确切的意思是笨拙者。这个称号曾经由蒙古人送给一位被废黜的宋代皇帝。老佛爷非常赞同，然后她向参加晋见的所有大臣宣布了已经选出的新皇帝人选，就是端亲王的长子。他对慈禧太后的衷心是众所周知的。这时军机大臣孙家鼐请求发表意见。他抨击太后，主张不要废除皇帝，这样做必定引起南方各省的叛乱。选择君主的权力主要在于她，但是那只能在皇帝“万岁”仙逝之后（即现在的皇帝去世之后），太后陛下龙颜大怒，转向孙家鼐。她提醒他记住这是皇家政务会议，因此姑且给汉人一点面子。她注意到皇帝已经明白了她的意图，他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慈禧太后命令所有在场的大臣都到勤政殿去等着她和皇帝，等着他们的到来，见证任命继承人的诏书的草拟。正式宣布即位延迟到新年的第一天。

众大臣因此一齐来到指定的大厅的入口处，几分钟之后慈禧太后的鸾驾便出现在门口，所有的大臣都跪下行三叩之大礼。她身边陪伴着许多太监，但是她让他们站在那里不动。她派大太监李莲英请皇帝出场；皇帝坐在龙椅上，在外边的门口停下并向太后叩头后，坐在皇位上。她召唤他来到大厅，他再次下跪，所有的官员仍然跪在外边。“起来，不用跪下。”太后喊道。她请他们坐下，然后召集亲王和大臣们，总共有三十个人进来。老佛爷一再重复解释她采取这一步的原因。皇帝只是说：“太后采取的都很恰当，甚

端亲王进一步问了一些细节，庆亲王的护卫军首领说庆亲王收到直隶总督荣禄的一份电报，说特遣部队没有带枪。这时端亲王嘲讽地笑了笑说：“人少怎能敌众呢？一百来个妖怪有什么关系？”刚毅则对我说，他正在催促端亲王给崇礼发布命令，本守城司令官，反对任何外国军队进入，很明显荣禄已经下了命令允许进入。刚毅对荣禄的命令甚为恼火，不理解他出于什么动机。在临近去年年底的时候，端亲王和荣禄已经达成一致，同意废除皇帝并将皇位继承人扶上皇位，端亲王承认这并不是出于荣禄对老佛爷的影响，因为老佛爷从来没有同意让他的儿子做皇位继承人。但是现在荣禄抨击义和团并警告太后不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只要荣禄反对，端亲王和刚毅对怂恿太后全心全意支持义和团就会绝望。以目前太后的态度为例子，端亲王告诉刚毅有朝一日他的儿子大阿哥将会穿戴义和团模样的服装在颐和园的草地上和太监们一起操练。老佛爷看到他会马上命令把他禁闭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她也会谴责军机大臣徐桐不好好看好他的学生，竟允许出现这种不堪入目的行为。

在离开端亲王家后，刚毅经过城前门的时候，就已看到外国军队进城了。人们都在咒骂，他说，但没有一个人受到惊扰。刚毅的涿州之行使他深信全省都同心同德，甚至那些年轻的孩子们都在操练。毫无疑问，外国人会被马上消灭掉。在涿州有个名叫贯公爷的长官，逮捕了几个义和团的首领，但是刚毅和赵舒翘下令将他们释放，并让他们继续进行神秘的活动和操练。这简直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奇怪景象；他们中有几个被射击，不止一次被射中，然而都又从地上完好无伤地起来。这些展示都是在地方官衙的大院里进行的，在演出的现场挤满了人，围成一堵人墙，紧紧地

时“仁慈的太后”离开轿子进入大厅，由大太监李莲英搀扶着，后面紧跟着其下属崔进。皇帝面色苍白，可以看得到当他坐在慈禧太后旁边的矮龙椅上时是战战兢兢的。

老佛爷首先召集到场的所有人靠近前面她和皇帝的位置，然后用激昂的语调说话，她宣布她不可能忍受最近外国人加在她身上的羞辱。她的帝国的尊严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羞辱。直到昨天，事实上，她已经读了外交部转与总理衙门的急件，本来她的意图是镇压义和团，但是在面对外国人傲慢无礼的提议时，她不能把政府的统治权交给皇帝，那被证明对于统治极其不合适，她最终得出结论说，对于目前的形势来说和平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傲慢的法国领事在天津，要求大沽要塞的守军投降，这已是坏透了，但是还嫌不足，最令人头疼的是向外交部提出荒谬的提议，公然侮辱她作为君主的特权。她现在断然决定，并且下定决心，荣禄一度曾是她最明智的顾问，但即使他也难以转变她的意图。太后又对诸汉大臣说：“本朝二百五十余年，深仁厚泽，凡为我赤子，皆视同一体，无分南北。自予执政以来，谨守成宪，罔敢废堕，租税之轻，历代所无，偶有偏灾，立发内库赈济。前此发逆作乱，朝廷皆授方略，克平大难，重睹升平。今日予等受外国欺侮，正吾全国一心，何制胜夷人。朝廷平日以怀柔远人为心，不与深较，彼等乃误解，以为懦弱，横肆欺侮，今当使彼醒悟矣。本朝政尚宽大，康熙皇帝应许洋人自由传教，此乃过于仁厚，为后来忧患之源。夷狄不知圣人之教，遇事恒多无礼，至于其他细微之事，足以败坏吾之风俗，自恃兵力，肆无忌惮。但今日中国人已全体发奋，数千万之义和拳民，皆奋起以保卫国家。予总觉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走得太容易了。彼时若有一得力之军，截而杀之，即可转败为胜。但至今日，予等

报复之期已至矣。”

她转向皇帝征求他的意见。皇帝陛下迟疑了好长时间，显然是犹豫不决，最终劝她听从荣禄的意见，阻止进攻外国使团，将外国的外交大臣安全地护送到海岸。但是，他补充说，还是必须由她决定。他在这件事情上不敢承担任何责任。

军机大臣中汉人的下级官员赵舒翹接着说话。他恳求老佛爷发出命令将国内的所有外国人立刻消灭，这样就能避免刺探爱国运动的性质和内容的危险。太后命令军机处考虑这项建议并议决一个合适的诏令。

在赵氏之后，每一个人轮流发表看法，满洲人立山、汉人许景澄和袁昶恳求太后不要对全世界宣战。他说，中国不可能逃脱失败，即使帝国不会被瓜分，内部一定也会出现叛乱和无政府状态。袁昶甚至进一步说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已经两年，他发现外国人非常通情达理，就是行为上也是如此。他不相信要求太后退位的照会的真实性，这个照会端亲王承认是从外国的外交部门收到的，在他看来，外交大臣们是不可能敢提出任何干涉中国国内事务照会的。

这时候端亲王站了起来，愤怒地问太后她是否愿意听那些汉人叛徒的话？慈禧太后严厉斥责了他那种粗鲁的举止，但还是命令袁昶离开了会见厅。没有其他的人敢再说话。

然后她命令颁布诏令，立刻通知到帝国各个地方，宣布在开始敌对状态之前她要不惜牺牲祖先的疆土，于是庄亲王和端亲王被任命为义和团的联合总指挥。慈禧太后要让外国人明白，如果外国驻中国外交大臣今天下午同意离开北京，荣禄会尽最大努力保护他们到天津。最后，慈禧太后命令军机处在中午通知他们听候进一步的命令。除了端亲王和辅国公载澜，所有的人都退下了，这两个人又留下

刘坤一，大阿哥早当皇帝很长时间了，因此端亲王非常憎恨这个刘坤一。刘氏告诉老佛爷说他下一次拜见她的时候，如果光绪帝被废黜了，他省的人民保证会起来叛乱。统治京城的他们关心的究竟是什么？目前皇帝的统治已经给国家带来了许多不幸，该是结束他统治的时候了。为什么端亲王不进入宫中宣布让他的儿子做皇帝呢？董福祥的甘军勇士和亲王自己的满洲军队一定会集结在他的周围。但是如果荣禄反对他们，老佛爷会站在他这一边。荣禄的妻子^①永远在宫中。

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今天上午我去了礼亲王在西城区的宫中。我不得不坐上我的小马车，因为我的轿夫要么是逃到了乡下要么是参加了义和团。我的两个儿子，恩澍和恩铭，已经安排了二十五名义和团员住在我们家外边的院子里。我们还不得不给他们提供食物。尽管大家都参加到像这样消灭夷狄的高尚活动中去。然而我却抱怨，为了义和团，在这最困难的时期还要花钱，因为现在大米比珍珠还要贵，柴火比桂花还要贵。也许是我年纪大了，我成了像梁朝的建立者的弟弟萧泓，他是那样吝啬，还要把成堆的钱币藏起来。在每一百万的现金上他就会贴上一个标签，因为每一个紫色的标签标志着一千万钱币。据说关于他，他的亲戚们都在辱骂他这种习惯。至于我，我的儿子们都会来拿我的钱，可是他们不能来拿。

我发现礼亲王心情非常沮丧，他的宝库藏满了大量的财富。作为军机处的高级官员，他感到身上的责任太重了。而他的能力又很小，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老佛爷要让

① 这个慈禧太后最喜欢的陪伴在她身旁的女人实际上是荣禄的第二个配偶，在他第一个妻子于1900年9月去世后才被扶上正室。她比荣禄活的时间要长，并对老佛爷继续实施巨大的影响。

他接替恭亲王担任高级军机大臣。他告诉我今天上午在军机处召开的会议非常激烈，好像太后陛下对刘坤一发来的谴责义和团的电报非常恼火。他已经私下给荣禄发电报，恳求他制止义和团的叛乱，但是没有人知道荣禄做了什么样的回答。

他给慈禧太后的电报，是朝廷中一个送快信的人鲍廷福送来的。这位总督声称如果抵制外国侵略，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他军队全部开往北方的战场上，可是他坚决拒绝把他的军队借去屠杀几个无助的外国人。对此，慈禧太后引用《左传》中的话评论道：“唇亡齿寒。”即使这样，她还暗示，我们帝国南北方之间的关系各自独立，没有人比刘坤一更清楚自己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的经历。

老佛爷任命庄亲王为京城守备的总指挥，给每一位男性少数民族头领提供50两白银，他们的妻子40两，他们的儿子30两以示慰问。

当我还在与礼亲王谈话的时候，荣禄坐着轿子去拜访他的亲戚。他看起来非常疲惫，走路一瘸一拐。他大声地谴责义和团。他说，他们做不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指义和团）现在竟敢在他路过后门的时候对他大声斥责，叫他中国汉奸。我禁不住想到荣禄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但是我不敢这样说。他是一个倔犟的人，是满洲人中性格最暴烈的一个人。我非常害怕他的影响会使我们所有的希望破灭。

回到家里，我听说端亲王和庄亲王派军队包围了法国教堂，那里只有几个外国士兵防守，因此那些教士很容易被俘虏。礼亲王的宫通过西华门离法国教堂只有一步之远。尽管受到邻居日益迫近的敌意骚扰，他害怕挪一步，因为他怕离开，以免他的宝库会被抢劫。无疑几天以后教堂就会倒塌。

我的院子里到处都是义和团和甘军士兵，我的房子不再属于我了。我能不憎恶给我带来麻烦的可诅咒的外国人么！

同天戌时。我得知荣禄派了一个送信的人送来电报，说袁世凯正在联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礼亲王也送来一份抄件，让我保密，上面写着：

尊敬的阁下获悉贵电报。一个软弱之人竟敢以十或者更多之民族为敌，其结果只能自取灭亡。我们与文明各国有固定的规则约定，两国之间交战，应该对其使节待之以礼。而这些我们祖先费如此之苦和危险而遗传下来的规矩受到威胁而毁于一旦，不正是这些魔法的制造者吗？我们王朝的命运已危在旦夕？看到这些义和团成功的希望决不是什么睿智，只不过是梦幻的阴影罢了。从太后陛下到皇帝盲从最低层的人民，毋庸置疑都是因为饱受外国之侵略之苦和他们的无休止的侮辱。因为这个原因这些爱国的军团被组织起来，声称是受神的使命来复仇的，可是当前的危机是空前严重，尽管我竭尽全力阐明其危险性，但我的辛劳白费。我有病而且脚跛，但是自从我离开以后我连上七道奏折抨击这些义和团。看到这一切毫无结果，我现在不得不离开病床，如果可能的话，要清楚地向太后和圣上清楚地说明形势，而这也是白费。

所有国家的亲王和各部大臣围在太后周围用一个声音向我大喊，这阁下你要相信。我不敢在这里引用太后陛下的话，但我可以说整个皇族都参加了义和团，至少三分之二的军队，不管满汉都加入了进去。他们蜂拥在京城街道上，就像一场蝗灾，很难驱散。

即使太后有神的才智也很难抵挡住众人的意愿。如果上天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我怎么能违背上天的意志？过去的几天内我一直在日夜思考：当我们面临困难的出路的时候

候，我们却放弃了逃脱的希望。因此昨天上午（6月20日）我安排了在总理衙门与一个外国的外交官会面，希望能为整个外国使团提供安全的行动，用我的自己的军队把他们送到天津。这或许能有成功的机会，但是端亲王的士兵杀了德国外交官，从那时起情势每一个小时与每个小时发展得都非常快，我几乎难以用语言形容。站在我这边，参加军机处讨论的是庆亲王和王文韶，可是前者，一贯是这样，他要求离开，太后也拿他没办法，因此这两个人都不真正地支持我。我不怕死，但是我想到我的罪恶将被记录在历史上我就感到痛苦；上天知道我是一个充满悲痛和羞耻心的人。我曾得到过圣上的恩惠，我只能乞求我们王朝的先祖能保护我们的帝国。这里的形势可谓失去了控制，但是只有希望阁下采取尽可能的措施来保护各省的安全。让我们各自竭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并让我们保守秘密。

签名 荣禄 含泪书

据军机处说张之洞给慈禧太后拍来电报，向他宣誓忠诚和忠心，并问是否要他派军队开往北方帮助摧毁夷狄。张氏是一个趋炎附势者，根本不喜欢皇帝^①。我们不能忘记他多么赞成任命新皇位继承人的诏令，他多么想把皇帝废黜，并不惜用合法继承的先例和以诡辩为基础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自己是合理的。他像刘坤一一样见风使舵，没有坚持原则的勇气。我鄙视后者反对义和团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欣赏他正直的性格。

（这时日记作者详细地叙述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

^① 关于张之洞的简短的传记在附录中。

展,详细地描述了他们施展法术的地点,他们的咒语,他们开始的仪式。这些事实几乎在以前都出版过,因此日记中的大多数这里都被省略了。主要表现的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迷信,甚至令许多有教养的满洲人包括慈禧太后都相信。我们仅举一个口中念念有词但含糊不清的例子,这在上层中间也得到相信,几乎使整个王朝为之疯狂。)

义和团都带有秘密的护身符,主要由一些小黄纸片组成,在打仗的时候随身携带。上面画着朱红色的图形,既不是男人也不是魔鬼,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其实只是一个头,但是没有脚;其面为尖形的,有眼睛和睫毛,还有四个光环。从怪物的心脏到最下端都有神秘的刻画,上写着:“我是冷云佛,在我前面躺着黑色的火神,后面是老子。”在动物的身上也刻上佛教中的人物,或者老虎、龙。左上角写着这样的话“先祈求上天保佑”,在右上角写着:“再祈求黑瘟神的保佑”。慈禧太后也记住了这些咒语,每天重复念七遍,而每次她重复的时候,大太监李莲英就大声喊:“外国鬼子快滚。”义和团以一种奇怪的实验来决定牺牲者的命运,主要由焚烧一大团纸组成,看看烟灰是上升还是保留在地面上。他们才能断定是哪个神在判决。但是,事实上,这些团纸有时是用薄的材料做成的,自然要变成轻灰漂浮在空中,然而,当他们用厚纸的时候,灰很少升起来。有些纸团比其他纸团揉得更紧,很明显揉得松的纸团燃烧起来比揉得紧的纸团更有机会漂浮起来。同样,当他们在任何地方放火,他们都承认是由神来指导的,他们说火在他们剑上的任何地方跳跃,神的愿望都是要毁灭。事实上,尽管这在实践中间存在着欺骗,只要他们为了屠杀的目的都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烧毁任何一个地方,他们就提前洒上煤油,如果弄不到煤油,他们甚至在周围堆起木柴,他们

身上都秘密地带着可以点燃的火柴。

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我在日记中写到^①的外国鬼子今天早晨卯时(早晨6点)被执行死刑,他的头颅被放在一个笼子来展出,挂在同安门的横梁上。只放在笼子里,因为没有长的东西可以悬挂。那脸上的表情非常恐怖,看到外国人的脑袋悬挂在我们的宫门上,这是好事。这使我想起咸丰十年(1860年)我看到的挂在刑部外面的头颅,但是在那些头颅中有黑鬼的头颅。荣禄试图救那个外国人的性命,但是端亲王和庄亲王已经判了他死刑,就在荣禄知道之前他们已经执行了死刑,因此当荣禄的人到达现场的时候,外国人的头颅已经与身体分离。亲王们昨天将他铐上铁链在他们面前跪了好几个小时。他一直不断地恳求他们饶了他的命,他的呻吟声非常凄惨,令人不忍听。老佛爷得知他的死亡后,命令赏给逮捕他的士兵500两白银,比宣布的奖赏高出十倍。

义和团占领了我家的院子后,试图将我的烟拿走,随后又变得仁慈起来,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允许我保存这些烟。外国产的任何东西,甚至外国产的火柴在今天都不允许使用,这些义和团的首领张德成和韩毅立,这两个人都是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百姓,也受到皇族亲王的格外尊敬。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事态!

辅国公载澜今天下午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个特别的事情,皇位继承人如何在今天早上称皇帝为“鬼子的学生”,当那么骂的时候,实际上在扇皇帝的耳光。皇帝将事实的真相上报给慈禧太后的时候,慈禧太后龙颜大怒,命令崔太监狠狠地教训了皇位继承者二十大鞭子。端亲王对此也非常愤怒,但是他害怕慈禧太后,当太后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像

^① 参见6月20日下所记。



亲王们和义和团的领导者正蜂拥地涌进她下边的院子里。她问端亲王是否他正把自己看作皇帝,如果不是,怎么竟敢这样卤莽无礼地行事?她要让他知道,只有她有权拥立或废黜君权,她要让他们永远记住她能扶植他的儿子担任皇位继承人,也有权立刻废除他。如果他和那些亲王们认为在此国家危机混乱之时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这种大事,他们会发现他们完全错了。她命令他们离开,禁止他们再进入宫禁之地,除了在正常上朝场合召集他们之时。他们不得不首先表示屈服并要求太后原谅他们傲慢的行为。作为对他们冒犯行为的轻罚,她进一步命令这些亲王们罚俸一年。至于义和团的头目们,竟敢造成如此大的吼声,使她听了头疼,他们应该就地被斩首,荣禄的卫兵正在外边的门口值班,被调来立即执行判决。太后此刻对义和团是如此愤怒,大家都认为荣禄就能制止对使团的进攻。皇帝对发生的这件事情感到惊恐,他尤其谦卑地感谢太后能这样热心地保护他。

后来,下午9点。老佛爷突然对端亲王和其追随者表示愤怒,命令停止在北京的战斗,她现在同意荣禄的意见并立刻到使团那里商议和平协议。今天下午6点钟所有的战事停止了,荣禄带领着他的军队进军到使团区北部的桥上。外国人从他们藏身的地方出来开始会谈,他们都拿出了木版,上面写着“接太后陛下命令给外国使团以保护”。荣禄希望能促使外国的外交官与他商议恢复和平秩序的问题。三个小时没有打枪了,可是恩铭回来告诉我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慈禧听说外国救援军在去北京的路上吃了败仗,她决定再一次把义和团的首领交还并要“吃外国鬼子的肉并睡在他们的皮上”。

六月四日戌时(1900年6月30日)即下午7点。刚毅

今天拜访，并留下来和我一起吃晚饭。他告诉我董福祥今天上午亲自邀请荣禄到他的住处，并请他指挥下的重炮兵借给他使用。荣禄据说在京城里配有充足的军备，武威军（军事防卫部队）的军用物资足够在几个小时内将每座外国大楼炸成碎片。

董氏一直等着荣禄的大门打开，当最后同意他进入的时候，他开始怒吼，而荣禄假装睡觉。“他没有同意，但是靠在座位上睡觉。^①”董氏劝荣禄原谅他的鲁莽，总指挥只是笑了笑，最后结束了会谈，说董氏唯一能得到枪炮的办法是劝说老佛爷把荣禄的头颅献给他们。“立刻去拜见，”他说，“她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当然会答应你提出的任何请求。”

董福祥极为愤怒地离开了，尽管拜见的时刻过去得非常漫长，他还是径直到了紫禁城。在至高的帝国大厅的门口（皇极殿）他大声嚷嚷，命令太监们通知太后陛下说甘军总指挥急盼拜见。恰巧这时老佛爷正在丝绸上设计竹子的图案，对外面的嘈杂声非常不满。董氏被引进来，双膝跪倒。“嗨！”太后说，“我猜想你一定来报告说彻底摧毁了外国使团，这已经是自上个月以来第十次了。”“我来，”董福祥说，“是请求太后允许我控告军机大臣荣禄是叛徒和外国鬼子的朋友。他有我们军队急需的枪炮，但是他站在外国使馆区的立场上一块石头也不肯帮助。但是他发誓从不把这些枪炮借出去，即使太后命令这样做。”太后愤怒地回答道：“静静。你开始不过是一个强盗，如果我允许你加入我的军队，只不过是让你赎以前的罪行。然而你现在仍然表现得像一个强盗，竟然忘记了太后的存在。确实，你现在也尾大不掉了，除非我召见你，不

^① 引自《孟子》。

要让我发现你在这儿。”

刚毅声称只要荣禄继续在朝廷中发挥影响我们就拿不下外国使馆。立山,也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现在也站在主张与外国人和谈的那些人一边,他已经受到那桐的弹劾。

下面的布告张贴在整个京城,是按照慈禧太后发布给庄亲王的命令写的。他们说她打算从她私库中拿出钱来奖赏:

“奖 赏”

既然所有外国的教堂被夷为平地,外国人没有任何藏身之所,他们一定会四散逃跑。因此告于所有的人,学者和志愿者知晓并声明,任何人隐藏外国人都会招致斩首的处罚。活捉一个外国男性赏银 50 两,女性外国人 40 两白银,每个儿童 30 两白银,但是要明白是活着的,而且要真正是外国人。一旦确定事实,奖赏立刻发放。特此声明,要求虔诚遵守。

这些奖赏比咸丰十年(1860年)对外国人头的赏金还要高,当然在那些时代外国人要少得多,而现在,哎呀,他们比蜜蜂还要普通!

今天上午在庄亲王的宫外进行重要的审判,由貽穀、芬车、桂春主持。有九百多人被义和团立刻执行死刑,在某些情况下有切实的证据证明他们与外国人有所谓的联系。无助的婴儿也包括在被屠杀的人中。芬车不过是一个屠夫,老佛爷责备庄亲王不能使义和团保持秩序。

六月八日(7月4日)上午 11 点。毓贤的女婿济寿卿,来和我谈了好长时间的话。这个城市在遭到炮击的时候他一直在这儿,并去了我住的地方的南部,紧挨着宫墙,李秉衡的部队正在往高的平台上运大炮。他们都对荣禄非常愤怒,因为荣禄拒绝借给枪炮,他的部队对他非常忠诚,因此

的授意下写的。老佛爷大发雷霆，她愤怒地告诉端亲王，如果外国人进入北京，他就要掉脑袋。她很明白他的动机，他想获得摄政权，她嘱咐他明白，只要她活着，就没有其他人能摄政。“让他小心点，他的儿子将被逐出宫去，他所有的家产要被没收。”他的行动确实与他的狗的名字非常相配^①。端亲王离开了宫殿，这时听到一声霹雳炸下来，吓得他赶紧捂住耳朵。”

荣禄赢得了所有的军队指挥官的支持，除了董福祥及其军队外，他们都明白炮轰外国使馆必须停止。荣禄解释说，他不允许使用重炮的理由，是因为这样不可避免会对皇家的神祠和祖庙造成危害。

老佛爷给外国使馆送来礼物，西瓜、酒、蔬菜和冰，她还希望庆亲王能去看看外国外交官。

他们说许景澄秘密地与使馆联系。

从使馆出来的一个带着十二封急件的信使今天被逮捕，并被带到庄亲王的宫中。其中有三封密码信，连总理衙门的翻译也破译不出来，但是从其他信件获悉外国人已经死伤了一百多人，他们的供应品已经非常匮乏。

济寿卿到太原府去看毓贤，他的岳父。他的岳父已经上奏圣上，报告说他已经采取办法诱陷了所有外国人，并将他们戴上镣铐，在其衙门里将所有的外国人斩首。只有一个女人逃脱，而她的乳房也被割掉了，藏在城墙下边。当他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

今天雨下得特别大，刘大翹从御膳房给我带来了8磅猪肉，我送给结婚的妹妹一大碗。将近傍晚，一队骑兵带着几门炮，从我家的门前过去。他们是李秉衡的士兵，他们正

^① 端亲王名字的第二个特点包含着狗的根本特点，是由皇帝咸丰给起的，因为在给他的父亲道光帝致丧的时候得的名字。根据中国的法律，在给父亲或母亲守丧的二十七个月期间给他的儿子起这样的名字，说明是一种犯罪。

定会非常愤怒。立山和荣禄是老朋友。

从山西来的某位刘将军，今天上午一再向慈禧太后保证他能在三天内摧毁外国使馆，这样就能对联军发出警告，联军的进军就能得到阻止。愤怒的炮战才刚刚开始。义和团证明是完全没用。我总是说他们从来不会有所作为的。

七月十八日(8月12日)。外国人越来越近。裕禄的军队在北仓、杨村和蔡村等地，大败三次。他躲进棺材铺里，一个最不吉利的地方！裕禄12日在蔡村用左轮手枪自杀。李秉衡14日到达河西务，尽管他努力集结军队，但他手下两支部队的头领张春发和陈泽霖不愿战斗。李秉衡因此服毒自杀。荣禄今天给老佛爷传来此消息：君主和大臣们对这些亲王们和帝国所爆发的叛乱的灾难吓得哭作一团。荣禄努力克制自己，他不想自我辩白，他是一个明智的人。老佛爷说她想自杀，也让皇帝这样做，也不愿意离开京城。荣禄劝她听从他的忠告，留在北京发布诏令命令将端亲王及其追随者斩首，以此向全世界证明她的清白。但是她还抱着希望，希望义和团超自然的力量能拯救北京，对外国使馆的愤怒的炮轰能持续下去。

荣禄今天已经八次拜见，端亲王五次拜见。其他军机大臣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二十日下午五点(8月14日)。通州陷落，外国人将开始炮轰京城。今天军机大臣被召集到宁寿宫开了五次会议，据说老佛爷将到张家口暂时躲避。申时(下午4点)澜国公匆忙进入宫中，在没有通报的情况下，便大声呼喊：“老佛爷，洋鬼子来了。”刚毅紧跟着赶到，说有一大队士兵，驻扎在天坛附近。太后说：“恐怕是从甘肃来的，是我们的回勇，是来摧毁外国使团的吗？”刚毅说：“不是，是外国鬼子，请老佛爷即刻出走，不然，他们就要来杀了。”

夜半时分，太后召集军机大臣们来拜见，到场的只有刚毅、赵舒翹、王文韶三人。老佛爷说：“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丢下我们母子二人不管^①，无论有甚么事，你们三人，必要跟随我走。”又转身对王文韶说：“你年纪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随后赶来罢。”然后又对刚毅、赵舒翹二人说：“你们两人会骑马，应该随我走，沿路照顾，一刻也不能离开。”王文韶回答说：“臣当尽力赶上。”皇帝好像突然惊醒，对王文韶说：“是的，你总快快尽力赶上吧。”拜见至此结束，皇帝和太后何时离开，我不太清楚。此时荣禄正在努力集结军队，来不及拜见。

二十一日（8月15日）。文年对我说老佛爷今天早上寅时（凌晨3点钟）就起了床，只睡了一个时辰，匆匆打扮，穿一件蓝布衣服，就像乡间农妇一样，这是太后先要做的准备。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装成汉人模样。太后说：“谁料今日到如此天地？”用三辆寻常骡车，带进宫中，车夫也没有官帽。

嫔妃们在三点半钟一齐集合起来。太后先下了一道谕旨，不让一个人随同她前往。珍妃一向不服从太后，这时也随着其他人来集，并大着胆子向太后进言，说皇帝应该留在北京。太后没有心情和她争吵。太后不发一言，立即大声对太监呵斥道：“把这贱奴才扔到井里去。”这时皇帝非常伤心，跪下来恳求太后，太后愤怒地命令他不要再求，说这不是讲情的时候，太后说：“让她去死吧，好惩戒那不孝的孩子们，并教那鸱枭^②看看，他们到羽毛丰满的时候，就啄母亲的眼睛。”李莲英等就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大井中。

皇帝非常悲愤，气得浑身哆嗦。太后说：“上你的车子，

① 这种表情非常丰富。

② 一种鹰，根据传统的说法。

把帘子放下,免得有人认识。”皇帝穿蓝纱长袍,蓝布裤子。老佛爷又迅速命令溥伦说:“你挂皇帝车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辆车,教溥俊挂沿。”又对李莲英说:“我知道你不大会骑马,总要尽力赶上,跟我走。”在此危急时刻,只有老佛爷一人,心神不乱,指挥一切。又对车夫说:“尽力赶,要有洋鬼子拦阻,你不要说话,我跟他说,我们是乡下苦人,逃回家去,我们此时先到颐和园。”于是两宫开始启动车子,出宫北门(即神武门)而去。动身时,宫中妃嫔亲自跪送,并祝太后皇上万寿。乘马随行的只有军机大臣三人,其余百官都奉谕到颐和园会集。我的邻居内务府总管文连紧随皇太后之后送了一段路程,看见他们安全地到达德胜门,那里人山人海,致使城门几乎拥挤得不能使行人走路。

下午4点。圣驾8点钟到达颐和园,老佛爷在那里稍作休息。先由庆亲王派人前往朝阳门,向日寇悬挂停战旗,后城门被打开,日本兵蜂拥而进。

太后和皇帝的队伍到达的时候,风尘仆仆,我的儿子恩铭正在值夜班,守门的士兵们认不出是老佛爷。只看见一慈悲妇人,对他们非常愤怒,士兵们赶紧打开城门,让老佛爷的车进入。老佛爷用膳之后,立刻命令将颐和园中的珍宝都送往热河。又派一太监赶回京城,告诉皇后,迅速将皇宫中的财物珍宝,都埋藏在宁寿宫的院子里。端亲王、庆亲王、那亲王和肃亲王都在颐和园里随着皇帝和太后的车驾。此外还有王公贝勒等人,高级官员吴汝梅、溥兴二人,各部堂官约有十二人,军机章京三人,由马玉昆提督带领士兵一千人护送,往张家口。此外还有端亲王所带领的虎神营旗兵数百人,但是数次进攻使馆都无功而返。荣禄极力集结军队。

我又听说我的老友军机大臣徐桐,皇帝的老师,以绳

子自杀身亡，全家妇女十八口人，全部上吊身亡，真是殉清的忠臣啊！此时我听到的全是悲惨的事情，满洲的骄子，今天全部落到如此可怜的下场。醇亲王将于下月成婚的新娘^①，也全家自尽身亡，真是令人可怜。

在老佛爷的一生中，这已经是第二次躲避敌难而出走，就如同周幽王为躲避犬戎之难，“蒙尘于外”。这次的失败，全都是因为南方各省，不肯同心合力所造成的。端亲王存排汉之见，最是悖谬。孔子曾有名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荣禄毕竟是正确的，义和团的法术，就像小孩子胡闹，毫无所用。可叹啊，回首往事，盛世难再。我妻子和家中的妇女们，顽固愚昧，打算吞食鸦片自尽。我也没有办法阻止她们，但是我可不想像她们那样做这种愚蠢的事情。外国强盗，虽已在城中抢劫，必不能知予藏金之所在，予虽老耄，将留此不动。恩珠自昨日起，即不知其何往，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

《景善日记》至此而止。老人于是夜，为其长子所弑。其家中妇女，均吞烟自尽。

光绪帝朱笔上谕，立端亲王子大阿哥为继承皇位之人，下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今录于下：

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

^① 醇亲王后来娶了荣禄的女儿，是太后特命的。

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寢食难安，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制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逾。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界。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历史上很少能见到如此伤心之文。皇帝在诏谕中不仅甘心引退，而且以临终遗言昭告于天下之人。光绪帝还在文中不得不感谢太后对他的恩典，而皇太后不过想以一己私欲而对皇帝采取毒害的手段，以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皇帝可谓对她容忍。下奏乃京城中督察院上西安行在，说到恩海被捉的事情，即杀害德国使馆男爵克林德的人。看了以后就可以知道京城中的权贵们对于义和团排外的感情，而且对皇太后的心情，虽然失败但还是非常敬重的，而对于中国官吏的勇敢精神，也因此可以看出（此折留中未发抄，慈禧亦未加批，乃西安随扈之一官，送登于上海报馆者）。其奏略曰：

日本人所雇侦探，在日军领地当铺之内，查得一表，有克林德图记。当铺主人言，此乃满人名恩海者所当，此人住在内城车店内。侦察名为得洛，本旗营定字第八队之书记，查得此事，即报告于日人，立派人往车店内，以二三人先入内，立院中问曰：“恩海在此住否？”有一答曰：“予即恩海。”乃立时拘去，审问之时，恩海神宇镇定，毫无畏惧。问官问曰：“德国公使，是否为汝所杀？”恩海答曰：“我奉长官命令，遇外国人即杀之，我本一兵，只知服从长官命令，遇外

国人即杀之。有一日，我带领二三十人，在街上见一外国人坐轿而来，我立于旁，我将外国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表，我即取之，同事中有得其手枪者，有得其金戒者，我万不料因此表犯案。但我因杀国仇而死，心中甚乐，汝等即杀予以偿命可也。”翻译又问曰：“你那天是否醉了？”恩海笑答曰：“酒乃最好之物，我平常每次可饮四五斤，但那天实未饮一杯，你怕我要倚酒希图减罪吗？”恩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惧，观者皆为动容，觉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次日即交于德人，理当奏闻，恩海为国而死，当邀皇太后皇上之惋惜，加以荣典，谨此具奏。

第十八章 纪念二勇士

在前章提到御史的上奏中记录了一个满洲士兵被逮捕并被执行死刑的事情，因为当德国使馆人员克林德坐于轿中毫无防卫时，这个满洲士兵将他杀掉。京城中的士大夫都向皇太后上奏并祝贺，国家能拥有这样勇敢正义的人。平心而论，当时士大夫中，尚有两人，却是真正的英雄，而不是那种匹夫之勇，他们是凤毛麟角的道义之勇。这两个人就是大臣袁昶和许景澄。这两个人当国家有难，能舍身赴国难，且从容就义，视死如归，希望中国能多生这样的人。孔子的教义所包含的道德力量足以产生这种坚韧克己之儒家学者。我们且撇下这两人令人钦佩的行为不说，而以他们劝说反对义和团的奏折，节录于下面，以表彰他们在野蛮的政局动荡之中的英勇行为。这两人受到国人的尊敬。现在已经受到徐桐在奏疏中的表彰。二人在被执行死刑后，袁昶的儿子以书信中节略的内容昭示于家中的亲戚和朋友们，下面是发给其亲友的哀告，时间是1900年9月。在此哀告中像通常的格式一样表达了悲痛之情，其主要的內容如下：

不孝等窃念先公仗义直言，反受其祸。吾等将当日情势具禀亲友。

时值今年五月，拳乱蜂起，吾父身为外务部大臣，于此

时之形势焦急万分。其同事许景澄亦深有同感。亲王大臣三次晋见，吾父俱以言相劝，谓拳匪不可恃。家父言其亲往使馆查看，见拳匪横死街头，皆系子弹所为，此足明其诈术也，非能刀枪不入。其不应为朝廷军力。闻听吾父忠言，皇帝转身询问许景澄，中国之强大足以抵抗夷人乎？尚有有关外国列强诸疑问，多所请教云云。许氏遽尔应云：中国积弱无以与全球战之。皇帝闻听遂执之以袖为之唏嘘不已。许悲痛而去，独留父亲大人草拟二人之上奏。

随后，当炮轰外国使馆的声音大震，我父亲对许景澄说：“屠戮外国使节乃破坏国际公法之严重行为。若外国使馆被毁，列强便派远征军寻仇，我们国家成何体统？我们两个人必须反对此愚蠢行为，即使冒着死亡的危险，也要上奏。”于是他们再次上奏，但政府官报并不予以报道，可是这些参加义和团的亲王和大臣们非常害怕，一度减弱了对外国使馆的进攻。这时对使馆的保护多亏了父亲和许大人的上奏。但从此以后，父亲和许大人的政敌就更加怀恨在心。

六月之几日里（7月15日到25日），外国军队大举进攻北京，我父对许大人言：“我们在等死。为何犹豫不决？”因此他们第三次上奏。在此奏中他们说形势更加危急，连亲王和军机大臣们都在为这些义和团喝彩，并支持欺骗太后的举动。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躲避可怕的危险并阻止外国军队，这些义和团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这些行为都是亲王大臣们一手所为。上奏之后，父亲对母亲说：“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死于乱民之手，曷若死于司寇？苟死而朝廷顿悟，吾无憾矣。”全家人围着父亲大人哭泣，他镇静自若地对我们说：“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汝等留京回南，自主可耳。”他谆谆地教诲我们以忠君爱国之道。

到了七月二日（7月27日），父亲大人被戴上镣铐押往

刑部。第二天下午1点钟,他才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当时义和团暴民挤满了道路。其中一个义和团员诘问父亲大人为何仇视义和团。父亲大人斥责他说:“大臣谋议国事,岂尔等所应问?”闻狱卒言,公与许公在狱中,畅谈自如,犹从容索纸墨,手草二十余纸,后悉为拳匪搜得焚之。遗疏耶?遗嘱耶?家人不能言,亦不可知矣。呜呼!痛哉。家人于父亲大人临终之际无以尽孝。母亲大人仍然健在,父亲大人的遗柩得以悉心照料,家人之心灵得到些许慰藉,作为后辈亦可告慰祖先之英灵。本月8日家人将其灵柩移往杭州之广友园公墓,并护送母亲大人至其老家。家人在毗邻父亲大人之坟茔之一建筑旁矗立墓碑,在那里哭泣致哀。

此二人结局本不当如此,然其举止可谓大勇也。看到他们的奏折,尤其是每当看到二人最后的奏折,禁不住想起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上堪与之相媲美的典范。他们突出的哲学思想、诚挚的道德感和对死亡的冷静的思考,唯苏格拉底、塞尼加(公元前4年—公元65年,罗马政治家)和普林尼等可以与之相比,此精神诚为近世欧洲文明的古典之本原也。欧人坚毅诚挚之风,以为一切事业之根本者,皆由此精神之所遗传者也。即日本之强盛,亦由其国人有此精神所致。观二人最后之三道奏章,真百折不回之英雄绝唱,读之令人回肠荡气。第一封,尽管只以袁昶署名,显是与许景澄一同草拟。许氏曾为俄德二国公使,闻名遐迩,其廉洁精忠之盛誉,虽或不如袁氏。然大节炳然,足垂不朽,则其他小节,皆不足为累矣。

1900年6月20日,袁昶之《上反拳民疏第一》内容如下:

奏为密陈目前局势危迫,亟图补救之法,以弥将来巨患,披沥直陈,仰祈圣鉴事。窃见自本月十六七日,拳匪倡

乱京师，连日召见王贝勒内外廷臣工，圣躬焦劳，为宗庙社稷，深维至计，广咨下问，臣等不能弥患事先，纾君父之忧劳，负罪无状，内愧且愤。伏查嘉庆十三年七月上谕，即有山东河南一带匪徒，设立八卦，教义和拳等名目之事。此项实系白莲教之余孽，曾奉仁宗皇帝严旨密拿惩办。去年吴桥县知县劳乃宣说帖，考之最详。前月东抚袁世凯遵旨覆陈一折，言万无招抚编为营伍之理，言之最为切实明白。前东抚毓贤办理平原县邪匪一案，称匪首朱红灯自称明裔，妖言惑乱，各处响应，幸被官军掩捕擒获，就地正法，绝无能避枪炮刀斧之妖术，此其明证。上年臣询提督程文炳，该提督乙未年驻军近畿，有山东义和拳又自称金钟罩、红灯照名目。四五十人投效，以火枪利刃实其伎俩，立时见血伤毙，是妖术全不可信，确凿无疑。而其匪首广树党羽，久蓄逆谋，妄称明裔煽乱，其为邪教乱民，实已明白昭著。臣于上年十一月十三日蒙恩召见，其时鲁省拳匪，借仇教为名滋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鲁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多股，鲁省宴然。始而山东士绅，误信左道，腾谤谓该抚不应用剿，此皆不学无识之徒，以邪为正，近舆论亦渐贴服，以该抚办理为是。臣去年冬曾以劳乃宣说帖，商之总署诸臣，奏明请旨飭下鲁抚办理，旋因鲁抚办理有头绪，遂寝未奏。不意鲁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隶督臣（裕禄）观望迁延，养痍贻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涿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逆昭著，乃电奏力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处，涿水戕官尚未痛办，遂致匪胆愈张，甚且焚毁芦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张家口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内帑借洋款，集数十年之物力所经营，一旦焚毁千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又焚杀教民

数百处，将来议偿亦不贲，伏以民教互仇，积成愤毒。地方官秉承国家律令，自有平心澈狱办法，但凭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断不容匪徒自行报复。

乃自本月十六七日，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犖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实属罪大恶极，万不可赦。二十日焚烧前门外千余家，甚至灾及正阳门城楼，拳匪喝禁水会，不准救火。北城乃财产精华所聚，焚掠一空，官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贾尽行闭歇失业，餉项亦艰于汇兑给发。京都为万国所瞻仰，气象萧索，一至于此。自有乱民不治，任其焚杀叫喊，实貽邻国之耻笑。各洋公使团因匪仇教，畏其凶锋，情急自卫，现兵只有四百十余人，各保性命，是其实情。十五日枢臣启秀偕许景澄晤俄、英、法、美四公使。十六日枢臣启秀传懿旨慰问各公使馆，并及公使之妻。该公使等感戴圣慈，沦肌入髓，口称调洋兵为卫馆保命起见，绝不敢干预中国国家公事，匪平无事，即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词决非虚伪。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

臣伏思兵事最忌多立统帅，意见参差，事权不一，以致互相观望，转误事机。现在历奉严旨，飭令步军统领、武卫中军与神机营、虎神营严拿首要各犯，刻即解散胁从，将城内外设立坛棚，尽行拆去等因。乃官兵观望，拳匪横行如故，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前遵旨所拟十条章程，实止虚文搪塞，何曾实力做到。且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焚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于此，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现闻城外添设无数拳坛，久且煽惑愈多，致生巨变。伏乞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讨，上安九庙，下靖兆民。专责成大学士荣禄，兼用且剿且

抚之法，得意便宜从事。俾一事权，先肃清内城地面，遵旨立即出示，遍谕军民人等，凡遇头扎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匪，准其格杀勿论，并悬重赏之格。缚献匪首所谓老祖师大师兄者，赏银二万两，立即超擢官阶；擒斩该匪团长一名，赏银五百两；余匪计首一级，赏银一百两，均准报名候予奏奖。该大学士忠勇性成，见机明决，为国重臣，应扼要坐镇，不宜过劳细事，尤须差委得人襄助，乃可分理机宜。伏见武卫军幕僚记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谋略，内阁学士桂春忠勇明决，编修王廷相、御史黄桂素饬清操，通达事理，府丞兼署府尹陈夔龙勇于任事。请旨交大学士荣禄差遣，专办此事，参赞方略，遴派武卫中军得力将弁，挑选劲兵，分为十余队。队长如得力，每队只枪手刀斧手二三百人已足。请旨暂闭前三门，严禁游民，民只准出，不准进，分路搜捕匪徒，务令各空庙废祠根株净尽，官兵有退缩不前者，立即正法。命提督衙门刑部遴派明干司员多人，分驻各汛段官厅，随将捉拿匪徒，略讯口供，禀明统帅，即行就地正法，以儆凶顽。余者悉行解散，驱逐出外城之外，送解回籍，事平再行将正法若干匪，造册奏报。

或谓该匪人多势众，不可轻剿，不知只匪首倡乱，余多愚蠢村农，幼壮不一，随声附和，斩一悍匪，懦者必悔惧立散。或谓匪有邪术，臣愚以为汉末张角黄巾，元末破头播关先生，皆有妖术，卒归擒斩。该匪昼伏夜动，动言请神，口出妖言，面带阴气，此乃假托符咒扶鸾，请仙五鬼搬运之邪术，一遇声光并见之物，阳气炽烈，如枪炮等物，立即破法轰毙。若云匪术能避枪炮，何以十七八等日，该匪连攻东交民巷使馆，洋兵放枪，立毙数匪？昨又击毙帅府胡同拳匪四十余名，拆毁其坛，毫无能避之验。或谓民心因旱饥骤变，臣料京师军民数百万，受朝廷深仁厚泽，实无一谋反者，叛

逆只拳匪首要数人耳。一经擒斩，申国法，傲人心，匪胆即寒，民心亦大定。外五城御史街道厅督同绿营练勇水会，一体归荣禄节制办理，不使稍有掣肘。御营则专宿卫禁城，以防不虞，各办各事，城匪既清，各公使馆蒙天恩保护，感激再生之恩，则续调之洋兵，自可阻其来京。即来亦可以城匪既清，无庸自行保护折之，令其撤回，我有词矣。总之《周礼》称治乱国，用重典，《康诰》称用其义刑义杀，内匪势在必剿，无可游移。若因循不剿，招抚之亦不受命，各国势大怨深，并举报复，祸败不可胜言。与其外兵干预，代行剿办，必至拳匪洋兵，互相斗哄，喋血鞞轂之下，转致玉石不分，杀害无数良民，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不如我自行剿办，尚可示以形势，杜彼族之口实，以维持大局，庙社不惊，万民幸甚。大学士荣禄公忠体国，如特奉明旨，责成既专，收效乃速。至交涉之艰，亦可审机因应，所有密筹目前争图补救之法，务一事权，以弥局患缘由。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明裁判，谨奏。

袁昶和许景澄第二奏(7月8日):

奏为密陈内江外侮，祸乱日亟，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披沥愚忱，仰祈圣鉴事。窃自上月二十四日，德国使臣克林德途遇枪毙之后，该匪遂攻击各国使馆。提督董福祥所统甘军，尤与之声势相倚，狼狈为虐。使馆附近居民，遭池鱼之殃者，不可胜计，车城一带京官私宅劫掠殆尽。该匪既以仇教为名，波及使馆，复以攻使馆之故，波及官民，鞞轂之下，任令乱军乱民，纵横荡决，伊古伊今，实为罕见。当匪徒初攻使馆时，莫不谓旦夕间便可划除，董福祥且屡以使馆尽毁告矣。今已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

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众，自诩能避枪炮之术而今安在？夫以数万匪徒，攻四百余洋兵所守之使馆，至二十余日之久，犹未能破，则其伎俩亦可概见，尚得恃血气之勇，收御侮之效哉。

若云真义和团确能为国宣力，其寻衅焚杀，皆依附其间之伪义和团所为，一类之中，既分真伪，扰乱之极，且既容附人之伪者，无恶不作，则真者亦非善类可知。况历奉严旨禁止持械寻仇，焚毁劫掠，并令解散出城，该匪竟置若罔闻，横行如故。无论真伪，总之藐视王法，均为冥顽不灵，罪在不赦。愈抚则愈众，愈纵则愈骄。臣等前次奏请专责成大学士荣禄，用且剿且抚之法，未蒙俞允施行。今祸乱日亟，愚妄之见，尤不敢不冒死渎陈于圣明之前。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来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为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

我国家与泰西各国通商，垂六十年，准其各省传教，平日教民倚势鱼肉乡里，以洋教士为护符，地方官或者希图了事，抑制平民，亦所不免。民心怨忿，仇视教民，是皆臣等办理不善，贻害至今，负罪实甚。臣等何敢谓民教相仇，其曲全在民，特任令自相报复，殊失国体。譬如乡里之间，两家有隙，而子弟僮仆，肆行斗狠，毁邻居之至，而杀其闾人。为家主者，又安得以子弟僮仆，不守约束，而置身事外？以小喻大，其理相同。且泰西各国之教，有宗天主者，有宗耶稣者，传天主教者曰“神甫”，传耶稣教者曰“牧师”，该匪亦不辨所传何教，统以洋教呼之。而俄国向宗希腊，日本向宗佛教，该国从无入内地传教之事，该匪更不知何国有传教

之人，何国无传教之人，见异服异言，统呼之为毛子，锐以猕薙为快，无论势有所不能，理有所不直。且我出洋各使臣，非衔命而出者乎？若各国以我杀其使臣，而不胜忿忿，先杀我使臣以偿之，是直易刃而自杀其使臣也。朝廷方赐各使馆蔬果米麦，以示怀柔，该匪乃倚骄将为护符，肆行攻击，外人转疑朝廷阳款阴袒，谓非纵令恣意凌轹，其谁信之？夫使馆无恙，将来与各国复归于好，各使臣受皇太后皇上厚恩，自当激发天良，剖言祸之肇自拳匪，猝不及防，非朝廷姑息所致，释其本国疑忌之心，事半功倍，转圜较易。若使馆尽毁，使臣尽戮，则我皇太后皇上此时怀柔之恩，外人无从而知之，欲释于各国，虽百喙亦无从解免。今各国纷纷调兵，以代剿匪为词，疑之者谓乘机窥窃，信之者谓其心无他，臣愚莫测其究竟。而拳匪种种无法，早当痛剿，已不待外来人諄请，耕何待外人代庖，臣愚请保全使馆，为将来转圜地步。一面严旨切责董福祥，飭令甘军悉行退扎城外，不许重至东交民巷，比昵匪徒，向各使馆攻击，违者即行正法，使兵匪相离，匪势较弱，则剿除羽翼较易。一面仍请责成大学士荣禄，尅期将拳匪一律驱逐出城，以救燃眉之急，再图剿洗，永杜后患。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愿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第三奏(1900年7月23日)：

奏为密陈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请严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仰祈圣鉴事。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制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三四省，窃

据三四载,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自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群众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前山东抚臣毓贤养痍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附虎以翼。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何以解说?谓我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载覆之德,斯可矣。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艰难,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者,择各国中之易与者,一震威稜,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何如,也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止,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数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裕禄且招揽拳匪头目,待如上宾,乡里无赖棍徒,聚千百人,持义和拳三字名帖,便可身入衙署,与该督分庭抗礼,不亦轻朝廷而羞当世之士耶?静海县之拳匪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断乡曲,蔑视官长,聚众滋事之棍徒,为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土人莫不知之,即京师之人,亦莫不知之。该督公然入诸奏报,加以考语,为录用地步,欺罔君上,莫此为甚。

又裕禄奏称，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兵，提督罗荣光坚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开炮攻取，该提督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轮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战，我军随处截堵，义和团分起助战，合力痛击，焚毁租界洋房不少。臣由津来京避难之人，全谓击沉洋船，焚毁洋房，实属并无其事。而我军及拳匪被洋兵击毙者，不下数万人，异口同声，决非谣传之讹。甚有谓二十日洋人攻击大沽炮台，系裕禄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衅等语。此说或者众怨攸归，未可尽信，而讹报军情，竟与提督董福祥诈称使馆洋人焚杀净尽，如出一辙。董福祥本系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效力，积有微劳，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职。应何等束身自爱，仰答高厚鸿慈，乃比匪为奸，形同寇贼，迹其狂悖之状，不但辜负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禄屡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员可比，而竟愤愤乃尔，令人不可思议。要皆希合在廷诸臣谬见，误我皇太后皇上圣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是皆在廷诸臣，欺饰锢蔽，有以召之也。大学士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胶执己见，愚而自用；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翹居心狡狴，工于逢迎。当拳匪甫入京师之时，仰蒙召见王公以下内外臣工，垂询剿抚之策。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为逆说。夫使使万横磨剑，果足制敌，臣等凡有血气，何尝不欲聚彼族而歼旃，否则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间刚毅、赵舒翹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该匪勒令跪香，语多诬妄。赵舒翹明知其妄，语其随员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神术，不敢立异，仅出告示数百纸含糊了事，以业经解散覆

命，既解散矣。何以群匪如毛，不胜猕薙。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盍一诘责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进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日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如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廷臣全为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贤、裕禄数人，国朝数百年宗社，将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列宗在天之灵？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

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逾众。使去岁毓贤能力剿该匪，断不至蔓延直隶。使今春裕禄能认真防堵，该匪亦不至阑入京师。使徐桐、刚毅等，不加以义民之称，该匪尚不敢大肆焚掠杀戮之惨。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赵舒翘、启秀、裕禄、董福祥、毓贤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朝廷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第十九章 慈禧外交文牒拾零

对于慈禧太后迷信义和团的愚蠢行为和危险提出警告的，不单单是袁昶、许景澄，还有刘坤一。他见太后执行政策足以招致王朝的灭亡，极为焦虑，发电报劝阻太后，请太后立刻阻止进攻外国使馆。但太后对其奏折的回答，明显犹豫不决，含糊其词，这时候太后没有明确的立场。她既想报外国人侵略之仇，又恐怕

招致将来之灾祸。只要看一看《景善日记》就能发现太后此时反复无常的矛盾狐疑心情。因为她在看到刘坤一的奏章，批阅并答复后，仍然继续围攻外国使馆一个多月。刘坤一对太后的忠诚，不亚于荣禄，太后对这一点也深信不疑。刘之成熟老练使得慈禧太后多年来一直将其作为忠实的依靠。但是他对太后的苦苦劝告竟然不能使太后回心转意而仍存报复之心，故他提醒太后不要停留在迷信义和团的梦想里。结果，大沽炮台被联军攻陷，太后之意才稍有回转，然而事情已处于糟糕之境



刘坤一

地，遂不得不仓皇出逃。虽然大势已去，太后仍然发布文书，作为扭转窘境的手段。这时太后心存迷惑，简直进入了黑暗之境，但是她还抱着善意，希望端亲王和义和团能斩杀洋人，才不致陷入绝望。而送水果蔬菜给被围困的外国使臣，只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中国人一贯以君主无大的过失作为其信条，把儒家对祖先的孝敬之心，推之于对君王之忠心，而且文人士大夫无不以此为道德情操之楷模，而朝廷赖此为安定之法。刘坤一等的奏章就表明了文人学者的心理，读了之后使人尤其感到有趣。奏疏没有抨击朝廷的昏庸愚蠢，只是责备大臣自己不能理解太后的心意，而且还褒扬朝廷的明智。疏中内容如下：

窃查此次战事，由于匪徒藉口仇教，肆行烧杀，致酿大患。各国亦以保护商民教士为词，调舰增兵，合而谋我。军事既起，各省自宜力筹战守，臣等已将防务严密筹备。倘彼族前来侵犯，即当奋力抵拒，不敢稍涉疏虞。窃维中朝宽大，圣泽如天，怀柔远人，无不仁至义尽。目前办法，总须将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即并行不悖之德意，切实宣谕，庶匪徒不敢藉端滋扰，为害地方。臣等于战事初起之时，即行出示晓谕，务各相安，不必妄生疑虑。并节出洋华人电禀，请保护各国洋人，以免报复，情词极为迫切。臣等遂乘各领事等来商保护商教之时，会飭江海关道余联沅与之订定章程，长江一带及苏杭内地，各国如不侵犯，我当照常保护。经各领事电商外部，臣等亦电致各使臣，向各国切实声明。德因戕杀使臣，颇持异议，嗣因各国牵制，遂亦帖然就范。恭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谕旨，现在各使臣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并飭臣等尽职守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六月初三日，寄谕各使臣，现仍严飭带兵官照常保护各国使馆，惟力是视。各该大臣等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等因。是朝廷于天津开

仗之洋人，则严加惩创，于未与战事之洋官商教，则曲为保全，威德并施，昭如日月。臣等屡次奏请保护各使臣，亦以圣虑之所重，时局之所系，首在此举，不容稍缓。迭准出使大臣杨儒等来电，总以保全使臣及在省之各洋人为第一要义。拟恳天恩飭下在京得力各军，保护各国使臣，正所以自保使臣，并请飭令各省督抚保护在华洋人，正所以保在洋华民，不胜紧迫之至。

对于此道奏折，慈禧以快驿和电报作了答复，内容如下：

上谕刘坤一等。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复屡次明降谕旨，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责，与该督抚等意见正复相同。现幸各国使臣除克林德外，余俱平安无恙，日前并赐各使馆蔬果食物，以示体恤。如各国恃其兵力，进犯各省，自应保守疆土，竭力抵御，即使目前相安无事，亦必严密筹备，以防意外之变。惟总不欲兵衅自我而开，一面将坦怀相与之意，宣示各国使馆，共筹补救之方，以维大局。不得轻信浮言，致多齟齬，是为至要，将此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在颁布这道谕旨之前几天，即七月一日，慈禧太后亲自草拟一道诏书向列强解释时局破坏的原因，希望他们能够见谅。最为有趣的是，在此以前的十天，太后还在悬赏洋人之头，并且命令毓贤尽杀山西之洋人，而毓贤也是按照太后的旨意去办。太后喜欢读古书，知道洋人容易发生内讧，必然自相猜忌，最终导致洋人内部分裂。寄谕各驻使云：

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

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

先是直东两省，有一种乱民，各就村落，联系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察觉，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诘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挡。

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人，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官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以后，未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处巡街，以致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肆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所杀，迄未能前。

盖此时值东两省之乱党，已溶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该署因中途扰乱，未克如期候晤者也。自出自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飭保护使馆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猝。不料五月二十日，即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台之事，谓如不允？便当于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端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

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来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补已而作此因应之处，该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中乱民，设法相机，自行剿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

太后可能是受军机大臣们的鼓动，又致电俄国皇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日本天皇等各国皇帝，认为乘此胜利的机会，可以使列强之间互相猜忌，坐收此间渔利。实际上此种外交手段如同儿戏一样，一点也不知道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而且这些书函按照体制和惯例，应该由庆亲王及总理衙门照会各国使馆即可。大沽及天津，都已沦陷，联军马上就可以进攻北京，太后这时畏惧狐疑，所以才有此等电报，致函各国驻京城使馆。列强当时认为使馆都在中国掌握之中，他们与中国的外交，不能不有所顾忌，太后也深知列强的弱点，想充分利用这一点，为日后避免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和不测之命运作准备。但慈禧处于受蒙蔽的宫廷之中，始终不能不抱着义和团能取得大胜的希望，盼望使馆能够被迅速地攻陷，其所攻击的就是太后所说的加以小心保护的使馆。

对此我们简单概说一下。凡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人，没有不想根据研究往事来预知未来的，当时在朝廷中向君主建议的，有的主战，有的主和，所有的人不管是满洲人还是汉人，不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也不论是勇敢的还是怯懦的，无不一致表示对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所作所为的仇恨。这样的情绪和心理，士大夫与义和团实际上没有区别。但是义和团的思想简单而毫无节制，士大夫只不过较为文雅罢了。政府的高级官员，如刘坤一、袁世凯、荣禄也是如此，与外国人关系比较好的人，也不是出自于自己的内心，乃暂时不得已而为之。然而想一

下关系到外交层面的文告及其情况,及某某人与某某大官交情非常厚等等,则又使人感到疑惑,而不知其中真伪。而且这种怨恨心情,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其究竟因何而引起的呢?是外国人自己招惹的,还是中国人的过错呢?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深刻思考并研究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最近五十年来中国高级官员的上奏和文牒,就可以看出其中对西方人不满的态度处处存在而不能消除。但是这其中也有不完全像这样的人,例如袁昶就非常重视西方人,但是其尊敬并非出于和西方人的真诚交情。西人经过长时间的经历和锻炼,对于中国的内情尚且不能了解,而且容易上当受骗,而且这也足以使中国人鄙视他们,再加上诱惑他们上当的办法,所以我敢断言将来之拳乱必定由中国大官挑拨,就像1900年那样,只不过不像当时那么明显地赞成而已。中国人对我们西方人这种仇视,我们作不出合适的解释,但我们私下推测认为,或者如以弗所的德米特里厄斯,外表看起来对戴安那女神的礼拜仪式非常恐惧,实际上是恐怕他们自己的生活被扰乱。下面我们节录太后7月3日致英国、俄国和日本等国君主的电报。电报的内容当时也发往法国和美国等共和国家,但是奇怪的是日期说明的竟是6月19日(大沽炮台沦陷是在16日),我在克迪亚先生出版的《与中国关系》一书中经过艰苦努力才考证出准确的日期。7月3日的电文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领邦接壤,二百数十年来,敦睦最先,交谊最笃。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贵国使臣格尔思曾向总理衙门请速剿乱民,以解各国之疑。而其时京城内外,乱民蔓延已遍,风声煽播,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同时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若操之太蹙,既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又恐各海口同时举事,益复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

以此。乃各国水师不能相谅，致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论交，贵国之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前年曾授李鸿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约，载在盟府。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于犯众怒，排乱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同一天，慈禧太后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电报由中国驻英国外交使臣呈递国书。其文曰：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兼任印度大帝好。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惟贵国始终以商务为重，并无觊觎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横，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从此兵连祸结，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国商务，贵国实据十之七八，关税既轻于各国，例禁亦宽于他邦，是以数十年来，通商各口之于贵国商民，最相浹洽，几如中外一家。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势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君主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盼之至。

又以皇帝的名义电命出使日本国大使呈递国书。其文曰：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相依唇齿，敦睦无嫌。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戕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拿凶惩办间，而各国因民教相仇，致疑朝廷袒民嫉教，

竟尔攻占大沽炮台，于是兵衅遂开，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我两国，支柱其间。彼称雄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其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小嫌，共维全局。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同洲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盼之至。

这些著名的电报，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而且都载于王朝的编年史书中。也出于太后的命令之下。关于义和团叛乱的其他一切诏令，都不见记载于国史之中。欧洲的外交家及官吏中没有见识的人，每重视中国历史记述，都认为是实录，看了以后可以恍然大悟。以上电文，足见中国外交政策的浅陋，对于其中政策，西方人不知其中原由，还以为东方人其深心难以猜透。这样的电文，可以证明当日政治的实际情形，实在是出人意料。但是中国这些浅薄可笑的政策，常常使得欧洲神妙奇诡的外交家被迷惑，这也是常常见到的事情。中国人掌管外交事务的人，就如同小孩子一样，欧洲人与他们进行交涉，常常不知道其中的技巧和上层的来源。如果了解了其糟糕的状况，就会认为以神妙奇诡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不过是合马基雅维利、塔利兰和梅特涅三人为一身来对付对手而已。为英国的利益而考虑，从此次义和团溃败的事件中要吸取教训，我英国的外交政策亟待改变，尤其是领事，这种要求改变公使政策的请求已不是一人向英国唐宁街的首相府请愿了，但是都徒劳无功，没有人相信。

第二十章 两宫之西逃

《景善日记》已对皇太后和皇帝从北京出逃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们出京的时间是在8月15日黎明时分。从军机大臣王文韶其后写给浙江友人的书信可以看出沿途情形，因为王氏随同他们二人西行。这封口述的书信曾刊登在上海的某报上，读后可与《景善日记》相印证，所记述的内容颇为有趣。

王文韶8月18日才在怀来追上皇太后和皇上的车队，在过去的三天内，皇太后和皇上已经备尝途中之困苦。在19日晚上皇太后和皇上走到贯市，离开京城有七十里，在一座清真寺里住宿。这里有一个叫东光峪的地方，为商务聚集之所，平日里北行的商队，在此雇佣驮马。太后在此，能够弄来的食物为一些粗麦粉、蔬菜和粟粥，而且准备有骡车，以供第二天旅行的需要。护送的兵队在后面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有联军在后追踪，且不声明太后的行踪，因为太后是微服出行的。太后沿途备受苦难，非常伤心，下车的时候，所有避难或者在村子里居住的人都围绕过来询问京城的消息。当时目击的人说，曾听皇帝神色紧张地说：“都是因为义和团的原因才使我们落到此种地步。”太后听说以后，命令皇帝不要说，虽然太后处于极度不幸之中，仍表现出镇定自若之态。

第二天他们一路行走，加之皇太后和皇帝的骡轿，晚上睡在

后赏赐了他。在怀来休息了一天，王文韶赶上了皇太后的车驾，皇太后非常高兴，殷切地询问路中之苦，分燕窝汤赏赐给他，说你在路上所受的困苦必与我们相同，又责备皇帝不对老臣热情地问候和感谢。在怀来，命令庆亲王回京城与联军议和，庆亲王知此事非常难，极不情愿地奉命而去，临走时太后与之谈了很久，并安慰他说：“知汝能肩此重任，先年英法联军入都，和议乃恭王所定，可追思其事也。”以下是王文韶有趣的记述：

七月二十一日，皇太后皇上均坐车出京，行至贯市地方，始由东光裕驼行孝敬驼轿三乘，皇上与溥伦贝子同坐一乘。至怀来县，二尹备大轿一乘，宣化县又备轿四顶，皇太后、皇帝和大阿哥始均有轿子。两宫均是便衣，太后穿蓝夏布衫，亦不梳头，皇上穿黑纱长衫，黑布战裙一条，铺盖行李，一概未带。出京三日，均睡火炕，无被无褥，无替换衣服，亦无饭吃，以小米粥充饥。至怀来宣化，始由地方官络绎进奉，稍觉舒服。此次妃嫔及宫女等，均未带出，太监亦不多，诸王贝勒随行者亦不多，其余一概未来，礼王荣相启秀等人，亦尚未来，所有随行者，不过端王、庆王、那王、肃王、伦贝子、橐贝子及公爷几位而已。堂官有刚、赵、吴、王、溥兴五人，各部院司员共十一二人，满小军机二人，汉小军机一人，神机虎营八旗练军千余人，马玉昆保驾，及各营弁兵丁约千余名。各兵到一处，空一处，因铺户均已闭户逃走，实在无处买物，亦无怪其然耳。先是七月十一二日，裕帅由北仓兵败，退扎杨村，又退至蔡村，裕帅用手枪自尽。李鉴帅十四日抵河西务，所统张春发、陈泽霖两军，不战自溃，鉴帅亦服毒自尽。洋兵进逼通州，十六日，即有西巡之旨，因车辆不齐，迟迟未行。至十九晚，城外大炮隆隆不绝，二十日早，我所居喜雀胡同一带炮声渐近，炮子如雨，下午

炮声尤甚。忽传天安门及西长安门失守，然不能得真消息，我在内值宿未归，禁门已严扃，不能进入，至二十一日早七钟，我坐小轿进城，始知两宫已黎明出城矣。我于上日即二十日共召见五次，至亥刻见面，仅刚、赵二人，太后云：“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均各自回家去，丢我母子二人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并谕我：“汝年纪太大，尚要汝吃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随后赶来。刚、赵素能骑马，必须随驾同行。”我复奏云：“臣必赶来。”皇上亦云：“汝务必要来。”云云。至夜半，犹说不即走，岂知天甫微明，两宫已仓猝出宫，狼狈凄惨情形，不堪言状。是日我进城内，因后门、东华门均关闭，不能回宅，并知两宫出德胜门。我遂于巳刻冲出后门，至云鹜庵中小憩。庵在安定、德胜门之间，庵中和尚亦急报，缘洋兵进城，逢庙必烧，以庙中皆设义和拳也。其时安定门至德胜门城上，均有洋兵教民来往放枪，街上亦有洋兵。据闻洋兵进城，只杀溃兵，居民铺户，并不惊动。和尚万不肯留，不得已，暂避隔壁韩姓家，韩系旗人，充内务府役，车夫轿夫，各自逃命。至下午，闻西直门尚开，可以行走，遂将车马一切物件，一概丢在韩姓家，只带银钱，并随身衣服。候至天黑，随众出城，由德兴门十三海一带行走。近夏夏胡同，天复下雨，乃至景宅借住一宿，其时城内枪炮之声已停，但见后门外满天火光，通宵不绝。至寅初，探知西直门已开，洋兵未来，华兵已逃，无人盘问，逃难之人不少。我本拟坐车出城，沿途有兵勇抢车抢牲口，以致车马等令刘弁等押出城外，几被抢去。我与次子均步行出西直门，至大桥外，始坐轿车。次日骑驴，所带仅存五六人，均步行跑至海甸。饭铺已闭，勉强一饭，饭后即行，行七十里，至贯市住夜。二十三日行四十五里至居庸关住宿。二十四日行八里至怀来，始知两宫先于二十二日到此，驻蹕一日，故此



赶到之后，即见面。二十五日起，即随驾同行，五十里至河城住。二十六日行四十里至鸡鸣驿住。二十七日行六十里至宣化府城住。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等日休息。拟初一日启蹕往山西大同府，至山西省城，大约须中秋后也。此次出京，危险已极，沿途居民铺户，均被溃兵以随驾为名，其时驾尚未出，纷纷西行抢劫，室室皆空。及圣驾驻蹕之时，万骑千乘，强买强取，更不堪寓目。迨圣驾既过之后，靡有孑遗矣。

两宫由怀来行至宣化府，途中走了三天，在宣化停留休息了四天，预备往山西进发。沙河镇之都统赠送给太后一乘绿轿，由此朝廷和军机处的行仗逐渐齐备。太后精神非常好，对看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走到鸡鸣驿，旁边附近有一座山，山顶有一座寺庙，圣祖曾经巡幸到这里，并曾经作诗刻石于庙中，太后想亲自去看看，大臣们极力劝阻，太后才没有去。

宣化地方形势非常混乱，然而太后在此却非常安全舒适，大概是因为此地的地方官程本治理地方非常好。在这里接到庆亲王回到都城后的第一封电报，电报中叙述京城的情形非常悲惨。8月25日，两宫人由宣化动身，随从的人员稍多，宿在一个军台，名愁卫，其地供给缺乏，而且可以看出这个地方十分荒凉。驻扎于此地的台官已经逃跑，官府衙门也已经被焚毁，只剩下小屋二间，地面潮湿，而且有一股臭味，食物也很难得到，只有由粗面做成的饽饽而已。太后住一小屋，其余一屋，皇帝和皇后住下，随从的官员大多露宿在院子里。这里蚊子很多，太后一晚上也睡不着觉，对随从的人说：“不料竟至于此，诚可愧痛。唐玄宗遭安史之乱，亦蒙尘于外，目视其宠妃之死而不能救，余今所处，殆尤过之。”当时又听说联军闯入宫中，掠取财宝，太后盛怒，跟从的人都胆战心惊。8月27日，到达山西境内，宿在天镇县。县官是一

